

苦儿流浪记

在村子里

我是一个给人捡来的孩子。

可是我在八岁以前，一直以为我跟别的孩子一样，有一个母亲，因为当我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人把我温柔地抱在她的怀里。她对我说话的态度，她朝着我看的神情，她对我的抚爱，她责备我时那种温柔的声调，都使我相信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又怎么会晓得她不是我的母亲，只是抚养我的人呢？经过的情形是这样：

我的村子，或者说得正确些，我在那里长大的村子，叫做萨瓦农，它是法国中部那些最贫穷的村子当中的一个。

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寡妇，不过她的丈夫在巴黎做石匠。自从我能够观看和懂得周围的事物的时候起，他一次也没有回家来过。有时他有一两个朋友回村子里来，他就托他们带一些信息来。

十一月里，有一天天刚黑的时候，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在我们家的栅栏外面说：“巴贝兰大妈，我带来了一些巴黎的口信。”

“啊！老天爷！”我的母亲握紧了双手大声说，“杰洛姆出事情了！”

“是的，但是你用不到太惊慌；你的丈夫受了伤，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他并没有死。他可能会变成残废。现在他躺在医院里面，我临回家乡来的时候，他要我顺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巴贝兰大妈请这个人留下来吃饭。他一边吃，一边对我们讲那件意外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巴贝兰的半边身子给倒下来的脚手架压坏了，后来有人证明他不应该站在他出事的那个地方，因此包工头连一点钱也不肯赔偿他。

“我已经建议他找包工头打官司，”他说。

“打官司，这要花好多钱呀。”

“是得花钱，不过要是打赢了那就好啦！”

一天跟着一天过去，一个星期跟着一个星期过去，巴贝兰不时地来信要家里寄钱去，最后来的一封信，要钱要得比前几封信更急。信上说：要是家里没有钱，那就卖掉母牛凑钱给他。

只有跟农民一起在乡间住过的人，才知道“卖掉母牛”这四个字里包含了怎样的灾难和不幸。

巴贝兰大妈和我跟我们的母牛相处得多好啊！它不单单供给我们奶吃，而且还是我们的同伴、我们的朋友。我们跟它说话，它懂得，它爱我们。

一个牛贩子到我们家来了，他仔细地打量母牛露赛德，一边不停地摸它，一边不高兴地摇着头，一遍又一遍他说这条牛一点也不中他的意，到了最后他才说看在巴贝兰大妈的面上，他愿意把它买下来。

从此我们没有牛奶喝，也没有奶油吃了。早上，光吃一片面包。晚上，吃的是盐煮马铃薯。

露赛德卖掉没有几天，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就到了。去年今天过节，巴贝兰大妈做了许多煎饼和果馅炸饼，让我大吃了一顿。

今年呢，露赛德没有了，节也过不成了。

可是巴贝兰大妈却让我吃了一惊，虽然她不喜欢借债，她却向我们的一个女邻居要来了一杯牛奶，又向另一个女邻居要来了一块奶油。我回到家里，巴贝兰大妈从墙上拿下了锅子，用刀尖挑了一块象小核桃一样大的奶油，放在锅子里，奶油溶化开，发出吱吱的声音。

这种奶油溶化的吱吱声，真是令人愉快的音乐。然而，我正在专心听这种乐声的时候，好象听到院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一根棍子敲了下门槛，接着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火光照着他，我看清楚了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根粗棍子。

“在过节吗？不要拘束。”他用一种严厉的口气说。

“啊！老天爷！”巴贝兰大妈赶快把锅子放到地上，叫起来，“是你，杰洛姆？”

然后，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那个人面前。“他是你的爸爸。”她对我说。

我想走到他跟前拥抱他，但是他用棍子阻止了我。

“这是哪一个？”

“这是雷米。”

“你不是对我说过……”

他朝我走近了几步，举起棍子，我不自觉地朝后退了。我做了什么坏事吗？为什么我要挨打呢？我要去拥抱他，为什么他反而要这样对待我呢？

“我看到你们在过节，”他说，“这太好了，因为我饿坏了，但是可不要光拿煎饼给一个走了八九十里路的人吃。”

“除了这个，我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想到你会来。”

他向四面望了一下，说：“那不是奶油。”他抬起头来，对天花板上本来挂猪肉的地方看。但是好久以来，挂猪肉的钩子就是空空的了，当时梁上只挂了几串大蒜头和洋葱头。

“收起你的煎饼，”他说，“来炒洋葱吧，我们可以做一样好汤吃。”

我不敢离开那根棍子指给我待的地方，我靠着桌子望着他。这个人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相貌很凶，神色严厉，他因为受了伤，所以头向着右边歪，这种畸形的样子更叫他的相貌使人害怕。

“你别象木头一样待在这儿，”他对我说，“把盆子放在桌上。”

我赶快照着他的吩咐做去。汤烧好了，巴贝兰大妈把汤盛在盆子里。于是他离开了壁炉，坐到桌前开始吃起来。他不时地停止喝汤，朝着我看。我害怕极了，不安极了，连东西也吃不下去了。

“要是你肚子不饿，”他对我说，“就赶快去睡觉，可要一上床就睡着。”

巴贝兰大妈朝我看了一眼，意思是要我听话，不要争辩。但是这个暗示是多余的。我赶紧脱掉衣服，上了床，不过说到睡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人是我的爸爸！那他为什么待我这样凶狠？我把面孔紧贴着墙壁，尽力想照他吩咐我的赶快睡着，但是办不到，一点也睡不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清醒过。

“他睡了，”巴贝兰大妈说，“他一躺下来就立刻睡着，这成了习惯了；你说吧，不用担心他听见。你的官司打得怎么样啦？”

“打输了！法院的判决说站在脚手架下面是我的错，包工头一点责任也

不用负。”

说到这儿，他朝桌子捶了一拳头，一句有道理的话都不说，就骂起来了。

“官司打输了，”他过了一会又说，“钱没有了，人也残废了，真倒霉！可是，倒好象这还不够，回来偏偏又看到这个小家伙。为什么你不照我说过的那样做去？”

“因为我不能够那样做。”

“你不能够把他送到孤儿院去？”

“我用我自己的奶把他喂大，我这样爱他，怎么能就这样地把他丢掉呢！”

“他不是你生的孩子。他几岁了？八岁？那好，他八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他早就应该去的地方，对他来说这当然不大舒服，可是他只有这条路好走。”

“啊！杰洛姆，你别这样做。”

“我别这样做！谁不准我这样做？你以为我们能够把他留下来吗？现在用什么来养活他，养活你，养活我呢？我们一个钱也没有，牛也卖了。我们连自己都没有吃的，难道还应该养活一个别人的孩子不成？”

“他是我的孩子。”

“他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农人的孩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他，他又弱又瘦，一双胳膊不象胳膊，一双腿也不象腿。”

“要是他的父母来领他，那时候你怎么说呢？”

“他的父母！他有父母吗？要是他有父母的话，他们早就来找他了，八年来，也一定会把他找到了。我真做了一件大傻事，居然以为他有父母，他们总有一天会来领他，而且，因为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他养大，会给我们一笔钱。好，他们要是来了，就叫他们上孤儿院去。够了，不用再说啦，明天我就把他带到镇长那儿去。”

门开了又关上了。他出去了。于是我赶紧坐起来，叫巴贝兰大妈。她跑到我的床边，温柔地抱住我。

“你没有睡着吗？杰洛姆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是的，你不是我的妈妈；他也不是我的爸爸。”

“也许我早就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她说，“但是因为你真象是我亲生的孩子，所以我不能无缘无故地对你说，我不是你的亲生妈妈！可怜的孩子，你刚才听到了，你的母亲我们不知道是谁。她究竟活着呢，还是已经不在？我们也一点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在巴黎，杰洛姆去上工，他走过一条街，叫做勃勒德依路，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声音好象是从一家大门口那儿发出来的。那时候是二月里，天刚刚有点亮。他走过去，看见一个小孩睡在大门口。当时杰洛姆非常为难，后来又来了几个工人，大家决定把孩子送到警察局去。孩子不停地哭。男孩挺好看，大约有五六个月，皮肤是粉红色的，又肥又胖，真漂亮，裹着他的小被和衣服都很考究，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的父母是很有钱的。警察局长说如果在场的人当中没有人肯收留的话，他就要把他送到孤儿院去。这个孩子养起来并不费事，他的父母一定会找他，要是找到了，准会酬谢小心抚养他的人。杰洛姆听了，就说他愿意把这个孩子收留下来，警察局长就交给了他，我那时候有一个孩子跟这个孩子一样大，喂两个孩子的奶对我并不怎样费事。这样，我就成了你的妈妈了，”

“啊！妈妈。”

“过了三个月，我自己的孩子死了，因此我更加爱护你了。我忘记了你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不幸的是杰洛姆却总忘不了，他看到三年以后你的父母还没有来找你，至少是他们没有找到你，他就想把你送到孤儿院去。你刚才已经听见了我为什么不肯听从他。”

“啊，不要把我送到孤儿院去，”我抱住了她叫起来。“巴贝兰大妈，我求求你！”

“不会的，我的孩子，你不会去的，我会把事情安排妥当，杰洛姆不是一个坏人；你将来会知道的，因为遇到不幸的事情，因为害怕没有饭吃，才使得他变成了这个样子。”

巴贝兰想把我送到孤儿院去；不知道巴贝兰大妈能不能够阻止他这样做？

维达里老爷的班子

第二天，整个上午巴贝兰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以为他已经不打算把我送到孤儿院去了。巴贝兰大妈一定对他说过，她已经使他决定了把我留下来，可是，敲十二点钟的时候，巴贝兰叫我戴上帽子跟他走。我大吃一惊，眼睛朝巴贝兰大妈看，想请求她帮助我。她偷偷地对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不用害怕，叫我尽管放心好了。

于是，我不再说什么，跟在巴贝兰后面出去了。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前经过，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叫住了巴贝兰，请他进去。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在我看来，咖啡馆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坐在壁炉旁边，向四周望。

在我坐的地方对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穿了一身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古怪衣服。他的长头发披到肩膀上，头上戴着一顶插着绿羽毛和红羽毛的灰毡帽。身上紧紧地套着一块羊皮。这块羊皮没有袖子，在两边肩膀那儿开的两个洞里，伸出两条套着丝绒衣袖的胳膊，丝绒从前一定是蓝颜色的，现在却褪了色。他裹着的一副羊毛裹腿，很长，一直包到膝盖那儿，上面扎着些红带子，交叉地小腿上绕了好几道。在他的身边有三只狗，躲在他的椅子下面。一动也不动地挤在一堆取暖，那是一只白狮子狗，一只黑狮子狗，还有一只是灰色的、模样又狡猾又温和的小母狗。那只白狮子狗头上戴了一顶旧的警察帽，用一根皮带在下巴底下扣牢。我又吃惊又好奇地望着这个老头的时候，巴贝兰和咖啡馆老板低声地谈起话来，我听得出他们是在谈我。

巴贝兰说他到村子里来，是想把我领到镇长那儿去，请镇长要求孤儿院按月付给他一笔钱，好把我留下来。这就是巴贝兰大妈能够劝她的丈夫做到的事情。我立刻明白了，如果巴贝兰把我留在身边对他有好处的话，那我就一点也不用担心了。

那个老头，样子并不象在听人说话，但是却听见了他们在说些什么；他突然用右手指着我，对巴贝兰说：

“给你添麻烦的孩子就是他吗？”他用一种奇怪的口音说。“也许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摆脱掉这个麻烦，甚至你还能够得到一点好处。”

“要是你告诉我这个办法，我请你喝一瓶酒。”

老头离开了他的座位，走到巴贝兰的对面坐下来。

“你所指望的，是不是要这个小孩从此不再跟你吃饭？”

“如果你是这样指望的话，那就把他给我，我来供给他饭吃。”

“把他给你！把象他这样的一个孩子给你，一个这样漂亮的孩子，他可真漂亮！你倒是瞧瞧，他跟一个大人一样有力气，又结实，又健康；你瞧瞧他的腿！他的胳膊！”

“胳膊跟腿一样结实，可以过得去，不过吃不了苦啊。”

“他吃不了苦？来摸摸看，喂，你亲手摸摸看。”

我现在遇到的场面，就跟那一天牛贩子来买我们的母牛的情形差不多。那一个牛贩子也是这样摸着母牛，也是这样摇头，撅嘴。

“好了，”老头说，“不管他是好是坏，我都要。不过，我不向你买他，我向你雇他。我一年付给你二十法郎雇用金。这是一个好价钱，而且我可以预付。”

“可是，我要是把他留下来，孤儿院会给我十几个法郎一个月呢。”

“就算给你七个法郎吧，你还得供他吃呢。”

“你想想，”巴贝兰大声说，“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遇到他的父母的！那时候谁把他养大的，谁就可以赚一笔钱；当初要不是为了图这个，我才不把他领回来养呢。”“好吧，那我们就说定了，如果他有父母的话，谢礼我们平分。我加到三十法郎了。”

“四十法郎。”

“不行，因为他要替我做的事情值不了这么多的钱。”

“你要他替你做什么事情？”

老头带着讥笑的神气，朝巴贝兰看着，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杯子里的酒喝光。

“他要加入维达里老爷的班子，”他说。

“这个班子在什么地方？”

“维达里老爷就是我；班子吗，我叫出来给你看。”

他一边说，一边解开他那件羊皮背心，从左边的胳肢窝里掏出一个奇怪的动物，拿在手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古怪的东西，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名字。它穿了一件镶着金边的红衣服，但是赤裸的胳膊和双腿却是漆黑的。头也是黑的，大小差不多跟我的握紧了的拳头一样；鼻子朝天，鼻孔分开，嘴唇焦黄。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两只眼睛，它们离得很近，但是十二万分的灵活。

“啊！这个坏猴子！”巴贝兰叫道。

“这是我班子里的第一个名角儿，”维达里说，“小宝贝，我的朋友，向观众们行个礼。”

小宝贝把一只握紧了的手放在唇上，向我们大家送来一个吻。

“现在，”维达里指着那只白狮子狗说，“请看另外一个角儿；卡比老爷，它能把它的朋友介绍给在场的可敬的全体观众，觉得非常光荣。”

这只狮子狗赶快站起来，举起前边的两只脚，在胸前交叉起来，然后向它的师父行礼，它身子弯得那样低，头上戴的警察帽碰到了地面。礼行好以后，它向它的同伴们转过身子，用一只脚向它们招招，叫它们过来，另外一只脚却一直放在胸前，另外两只狗立刻站起来，互相伸出了一只前脚，好象交际场合里的人互相伸出手来一样，它们庄重地向前走了六步，接着向后走了三步，向观众致敬。

“我叫做卡比的这只狗，”维达里又说，“用意大利话又可以叫做卡比塔诺，它是狗当中的队长，它最聪明，能够代我传达命令。这只文雅的黑狗是日比洛老爷，‘日比洛’就是‘文雅’的意思，它不论哪一方面都配得上这个名字。至于这一位外貌怕羞的年轻姑娘，是多尔丝小姐，是一只可爱的英国狗，它并没有冒用‘温柔’这个名字。我就是带了这些以不同的名字而出名的演员，才能够在世界各处跑来跑去，凭着运气的好坏，赚钱生活，卡比，我的朋友，烦你的神，告诉这个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卡比走到它的师父前面，掀起他的羊皮背心，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银表，看了看表面，然后清清楚楚地叫了两声，它叫了两声以后，又低

“卡比塔诺”意大利语里是“队长”的意思。“日比洛”和“多尔丝”也是意大利语，是“文雅”和“温柔”的意思。

低地叫了三声。当时的确是两点三刻。

维达里老爷的徒弟果然是非常有趣，而且一天到晚在各处走来走去一定也挺好玩；可是，要跟着它们到处走，就得离开巴贝兰大妈。事实上，就是我不答应的話，我也不一定能再留在巴贝兰大妈身边，我会给送到孤儿院去。

“现在，”维达里继续说下去，“再来谈我们的事情吧。我给你三十法郎。”

“不行，我要四十法郎。”

他们开始争起来，但是维达里立刻就打断了对方的话。

“这个孩子在这儿一定待得厌烦了，”他说，“让他到旅馆的院子里去玩玩吧。”

维达里和巴贝兰两个人又争了好半天，因为到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巴贝兰才走到院子里来。我看到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的。他来找我是想把我交给维达里吗？“走吧，”他对我说，“我们回家去吧。”

回家去！我不离开我的妈妈了吗？——我真想问问巴贝兰，但是我不敢，因为他好象非常不高兴。在快到家的时候，他站住了。

“你要知道，”他狠狠地拉住我的耳朵对我说，“你要是把你听到的话说出来，哪怕是一句，也有你的好看，你当心！”

我们回到家里，巴贝兰大妈问道：“喂，镇长怎么说？”

“我们没有看见他。我在圣母咖啡馆里遇到几个朋友，等我们离开那儿，时间已经不早了。”

这样看起来，巴贝兰准是决定放弃跟那个带着狗的人谈的那桩买卖了。一路上，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他要我回家去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但是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把我心里的模模糊糊的猜疑都赶跑了。我想不顾他的恐吓把经过告诉巴贝兰大妈，只要我能够找到机会，跟她在一块儿待上一点点时间就行了。但是整个晚上，巴贝兰都没有离开屋子，一直到睡觉以前，我还是没有我盼望的机会。

我睡觉了，心里想只好等明天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没有看到巴贝兰大妈。她不在家使我焦急起来。我心里不由得感到很害怕，很担忧；究竟是怎样的危险在威胁我，我不清楚，不过我已经预料到有危险了。

巴贝兰用一种奇怪的神情朝我望着，我走到园子里去。

我在我种的洋姜地当中跪了下来，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在不耐烦地叫我的名字。这是巴贝兰在叫我。我急忙回到屋子里去。

看到维达里和他的几只狗在壁炉前面，我是多么吃惊啊！我马上就明白了。维达里是来找我的。巴贝兰在早上把巴贝兰大妈打发到村子里去，就是为了不让她来保护我。我跑到维达里跟前。

“啊！先生，”我哭着叫道，“我求求你，不要把我带走。”

“你不能留在这儿，”巴贝兰拉着我的耳朵说，“要么跟这位先生走，要么进孤儿院，随你挑！”

“我都不愿意！我要巴贝兰大妈！”

“啊！你真叫我烦透了，要是一定要用棍子才能把你赶走的话，我可不再客气啦。”

“这个孩子舍不得他的巴贝兰大妈，”维达里说，“不应该因为这个打他。”

维达里在桌子上放了八个五法郎的金币，然后对我说：

“该上路了。走吧，小朋友，走在卡比前边。向前走！”

我伸出双手求他，接着又伸着两手求巴贝兰；但是他们两人都掉过头去不理我。我走出了房门。

啊！可怜的家，当我跨出门槛的时候，我好象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一块肉。我大声叫着：“妈妈！巴贝兰大妈！”

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呜咽地哭着，叫不出来了。

“走吧，雷米，向前走吧，我的孩子，”维达里说，他拉住了我的胳膊。

我跟在他身边走着。幸好他并不加紧他的脚步，我甚至还相信他是故意跟我走得一样慢。

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沿着山盘旋上去，走到每一个转弯的地方，我都看得见巴贝兰大妈的房子，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知道我们走到最后一个转弯的地方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一次那所房子，接着我们在山上再走几步，立刻就什么都完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在我的面前就将要全是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情了。

幸好上山的路很长。可是我们走呀定的，终于走到了山顶。

“你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我对维达里说。

“孩子，你想歇就歇一下吧。”

这时候，他第一次放开了我的胳膊，可是我注意到他同时朝着卡比望了一望，做了一个它懂得的眼色。立刻卡比就跑到我的身后。卡比变成我的看守了，要是我想逃走的话，它准会扑到我的腿上来。

我坐在路边的一道矮墙上面，眼睛都给泪水淌模糊了，我找到了巴贝兰大妈的房子。我的小车子，我的用一根弯树枝做成的犁，全都在那个老地方。

忽然，在从村子到我们的那所房子的路上，我远远地看到了一块白头巾。有些时候，一个人用心来看比用最敏锐的眼睛看还要看得清楚，看得远。我认出了那是巴贝兰大妈，是她，我可以拿得稳是她，我能够感觉到那是她。

我向山下弯下了身子，用尽我的力量大声叫起来：“妈妈！妈妈！”

维达里这时候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爬上矮墙，看见了那块白头巾。

“可怜的孩子！”他低声说。

“啊！我请求你放我回去吧，”听了他这句同情我的话，我鼓起了勇气，大声说。

但是他握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路上。

“卡比，日比洛！”他叫了两声。于是那两只狗就团团地围住了我。

路上

花四十个法郎买小孩的人，并不见得一定都是吃小孩的妖怪。维达里并不想吃我，在那些买小孩的人当中，这是一个很少有的例外，他不是一个坏人。我们走了一刻钟以后，他松掉了我的胳膊。

“现在，”他说，“你在我身边慢慢地走吧；不过别忘记，要是你想逃走的话，卡比和日比洛很快就会追上你，它们的牙齿可尖得厉害呢。”

我叹了一口气。

“你很伤心，”维达里继续说，“我懂得你的心情，所以一点也不怨你。要是你想哭的话，那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吧。不过你得明白，我把你带走，对你说来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事。不然的话，你会变得怎么样呢？你很可能进孤儿院。把你抚养大的人不是你的父母。你叫做妈妈的那个女人对你很好，很爱你，可是她不能违背她丈夫的意思来养你。她这个丈夫，也许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凶。他生活发生了困难，又不能够干活，他总不能让自己饿死来养活你呀。想一想我对你说的话吧，我的孩子，你会看到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太苦的。”

话说回来，这一个个子高大、很是神气的白胡子老头，也许是不象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吧，要是他做我的师父的话，也许他不会是一个怎样残忍的师父。

我们在凄凉的荒野里走了很久：经过的不是荒地，就是荆棘地。

我还是第一次一口气走这样长的路，中途一点儿没有休息。

我的师父跨着均匀的大步向前走着，有时候把小宝贝扛在肩膀上，有时候把它放在他的背包上。几只狗绕着他，快步地走着，不离开他的左右。维达里不时地向它们说一两句亲切的话。有时讲的是法国话，有时讲的是意大利话。

师父也好，几只狗也好，好象都没有想到疲劳。但是我却不是这样了。我力气都用完了。我一步一步地拖着前进，用了好大的劲，还简直没法跟上我的师父。

“你穿了木鞋走路所以感到累，”他对我说。“到了于赛尔，我买一双皮鞋给你。”

皮鞋！我真太高兴了。是的，我的师父的确不是一个凶恶的人。于赛尔还有那么远，真是气人！虽然走完了五十多里路我就可以得到皮鞋，我却好象不能再走这样远的路了。

幸好老天帮了我的忙。我们动身的时候天是碧蓝的，现在慢慢地乌云多起来了，没有一会儿工夫，下起了细雨，一直下个不停。

维达里穿了羊皮背心，雨倒淋不湿他，他还可以把小宝贝裹在背心里躲雨。小宝贝一看见雨落下来，早就赶快钻到了师父的袖子里去了。可是几只狗和我没有一点儿东西遮盖，不久我们身上就都淋湿了。

“我不愿意无缘无故地让你淋雨，把身体淋坏。”维达里说。“那边有一个村子，我们上那儿去过一夜吧。”

但是这个村子没有旅馆，他带着的一个小孩和三条狗一个个满身全是污泥，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象这样一个讨饭样子的人。“这里不能住人。”每个人都对我们这样说。最后，有一个农人比他的邻人心肠好，他愿意打开他的粮仓的门，让我们住。于是我们总算不用在露天过夜了。

维达里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每次出门随身总带着吃的东西。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个大面包，把它分成四份。

我在巴贝兰大妈身边过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并没有受到什么宠爱，然而眼前发生的变化却使我感到难受。啊，巴贝兰大妈煮的热汤多好吃哟！壁炉里的火使人多么舒服哟！我是怎样钻进被窝，把它拉得高高的，蒙住半张脸的哟！但是，唉，现在垫的盖的都没有了，我们能够睡在用羊齿叶铺的床上应当说是非常幸运了。我累得要命，脚也给木鞋子擦破了。穿了一身湿衣服，我冻得直发抖。往后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吗？在雨里不停地走，睡在粮仓里，冻得发抖，只吃一块干面包当晚饭，没有一个人怜惜我，没有一个人爱我，并且再也看不见巴贝兰大妈了。

我难受地想着，心里很忧伤，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时候我忽然感到有一股热气喷到我的脸上。我伸出手，摸到了卡比的象羊毛似的毛。

它在羊齿叶上很小心地走，轻轻地走到我的身边。它嗅着我，轻声地吸气。它来干什么呢？它紧挨着我躺下，开始温柔地敌我的手。它对我这种亲热的表示，使我万分感动。我稍稍坐起来，吻了吻它的冰冷的鼻子。

它低声叫了一声，然后，它迅速地把前脚放在我的手上，不再动了。这时候，我忘记了疲劳和悲伤，我塞住的喉咙变得爽快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有了一个朋友。

第二天我们一早又上路了。雨停了，天空是一片蓝色，靠了黑夜刮的猛烈的风，路都吹干了。鸟儿愉快地歌唱着，几只狗在我们前后高兴地跳来跳去。卡比不时地用后脚站起来，对着我叫两声。在它和我当中，语言一点用处也没有，从第一天起，我们就立刻彼此了解了。

我急着要看到一个城市，不过于赛尔却一点也没有使我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说实在的，我要找的不是美丽的风光，只是一家鞋店。

不一会，我就欢欢喜喜穿上了一双上了铁掌的皮鞋，这可要比我的木鞋重上十倍呢。

我的师父的慷慨并不是到此为止，除了鞋子，他又给我买了一件丝绒上装、一条羊毛裤子和一顶毡帽。我一向穿的是布，从来没有穿过丝绒，现在却穿上丝绒了，从前我一直光头，现在有帽子戴了。他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最慷慨、最有钱的人。

我连忙想把这套漂亮衣服穿起来，但是维达里在交给我以前，把它们改了一个样子，这一改使我非常奇怪。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剪刀，把我的裤子的两条裤腿从膝盖那儿剪断了。我呆呆地看着他。

“只有这样，你才会跟别人不相同呀，”他对我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演滑稽把戏的人，应该给人一看到我们的模样就觉得好奇。在日常生活里，外表的打扮是很必要的：这会叫人很不痛快，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好想。”

我的裤子只有到膝盖那样长了。维达里用红线交叉地绕在我的小腿上，把我的袜子扎牢。在我的帽子上，他也交叉地绕上了丝带，他又在上面插上了一簇羊毛做的花。我不知道别人看见我会怎样想，可是我应该承认，我当时以为自己挺神气呢，事实也一定如此，因为我的朋友卡比带着满意的神情对我伸出了爪子。

“现在你打扮好了，”维达里对我说，“我们开始排演吧。明天这儿有集市，我们要大规模地演出，你要初次上台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演戏呀！”我惊惶地问。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要教你。你想想，卡比用后脚走路走得这样优美，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本事，多尔丝跳绳并不是自己高兴跳的，它们花了长时期工夫，练了好多次，才学到了这些本领。好，你也要一样，你应当用功学习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将来跟他们一道演出。我们就开始练起来吧！”

我们排演了将近三个小时，维达里教我们重演了十来次，狗和我都是一样。我看见师父又有耐心又温和，真是惊讶。我们村子里的人对待牲口可不是这样。我们排演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他却没有发过一次脾气，也没有骂过我们一次。

“来，我们重来一遍。”当他的要求达不到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说，“不对，卡比，你太不留心，小宝贝，你该挨一顿骂。”

他就光这样说说，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第二天我们离开旅馆到演出的广场上去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激动。维达里走在最前面，抬着头，挺着胸，用金属笛子吹着一支舞曲，给胳膊和脚的动作打拍子。跟在他后面的是卡比，小宝贝大模大样地坐在卡比身上，穿的是英国将军的军服，红衣红裤，镶着金线饰带，头上还戴了一顶插了根长羽毛的将军帽。再后面，离得相当远的地方，日比洛和多尔丝并排向前走着。我在最后面，做了整个队伍的尾巴。这个队伍走在街上，占了很大的地方。

我们演出的场地很快就布置好了。这是用一根绳子围在四棵树上圈成的四四方方的一块空地，我们就在这里面表演。

最先演出的是几只狗，它们做了几套把戏。看的人很快地多起来，紧紧地围住了我们的绳子。我朝四周一看，看见了数不清的眼睛在盯着我们，好象照过来无数条光线一样。

第一场演完了。卡比用牙齿衔起了一只盘子，抬起前脚走路，挨次地向一个个“贵宾”要钱。遇到有人不往盘子里丢钱的时候，它就停下来，把盘子放在绳子里面、外面人的手伸不到的地方，然后把两只前脚放在那个不肯付钱的人的身上，轻轻敲着他不愿意打开来的口袋。这时候，在观众当中就起来了一阵叫嚷和笑声。终于那些把钱藏得牢牢的人也把钱丢到了盘子里。

在这个时候，维达里是一句话也不说，可是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只盘子，一边用小提琴奏着轻快的曲子。不一会，卡比回到了师父跟前，衔着那只装得满满的盘子，显出挺得意的样子。

“各位太太，各位先生，”维达里说话了，“我们跟着要演出一出动人的喜剧。象我这样的人可不能对自己的戏和演员捧场；我只能对你们说一件事：准备鼓掌好了。”

维达里为了让观众们更加容易明白这几个演员演的戏是什么意思，有时就在一旁说几句话，对大家解释一下剧情。

他低声地奏出了军乐，表示英国将军小宝贝上场了。它的条件允许它有这样阔的排场，所以它要用一个人来服侍它；畜生做人的奴隶做得太久了，现在要翻一下身啦。

小宝贝将军吸着雪茄等着他的用人来。你们真应该瞧瞧它是怎样把烟喷到观众的脸上的！它等得不耐烦了，用脚踏地。它蹬第三下的时候，该轮到由卡比带着上场了。在约定好的时候，那只狮子狗朝我伸出前脚，带我走到将军身边。

将军看到了我，不高兴地举起了两条胳膊。然后它贴近我的脸朝我望，

一边围着我转，一边耸肩膀。它时样子是那样滑稽，惹得所有的观众都大声笑了起来，他们知道它是把我看做了一个十足的大笨蛋，观众们也当我是一个大笨蛋。自然，这出戏就是编来说明这个笨家伙的各种蠢样子的，每演出一场我都得干出一些傻事来。

“这位将军还以为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总不该那样傻了吧。”维达里说。

我坐到了一张摆好了餐具的桌子前面，在我的碟子上放了一块餐巾。这块餐巾是干什么用的呢？卡比告诉我应该用它。但是怎样用呢？我想了好半天，最后装出一个用它来擤鼻涕的姿势。

这样一来，将军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卡比因为我的愚蠢笑得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这样做下去，一直到将军不耐烦了，才把我从座位上拖了下来，自己坐在我的位子上，吃起原来应该给我吃的饭。啊！将军它可知道该怎样用这块餐巾。它挺熟练地把它摊在膝盖上。它十分潇洒地喝干了那杯酒！

但是这些美妙的表演到最后才产生了一个受到观众一致赞叹的结果：这时候，饭吃完了，它要牙签，我赶快拿给它，它立刻就剔起牙来。于是四面都拍起手来，我们的演出在万分成功中结束了。

到处流浪

维达里老爷的班子里的演员，毫无疑问地都是最有才能的演员——我说的是狗和猴子，不是我——，但是这种才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它们表演了三，四次以后，观众对它们所有的节目就全都知道了。

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可能长期地留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到了于赛尔三天以后，就不得不再上路。就在这一天，我的师父对我说，他要教我读书，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后来，我又请求他教我音乐。因为维达里有些时候也唱歌，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听他唱歌真好象过节一样高兴。

“我多么想唱得跟你一样好，”我对他说，“不过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好像看见他的眼睛湿了。我问他是不是我的话说错了，使他不高兴。

“不，我的孩子，”他用激动的声音对我说，“你没有使我不高兴，恰恰相反，你使我回忆起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美好的过去；你放心，我会教你唱歌的……”

他忽然不说下去了，我猜想他是不愿意再讲这一件事情。但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我却猜不出来。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在对我说来是非常痛苦、非常可怕的遭遇中，我才知道这一个原因。

自然，这些功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上完的，而且我的课程又不象学校里上课的孩子那样有规则。每天我们要赶完我们的路程，路程长短，要看村庄和村庄之间路的远近而定。什么地方能够得到一笔收入，就得在什么地方表演，还得不断地叫三条狗和小宝贝排演它们的角色。我们得自己准备饭，只有在空下来的时候，才能在树底下，或者一堆石头上面读书或者学意大利文，唱歌或者弹竖琴。

我们离开峨维勒山脉以后，又经过了法国南部许多地方。我们旅行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地，一直朝前走，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村子，如果看上去不是很穷的话，就准备妥当大模大样地进去。我替三条狗打扮，替多尔丝戴上帽子，替日比洛穿上衣服，又替卡比眼上贴上一块膏药，因为它要扮成一个老兵，最后我还得逼着小宝贝穿好它的将军制服。但这是我的最困难的工作，因为这只猴子知道得很清楚，穿上这件衣服，接着它就非得干活了，所以它尽力拒绝，想了各种最狡猾的法子来不让我替它穿衣服。于是我就叫卡比来帮我忙，它十次有九次能够制服这个狡猾的猴子。

全班人马都穿得整整齐齐了，维达里吹起了笛子，我们排队穿过村庄。假使那些跟在后面的给我们吸引来的好奇的人相当多了，我们就开始表演，假使人数很少，没有希望得到钱，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有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在一条河的旁边，一个肥沃的平原的中央。我的师父告诉我，到了图卢兹了，我们要在这儿多留些时候。

跟往常一样，第二天，我们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去寻找适合表演的场子。我们找到了很多这样的场子，因为在图卢兹有不少散步的场所，不少当地人叫做“大道”的大马路。我们在一条这样的大道上停下来，我们刚开始演出，立刻就引来了一大群观众。

不幸，负责管理这条大道的警察看到这个场面很不高兴，他叫我们不要再演出“吃泻药的病人”。也许，在我们这样的处境里，遇到这种找麻烦的事情，还是聪明点，让步的好，但是我的师父却不这样想。警察来赶我们的时候，他不服从他。

“可敬的当局的代表，”他对警察脱下帽子说，“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这一个当局所颁布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禁止象我们这样的下等的卖艺人在这个公共广场上表演他们的可怜的本领。”

“应该给狗戴上嘴套，”警察凶狠地说。

他的干涉引起了观众的不满，很多人都反对他这样做。但是维达里挥了挥手，请大家静下来。他脱掉了毡帽，帽子上的羽毛都落到了地面。他走到警察跟前。

“可敬的当局的代表，真的是说我应该把我的演员都戴上嘴套吗？”他问，“把卡比，日比洛，多尔丝都戴上嘴套！可是老爷，您就不想一想！闻名全世界的大医生卡比能够把药给它的病人吃吗，要是把病人的嘴上套上一个嘴套的话？老爷，允许我提醒你，药要是能生效，那就得吃到嘴里去才行。卡比医生在这些尊贵的观众前面绝不会答应别人教给它另外一种方法的。”

听到这番话，观众爆发出一阵发狂的笑声。很明显，观众都在称赞维达里，讥笑警察，大家特别高兴看小宝贝的怪样子，它站在“当局的代表”的后面，朝着他的背做着各种怪样子，跟他一样叉起胳膊，把头往后一仰，那种神情和动作真太叫人好笑了。

“如果你的狗明天还不戴嘴套，”警察叫着说，“我就要告你了。”

“那就明天见吧，老爷，”维达里说，“明天见。”

我以为我的师父要去买几个嘴套给狗戴，但是他却没有去买。

“难道你以为我真要替它们戴上一副铁架子吗？”他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他对我说第二天我先一个人表演，他等警察来了，才带狗上场。我不大喜欢这样做，不过这是很清楚的，我的师父打好主意要开警察一个玩笑，我也没有机会请求他不要这样做。

第二天，我刚刚把场子上四面的绳子圈好，许多人就围拢来了。昨天亲眼见到那场纠纷的人，今天又来了，并且还带了朋友来。

小宝贝第一个看见警察，它立刻把一只手叉在腰上，开始走过来走过去，挺着胸，显得威风凛凛，挺神气，可是那样子又是那样滑稽。

观众哈哈大笑，一连拍了好几次手。

我不想激得警察生气，就叫小宝贝，可是它却一点不愿意服从，这样的模仿使它很快乐，它继续走来走去；当我想去捉它的时候，它就避开了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警察却以为是我在鼓励猴子这样做。他急忙跨过了绳子，打了我一记耳光我觉得自己几乎被他打得跌倒了。

当我站稳了的时候，重新睁开了眼睛，维达里不知道怎样的已经站在我 and 警察的当中，握住了警察的手腕。

“我不许你打这个孩子，”他说，“你刚才干的事情是卑鄙的。”

警察气疯了。我的师父非常威风，显得很庄严。我以为警察在他这种态度前面，会钻到地底下去了，谁知他非但没有钻，反而用力一挣，挣脱了那只手，反过来抓住了我的师父的衣领，粗暴地推着他往前走。

维达里十分愤怒，挺直身子，使劲打他的手，想挣脱身子。

“你给我逮捕了，”警察说，“跟我上局里去。”

维达里恢复了镇静。他一句话也不争，向我转过身来。

“回到旅馆里去吧，”他对我说，“跟狗一起待在旅馆里，我会送消息来给你的。”

他不能再说什么了，警察拖走了他，留下了我孤零零一个人。

这时候我才看到我的师父是想用什么方法来使观众们欣赏他开的玩笑：狗的嘴上套的是丝带子！但是我却没有心情笑了。

我回到旅馆里，心里又焦急又难受。我听人说起过监牢，这一次我的师父要在牢里关多少时间呢？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呢？

我在忧虑当中过了两天，不敢开门。

到了第三天，终于有一个人给我带来了维达里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给关在牢里，星期六要在轻罪法庭受审。

我经过打听，知道一般审判从十点钟开始。星期六九点钟我就到法庭去，靠着大门等候，我第一个走进了法庭。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我看见有不少人是我认识的，上一次师父和警察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也在场。

我不知道法庭究竟是怎么回事，法官是怎样的人，不过心里总觉得非常害怕。虽然受审的是我的师父，不是我，我却好象也在危险当中。

第一个受审的不是我的师父，但是后来两个警察终于押着他出来了。最先说了些什么话，别人问他些什么，他回答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的心里真太乱了。

我以为我的师父要给放出来，可是没有。庭长用庄重的声音说叫维达里的这个人由于侮辱和殴打公安警察，判处两个月徒刑，罚款一百法郎。

两个月徒刑！我眼睛里全是眼泪了，从泪花中看见维达里当初走出来的那扇门打开了，他跟在警察后面走进去，然后门又关上。要分离两个月！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船上

我回到旅馆里，心里很难过，眼睛哭得通红，我看到旅馆老板站在院子的门口朝着我不住地看。

“我想，你总有钱过活，和养活你的动物吧？”

“先生，我没有钱。”

“那末，你指望我让你住在这儿吗？”

“啊，不，先生，我不指望任何人。”

这的确是真的，我不指望任何人。

“好的，我的孩子，你说得对，你应该离开这儿。带着你的狗你的猴子滚吧，你会在那些村子里找到活干，生活下去的。”

我知道什么请求都是没有用的。我走进马房，解开三条狗和小宝贝的链子，把我的背包扣好，并且把竖琴的皮带套在肩膀上，然后走出了旅馆。我急着要离开城里，因为我的狗都没有戴嘴套。万一我遇到一个警察，怎样回答他呢？三只狗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一边抬起头来看我：它们饿了。小宝贝，我让它蹲在背包上面，它摸摸肚子，这一个手势比起狗的眼光来更明显他说明它肚子饿。我也一样饿呀，我也会喊饿，不过这有什么用呢？在我的口袋里有十一个铜板，我们走到了第一个村庄，在那里我只花了八个铜板给大家吃一顿中饭，这顿饭是相当可怜的。然后，我们想做第一次没有维达里参加的演出。但是没有一个人跑来看我们。我白白地弹了半天琴。日比洛和多尔丝也白白地跳了好久舞。人们都待在家里不出来。

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人，他向我走过来。我觉得有了希望，唱得更加响了。

“什么人允许你在我们村里的广场上唱演的？”他对我叫着说。

这个人原来是一个乡警。我吓得连忙低头逃走，三只狗跟在我后面一起逃。

夕阳的玫瑰色的余辉已经消失了，我们还没有找到过夜的地方。我打算停下来过夜的对候，我们正走到一座树林里面。这个地方很冷静，很荒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得到更好的地方了。

在睡觉以前，我对卡比说，我要它保护我们，这只狗于是就象哨兵一样守卫着。但是我并没有立刻就睡着，我虽然很累，然而更觉得烦恼。我又饥又渴，口袋里只剩下了三个铜板。我尽管在口袋里不停地摸它们，但它们并不会多起来：一个，两个，三个，数来数去总是三个。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接着我忽然哭起来。

我伏在地上躺着，低声地哭，不能够停止，这时有一条柔软而又暖和的长舌头舐起我的脸来。这是卡比，它来安慰我，就象我开始流浪的第一个晚上那样。我抱住了它的脖子，亲它的湿润的嘴，这时候它低低地哼了两三声，我觉得它好象在跟我一道哭。

我一觉睡醒，天已大亮了，卡比坐在我的前面对着我；鸟儿在叫着：远处，响起了晨祷的钟声，升得高高的太阳射出了鼓舞人的光芒。

我们很快地打扮好了，又上了路，我们朝着钟响的地方走去。我已经打定好了主意：把我的三个铜板用掉，以后的日子再讲吧。

到了村子里，我用不到再去问面包店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鼻子就把我们引到了面包店那儿。三个铜板的面包大家分一分，每个人只分到了一小块！

得想办法在白天赚点钱了，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想找一个适合表演的地点，突然我听到背后一阵叫声，转过身来一看，一个老太太在追日比洛：因为我一心在找地方，没有注意，日比洛就乘机跑到一家人家里面，偷了一块肉，衔了出来。

“有贼呀！”老太太大声叫道，“捉住它！把他们都捉住！”

我感觉到我的狗做了错事我是要负责任的，于是我赶紧跑。卡比和多尔丝看见我逃，也不落后，我觉得它们紧跟着我，我背在肩膀上的小宝贝紧紧抱住我的脖子，恐怕跌下来。我们一转眼就跑到了旷野里，至少跑了四里路我才停住脚。这时候我回过头来看，后面没有人跟我们。卡比和多尔丝一直跟在我的后面，日比洛远远地落在后面，它一定在半路上停下来吃它的那块肉。

我叫它，但是日比洛知道它将会挨一顿严厉的处罚，所以站在那边不动，接着，它不但没有向我走来，反而逃掉了。做了坏事的应该受到处罚，否则，纪律还有什么用呢。我叫卡比帮忙：“去替我把日比洛找来。”它跑开了

我一心等着卡比和它的犯人回来，这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何必急呢，我不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去，我又没有什么事好做。

巧得很，我待的地方非常适合等待和休息，我发疯一样地奔跑，糊里糊涂地跑到了南方运河的河边。从图卢兹动身，穿过了许多布满尘上的田野，我现在来到一片满是绿色的凉爽地方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我还没有看见它们俩回来，我开始焦急起来。这时候卡比独自一个出现了，低着头。它带着害怕的样子卧在地上。我朝它一看，看到它一只耳朵上都是血。日比洛没有听这个警察的话，卡比迫不得已地遵照了它认真对待的命令，也许跟它打了一架吧。要责备它吗？我没有这个勇气。我在一棵树底下躺下来。时间不停地过去，日比洛却一直没有出现。我叫它，我吹口哨唤它，都没有用。它饱饱地吃了一顿，准是躲在什么小树下面，安安静静地消化肚里的食物了。

我的处境变得很困难：假使我走了，它非常可能迷路，再也找不到我们，假使我留下来，却又找不到赚几个铜板吃顿饭的机会。

虽然日比洛做了坏事，而且连累大家都陷在这样可怕的境地，但是我却不能想到把它丢掉。如果我没有把我的师父的三条狗带还给他，他会怎么说呢？而且，不管怎样，日比洛这个淘气鬼，我很喜欢它，我决心等它一直等到天黑；但是不能够就这样待着，什么事也不干呀。应该想出点主意来好让我们四个都有事干，散散心。如果我奏一个愉快的曲子，也许我们会忘掉肚子饿吧？不管怎么样，这样一来对我们来说时间也会过得快些。

我拿起了竖琴，背朝着运河，把我的演员的地位安排好，然后奏起了一只跳舞的曲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几个演员都好象不很情愿，可是后来渐渐地音乐产生了效果，我们都忘记了连一片面包都没有了。

忽然我听见背后发出了一个清脆的声音，一个小孩叫喊的声音：“好极了！”我赶快掉过头去看。在运河当中停了一条船，船头转过来朝着我这一边的河岸。两匹拉纤的马在休息。

这是一条奇怪的船，象这样的船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它比那些在运河里航行的普通的船要短得多了。在它的比水面稍微高出一点的甲板上，搭了一个玻璃棚。在玻璃棚的前面，是一个用藤蔓遮荫的平台，在平台上我看见两个人：一个还很年青的太太和一个孩子，那是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

叫“好极了”的一定就是这个男孩。

我从诧异中平静下来，举起帽子，朝这一个向我喝采的人道谢。

“你愿不愿意再表演一次？”那位太太抬头问我。

我多么愿意表演啊！表演给来得这样合适的观众看！我不用请求，就拿起了竖琴，开始弹一首圆舞曲。立刻卡比抱住了多尔丝，合着拍子旋转起来，接着我们把全部节目一个个都表演了。我们一点也不累。我的演员们自然知道它们的辛苦将会换来一顿饭吃。它们也跟我一样卖力气。

正在我们表演节目的中间，忽然我看到日比洛从一堆小树丛里走出来，它的同伴经过它身边的时候，它老着脸皮跑进来参加了演出。

我弹着琴，照管着我的演员，一边还不时地看那个孩子，真奇怪，虽然他对我们的表演觉得非常高兴，但是他却一动也不动。他一直躺着，完全直挺挺地，只有向我们鼓掌的时候才动一动两只手。他好象捆在一块木板上一样。他的脸色苍白，带着病态。

“你的表演要付多少钱？”那位太太问我。

“观众们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

“妈妈，要多给他们一些钱。”那个孩子说。

接着，他又说了几句话，他说的语言我一点也不懂。

“亚瑟想叫你的演员到他跟前来给他看看。”那位太太对我说。

我对卡比做了一个手势，它跳到了船上。日比洛和多尔丝跟在卡比后面也上去了。

“猴子呢？它很坏吗？”

“它有时不大听话，我怕它会不守规矩。”

“好，那就请你跟它一同上来吧。”

那位太太这样说了以后，便对一个站在舵旁的人做了一个手势。那个人立刻走到前面来，向岸上搭上一块木板，这样我就能走上船去，不用冒险往上跳了。我背着竖琴，手上抱着小宝贝，庄重地走到船上。

我走到那个小孩子的身边，他抚摸着小宝贝，这时候我能够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了，他正象我当初猜想的那样，的确是捆在一块木板上。

“我的孩子，你有父亲吧，是不是？”那位太太问我。

我在回答她以前，犹豫了一会儿，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一位太太能够象她这样引起我的敬意的。可是她对我说话的时候，态度是那样的和蔼，声音是那样的温柔，眼光是那样亲切，那样鼓舞人，因此我决定把我的遭遇一五一十地都告诉她。在我说话的时候，亚瑟跟狗玩着，但是我说的话他全都听到了。

“你们一定饿坏了！”他叫起来。

这一句话，狗和猴子全都懂，三只狗都一齐叫起来，小宝贝也发狂一样地老摸自己的肚子。那位太太懂得了它们的请求，她说了几句外国话，立刻一个女人就端来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吃的东西都摆好了。

“我的孩子，坐下来吧。”太太对我说。

我用不着别人请我，就赶快在桌子前面坐下来了；三只狗围在我的四周。

亚瑟转过脸去看他的母亲，他们两人说了好半天，说的就是我才已经听见过的那种外国话；小孩子好象在请求一样什么事，而她呢，不打算同意。突然她向我转过身来，非常温和地说：

“我的儿子问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和我们在一块儿。你的狗和你的猴子可

以表演，你呢，要是你愿意，你弹竖琴给我们听。”

我简直没法回答了，拿起这位太太的手吻起来。

她对这种感激的表示，显得很感动，她温和地，甚至可以说是慈爱地用手抚摸我的额头，摸了好几次。“可怜的孩子！”她说。

我的第一个朋友

亚瑟的母亲是一个英国人，她叫米里甘太太。她的丈夫已经死了，我以为亚瑟是她的唯一的孩子——但是不久我就知道了她还有一个大孩子，那个孩子在一个很不幸的情况里失踪了，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米里甘先生快要死了，米里甘太太也病得非常厉害，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她病好起来以后，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儿子也不见了。她丈夫的弟弟，詹姆士·米里甘先生负责寻找这个孩子。但是选中他去寻找真有些特别，因为詹姆士·米里甘的利益和他嫂嫂的利益恰恰相反。如果他的哥哥死后没有孩子，他就可以成为他哥哥的继承人。

不过，詹姆士·米里甘先生从他哥哥那儿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得到，因为，在米里甘先生死去后七个月，米里甘太太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小亚瑟。但是这个小孩很瘦弱，常生病，医生们都说他活不长；他时刻都可能死掉。到了那一天，詹姆士·米里甘先生就会成为他哥哥的爵位和财产的继承人了。因为在各个国家里，继承法不是一样的，英国的继承法允许在某些情况当中，继承的不是母亲，而是叔叔。

詹姆士·米里甘先生的希望因为他的侄子的出世，一时无法实现了。但是他并没有绝望，他只有等待。他就等待着。

不过医生们的预言一点也没有成为事实。亚瑟虽然老是生病，但是没有死；他母亲的细心照顾使他活下来了。有好多次，别人都以为他完了，然而他都得救了。

在最近，他生了一种叫髌关节结核的可怕的病，病的部位在腰部。医生关照说治这种病要洗温泉，米里甘太太就带了他到比利牛斯山来，但是试了温泉浴并没有用，医生又建议采用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就是让病人老是躺着，不给他的脚踏到地上。

于是米里甘太太就造了天鹅号，这就是我上来的这条船的名字。亚瑟不能够走路，就应该让他住的房屋代替他走。

第二天早上，没有提到表演的事。米里甘太太把她的儿子放在阴凉地方，给了他一本寓言念，然后就走开了。亚瑟开始看起书来。他的确念得很专心。可是专心的时间并不长，他的一双眼睛就东张西望，后来看到了我。我走到他的身边。

一刻钟以后，他的母亲突然走到我们背后。他先很不高兴，因为她以为我们在一块儿光在玩耍；可是亚瑟没让他说出两句话，就开始洋洋得意地背起他的寓言来，既不吞吞吐吐，又没有一点儿错。我朝米里甘太太看。她的美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她的眼睛里好象有了眼泪。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地位起了一种变化。前一天，别人把我当做一个领着动物来给一个生病小孩消遣的人，可是在上了这一课以后，我成了他的同伴了，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朋友了。亚瑟对我有一种热烈的友情，而我呢，我甚至于把他看成了我的亲兄弟一样。我感到多么快乐啊，我多么需要别人爱我！我不敢公开表示奢望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幸福，我有时自己禁不住要羡慕亚瑟，想得到他母亲、那位我只敢碰碰手的美丽的太太给他的爱，遇到这种时候，我就伤心地对自己说，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母亲来拥抱我或者让我来拥

抱她了。我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辈子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正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更加珍视米里甘太太和亚瑟亲切地对待我时我尝到的快乐。

然而这种新生活对我说来不管多幸福，不久以后我还得放弃它，重新过从前的生活。师父出狱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师父出狱这件事真是叫我又喜又忧。我们离图卢兹愈远，这个念头就愈使我心里难过。

坐在船上旅行是多么快乐啊，既不用费力气又没有烦恼；但是要沿着河步行回来，这就不大多易了。没有温暖的床睡了，没有奶油和糕点吃了，晚上也不能围着桌子谈天了。特别使我伤心的是要离开亚瑟和米里甘太太，得不到他们的爱了。我要失去他们，如同我从前失去巴贝兰大妈一样。难道只有应该和我分开的人，我才能爱他们，他们才能爱我吗？我真想跟他们在一起待一辈子。

这种担忧可以说是这些欢乐的日子里的唯一的乌云。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米里甘太太，我问她我回到图卢兹去她估计要走多少天。亚瑟大声叫起来。

“我不让雷米走！”他说。

我回答说我是属于我的师父的。我提到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我没有说他们不是我亲生的父母，因为那样说的话，就得承认我是一个给人拾来的孩子了。

“我非常喜欢把雷米留下来，”米里甘太太说，“但是要留住雷米，先得他自己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的师父得答应放弃他对于雷米的应享的权利。雷米在回答我话以前，应该先考虑考虑我向他提出来的，不单单是要他往后仅仅过一种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还得学习，跟着亚瑟一起学习；应该比较一下学习好呢，还是在大街小巷里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好。”

“用不着比较，”我说，“我向你保证，太太，我知道你的建议对我多么有益。”

“我写信给维达里叫他到塞特来找我们，”米里甘太太继续说。“我把路费寄给他，我希望他能够上我们这儿来。要是他同意我留下雷米的请求，那就只要跟雷米的父母商量了，因为也应该问问他们的意见。”

这后面几句话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我做的美梦当中拖到了悲惨的现实里，问问我的父母的意见！那他们准会说出来我一直想隐瞒的这件事。真情将会暴露。一个拾来的孩子？这样一来，亚瑟也好，米里甘太太也好，都不愿意要我。

在写信给我的师父三天以后，米里甘太太收到了一封回信。维达里说他在星期六坐火车到塞特来。我带了狗到车站去接他。

我的师父在监狱里老了不少；背也驼了，脸色苍白。

“怎样，孩子，你看我变了样子了是不是？”他对我说。“监狱是一个很坏的住所，烦闷是一种可怕的病。”接着他改变了话题，说：“写信给我的那位太太，你是怎样认识的？”于是我就把我怎样碰到天鹅号的经过告诉他听。

“这位太太在等我吗？”他问。

“是的，我带你去见她。”

“不用你带。你跟狗和小宝贝留在这儿等我。”

为什么他不愿意他跟米里甘太太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呢？我一直到看见他回来，还没有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去跟这位太太告别吧。”他对我说，“我在这儿等你；我们十分钟内就动身。”

我非常犹疑，这一个决定使我心里烦乱，不知道怎样才好。“你跟她说过……”我问。

“我说你对我很有用，我自己呢，对你也很有用；去吧，去了就回来。”

听了这个话我稍许有了点勇气，因为我原先在猜想师父说十分钟内就要走，是由于师父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我的身世的秘密。我走进米里甘太太的房间，看见亚瑟在哭，他的母亲低下身子在安慰他。

“我刚才请求你的师父把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她对我说，听了她那种说话的声音我的眼睛里不禁充满了眼泪，”但是他不答应，无论怎样说他都不同意。”

“他是一个坏人！”亚瑟说。

“不，他绝对不是一个坏人，”米里甘太太继续说，“你对他很有用，而且我相信他真心爱你。同时，他说的话是一个正直的人说的话，不象他那种身分的人说的。他解释他为什么拒绝我的请求，这就是他说的，我爱这个孩子，他也爱我；我教他在我身边学习怎样过艰苦的生活，对他说来，这比起你叫他离开我过那种其实是奴仆的生活要有用得多了。

“我不愿意雷米走，”亚瑟重复说。

“可是他应该跟他师父走；不过我希望不久他就会离开他的师父。”

我走到亚瑟身边，抱住他，一连吻了他好几次，在我的吻里，有我对他的全部友爱。接着，我挣脱了他的紧紧的拥抱，回到米里甘太太前面，朝她跪下，亲了亲她的手。

她吻了我的额头，我急忙站起来，赶快朝门口走去。

“亚瑟，我会永远爱你！”我呜咽得不能成声地说。“还有你，太太，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一分钟以后，我就到了我师父那儿。“上路吧！”他对我说。

这样，我就离开了我的第一个朋友，又开始过流浪的生活。如果不是我过分夸大了一种可恨的成见造成的结果，傻里傻气地瞎担心，这种流浪的生活是可以不用再过的。

雪和狼

我又得跟在我的师父后面，一步步沿着大路走着，肩上的竖琴背得发疼。我又得在公共场所指挥几个动物表演，笑啊，或者哭啊，来让“贵宾”取乐了。

这一个变化真是可怕，因为一个人对于舒服和幸福的生活总是很快就会习惯的。

我一直都觉得万分的悲伤，幸好我还有一件可以使我感到安慰的事情；那就是维达里待我比从前亲热得不知道多少倍！我觉得我在世界上并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我的师父待我真超出了师父的范围，好象父亲一样。

从塞特动身以后，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谈起米里甘太太；但是后来渐渐地我们的谈话中间就谈到她了。我的师父总是第一个谈她，不久，我们每一天就都要提到米里甘太太的名字。

“你非常爱这位太太吗？”维达里对我说，“是的，我知道这件事；她待你是太好了；想到她应该感激她。”后来他常常说：“应该那样做的！”

应该那样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从前拒绝了米里甘太太叫我留在她身边的建议。现在我的师父一定想到了这件事情了，所以在他说的这句话里带有后悔的意思。

我已经说不出的失望，好象是为了要增加我的失望似的，天气变得愈来愈叫人讨厌了，季节变化得太快，冬天又到了，在雨里走路，在泥泞中走路，一天比一天困难。师父的计划是尽快地赶到巴黎去，因为只有在巴黎我们才有机会在冬天表演表演；但是，或许他的口袋里没有钱，不允许我们坐火车，或许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是步行着去的。离开第戎以后，我们遇到潮湿的冷天气，接着，雨停了，又吹起了北风。

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叫苦。维达里把小宝贝紧紧地裹在自己的外套底下，让它能得到一点自己身上的热气，狗呢，对干燥的气候却很高兴，在我们前面跑着。不幸，天上布满了大块的乌云，太阳整个儿不见了，这说明要下雪了。

我有点儿焦急起来。不过我并不知道暴风雪是怎么回事。可是用不着等好久我就懂了，而且从此以后也永远忘记不了了。

从西北方刮来的云愈刮愈近了，从云里射出一道白光，照亮了天空，云层微微地敞开，天下雪了。

“我们遇到一家人家，就进去躲一躲。”维达里说。

这句话真叫我高兴，可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会收留我们的人家呢？在大雪还没有把我们裹在它的灰白一团里的时候，我还能够要看多远就看多远，那时候我没有看见一家人家，没有看到一点象是有村庄的地方。恰恰相反，我们正要走进的是一座树林，这座树林望进去象是没有底一样。

我们慢慢地向前走，费劲地走着，眼睛望不清楚东西，身上湿了，结了冰。我们在树林里走了很多时，但是仍旧找不到一所可以躲一躲的房子。很幸运（应该不应该说是幸运呢？），暴风渐渐地小下去了；可是雪又大了起来。不一会儿，路上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我们在雪上走着，一点声音也没有。

忽然我好像看见在树林当中的一块空地上有一间被雪盖住的树枝搭成的小棚子。它是用粗细树枝盖的，上面屋顶也是树枝盖的；屋顶盖得很严密，雪一点儿也落不进去。

三只狗最先跑进了这间小棚子，在干燥的地上和尘土里打滚，一边发出快乐的叫声。我们也和它们一样觉得高兴。

我走到门口，抖一抖衣服和帽子，免得将棚子里面弄湿。这间棚子里面的陈设真太简单了，只有一条土长凳和几块用来坐人的大石头。可是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是角落里的五六块站着放的围成炉子样式的砖头。火！我们可以生火。火生得很快，明亮的火在我们的炉子里立刻就闪耀起来，发出令人快乐的劈啪的响声。啊！多好看的火！多么暖和的火！

我朝火吹气的时候，三只狗全围着炉子，规规矩矩地蹲下来，伸直了脖子，潮湿的冻坏了的肚子向着火。

小宝贝立刻从师父的衣服里钻出来，小心地伸出了鼻子，看看它到了什么地方；等到它看清楚了以后，就赶快跳到了地上，在火旁边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把两只发抖的小手向火伸去。

一顿简陋的晚饭使我们恢复了精神。我们有了避身的地方，火给我们带来了温暖；我们能够等到雪停了以后再离开。

几点钟了？我不能问师父，因为这几个月来，一点点可怜的收入不够补足他坐监牢打官司花的费用，所以在第戎的时候，为了要买一块羊皮和几样东西，他不得不把他那只表也卖掉了。

“睡吧，”维达里对我说，“到我想睡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我们两人一定要有一个人看守着，不让火熄掉。”

我用不着他对我说两遍就去睡了。我师父叫醒我的时候，夜一定很深了。雪停了；我们的火一直烧得挺旺。

“现在该你看守了，”维达里对我说，“你只要不时地往炉子里添木柴就行了；你看，我已经替你顶备下了这些木柴。”

果然就在我手旁边已经堆起了一堆木柴。他想得实在周到；可是周到的后果却是他想不到的。看见我很清醒，开始执行职务，他就在火旁边伸直了身子，盖了一条毯子睡了，小宝贝紧靠着他。他马上发出了均匀的打呼声，我知道他睡熟了。

我看着这明亮的火，心里很快乐，我看了好一会，可是渐渐地我觉得人累得很。我光是伸出手去往火上添柴，没有别的动作，我不知不觉地竟迷糊过去，我还以为自己是醒着，其实已经睡着了。一阵可怕的狗叫声才惊醒了我。

“什么事？”维达里叫起来，“出了什么事了？你睡着了，火也熄了。”

卡比往门口奔过去，可是没有跑出去，站在门口叫着。它一叫，引起了两三声悲哀的叫声，在这叫声当中我听出来多尔丝的声音。这几声叫声是从我们的房子后面传来的，离我们不远。

我要走出去，师父拉住了我。“先把火烧着，”他命令我。

我听从了他的吩咐，他拿起一根还在烧着的木柴吹着，想把烧成炭的那一头吹燃，木柴烧着了，他举起了它。

“走，”他说，“你跟我后面，卡比，走在前头！”

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片静寂里突然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声，卡比回到我们脚边，露出惊吓的样子。

“这是狼；日比洛和多尔丝在哪儿？”

我回答不出来了。无疑地，当我睡着的时候，这两只狗跑出去了。狼把它们衔走了吗？过去我在村子里听人说过许多关于狼的可怕的故事，可是现在我却并没有害怕。我们走到那块树林里的空地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狗，也没有看到狼。我们只看到在雪地上有两只狗走过的一些脚印。

“去找，去找，卡比，”师父说，并且吹起了口哨，呼唤日比洛和多尔丝。

但是没有狗叫声回答他，没有一点儿声音扰乱树林里的凄凉的沉寂，卡比不再依照吩咐去寻找了，待在我们脚旁边，显得万分的不安。维达里说出了我害怕的事情：

“狼把它们衔走了。”他说，“为什么你让它们出去呢？”

啊！是的，为什么呢？天呀！我没有话可以回答。

“应该去找它们，”我说。

“在这样的黑夜里，在这片雪地上，上哪儿去找呢？”

真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雪积得我们有半条腿深，不是我们两根火把可以把这一片黑暗照透的。

“要是我叫它们，它们不答应，这就是说它们……很远了。”他说。“而且我们不能够冒险去让狼来袭击我们：我们手上一点自卫的东西也没有。”

就这样抛弃了这两只可怜的狗，这真可怕。它们是两个同伴，两个朋友啊。对它们的过失，我觉得我要负责：要是我没有睡着，它们就不会跑出去了。

在小棚子里，又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离开的时候，堆在火上面的树枝都烧着了，烧得很旺，火光照亮了最阴暗的角落。可是我没有看到小宝贝。我叫它，维达里也叫它，可是它没有出来。

维达里对我说他在醒来的时候还觉得小宝贝在他身边，是我们出去以后它才不见了的。我们举起一把燃着的树枝又走出小棚子，去寻找小宝贝的踪迹。我们一点儿影子也没有找到。

我们回到棚子里，想看看它是不是蹲在什么柴堆里。我们寻找了好半天，不时地停下来叫它；找不到它，始终也找不到它。维达里好象很生气，我呢，我是真的难受极了。可怜的小宝贝啊！

“只有等天亮再说。”维达里说。

他在火前面坐下来，两只手抱住了头。

我不敢惊动他。我待在他身边一动也不动，只是把树枝放到火里去。他不时地站起来，走到门口；然后他又走回来坐在原位子上。我觉得宁愿他骂我一顿，也比看见他这样忧郁，这样伤心的好。

星光渐渐淡了，天开始发白；是清晨了，立刻天亮起来。但是因为天亮了，也更冷了。从门口吹进来的风是冷冰冰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小宝贝的话，它会不会还活着呢？再说我们能不能有再找得到它的希望呢？

早晨的寒冷的光线一照出了灌木和大树的影子，我们立刻就出了门。维达里手上拿了一根粗棍子，我也拿了一根同样粗的棍子。

我们正在想寻找地上小宝贝的脚印，这时候，卡比却抬起头，快乐地叫起来；它是叫我们应该往上面找，别在地上找。

果然，我们看见我们这间棚子的顶上的雪，到处都给踩过了，一直踩到一根横在我们的棚子顶上面的粗树枝那儿为止。我们沿着树枝往上看，看见

了在这棵树的顶上的一个树叉里，蹲着一个小小的黑影子。

这是小宝贝，经过的情形是不难猜到的：小宝贝听到了狗和狼的叫声，它吓坏了，就奔到我们的小棚子的顶上，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它从那儿又爬到橡树的顶上，觉得在那上面才安全，于是就蹲在那儿了，我们叫它，它也不回答我们。可怜的小家伙一向怕冷，一定冻坏了。

师父轻轻地叫它，小宝贝却好象死去了一样。“如果你答应，”我说“我去把它带下来。”

我一边爬树，一边轻轻地对小宝贝说话。它一动也不动，可是那双发亮的眼睛朝我望着。我到了它前面，伸出手去想抱它。这时候，它一跳就跳到它师父的肩膀上，躲到了他的衣服里面。

找到了小宝贝，总算不坏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还得去找那两只狗。它们出了小屋以后，就沿着柴堆向前走，我们仔细地跟着它们的脚印走了四五十步。接着，这些印子就看不清楚了，雪全散乱了，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些脚印。这一边的脚印说明了狼大步地跳了几跳，然后跳到了狗的身上，那一边的脚印告诉我们狼把狗推倒以后，就把它衔走了。狗的脚印再也看不见了，只有一行血迹，染红了白雪。

现在用不到再往前面找了，两只可怜的狗已经给吃掉了。而且我们还得赶快回去使小宝贝暖和过来。

我们走进了小棚子，维达里把它的手和脚放在火上烘，我把它的那条毛毯烤热了，然后我们把它裹在里面。可是单单一一条毛毯对它没有什么用，它特别需要一杯热的甜酒，而我们却没有。

我和师父围着火坐着，大家都不说话，一动不动地看着熊熊的火。可怜的日比洛，可怜的多尔丝，可怜的朋友们！

我多么希望维达里责骂我一顿；我甚至想请求他打我一顿，但是他什么也不对我说，他几乎连看也不看我，他朝着火低下他的头。他一定是在想我们失去了两只狗，将来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它们怎么能演出呢？怎么能生活下去呢？

小宝贝先生

“应该去找一个村庄，”维达里站起来说，“不然的话，小宝贝就要死在这儿了；要是它不死在半路上，我们就算运气好了。动身吧。”

毛毯烘得非常暖和，小宝贝全身包在里面，师父又把它裹在怀里，贴着他的胸口。他头一个走出去，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还得把卡比叫走，它老是待在小棚子门口，朝着它的同伴被狼衔去的地方望着。

天上一点云也没有，太阳明亮地照着，洁白的雪反映出苍白的阳光、树林，昨天还是忧郁而阴沉的，现在却非常明亮，发出一种令人目眩的亮光，在雪地里向前走是又困难又费力，我半个身子陷在雪里。最后，在一个山坡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大村庄的白屋顶。我们再做了一番努力，终于走到了。

维达里一直走到了一家旅馆，这家旅馆门口挂着一个金色招牌。在街上，我就已经闻到一股肉汤的香味，我们的肚子早饿了，闻到了这股香味真是舒服。师父装出一副“绅士”的派头，走进了厨房，他帽子也不脱，向旅馆老板要一间有炉子的好房间。老板吩咐一个女用人领我们去。

维达里命令我躺下来，又把小宝贝放在我的床上，嘱咐我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只是听人摆布。它紧贴住我，一点儿也不动。它的身上挺烫人。

师父打算给它喝几汤匙热甜酒，但是小宝贝张不开嘴。它用它那双发亮的眼睛凄惨地望着我们，好象在请求我们不要再折磨它。同时，它向我们伸出了一条胳膊。我正在猜这样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维达里解释给我听了。

在我进班子以前，小宝贝生过一次肺炎，它的胳膊曾经放过血。现在它觉得自己又生病了，所以向我们伸出胳膊来要我们替它放血，象上次那样把它的病治好。

“待在床上吧。”维达里说，“我去找医生。”

维达里怕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物不愿意出来看一个猴子的病，因此事先没有对他说是替怎样的病人看病。医生看见我躺在床上，脸红得好象待放的牡丹花一样，他就朝我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说：“充血。”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被窝稍微掀起了一点，露出了用小胳膊抱住我的脖子的小宝贝，我说：“生病的是它，不是我。”

“一只猴子！”医生叫起来，“你们在这样的天气把我叫来看一只猴子！”

我以为他要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了，但是我的师父是一个灵巧的人，并不是很容易就会失去主意的。他彬彬有礼地，带着庄重的态度留住了医生。他把经过情形告诉他。在师父说话的时候，小宝贝把小胳膊伸出来，伸了有十几次，想让医生替它放血。

“你看这只猴子多么聪明；它知道你是医生，所以它向你伸出胳膊请你诊脉呢。”

这样一来，医生终于答应留下了。他抓住了猴子的小胳膊，把柳叶刀刺了进去，小宝贝连哼也没有哼一声。放好血，接着又敷上了芥子泥，贴上膏药，给它吃药水和煎药。维达里教我这样做那样，我简直变成一个看护了。

可怜的小宝贝喜欢我的照顾。它在没有多久以前，还是那样活泼，那样顽皮，老是想出些花招来捉弄我们，现在却老实得可以做人的模范了。

一天早晨，我陪着小宝贝（我们从来不放它单独地待着），维达里吃了早饭回来，对我说旅馆老板要我们付清欠他的账。付了账以后，我们就只剩

下了五十个铜板。他只想到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在当天晚上演出一次。

没有日比洛，没有多尔丝，没有小宝贝，要演出一次！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得医小宝贝的病，把它的病看好。吃药要钱，烤火要钱，住房间要钱，我们非得马上就有一笔至少四十法郎的收入不可。

天是这么冷，我们的条件又是这样差，在这一个村子里要赚到四十法郎，那可真是费劲啊！可是师父并没有怎样考虑，就匆匆忙忙地去准备演出的事情。我在照看我们的“病人”的时候，他在市场上找到了一间演出的屋子，因为天这样冷在露天里演出是不可能的。他写了一些海报贴了出去。他用一些木板搭成一个戏台，同时他不顾一切地又把五十个铜板全都买了蜡烛，然后把这些蜡烛都切成两段，这样一来，照明的灯光就可以加倍的亮了。

我在想这一次演出能有些什么节目呢，一边想，一边心里真是焦急。不久我就完全在想着这件事了，因为我听到了村子里做广告的人在一边打着鼓一边嘴里宣传着这次演出。维达里不顾一切地在自吹自擂。他说的：“全球著名演员”，那是指的卡比。“天才神童歌唱家”这是指的我。

听到了鼓声，卡比快乐地叫起来，小宝贝也欠起身子。我相信它们两个准是猜到我们要演出了。

小宝贝向我讨它那套英国将军的军服穿。这个可怜的小病人，只有一口气了，但是它的请求是那样热烈，看了真使我感动。它做出了种种神情和姿态，要我们答应它参加演出。但是要是同意它的请求，那就等于送它的命。我们去市场演出的时候到了，我在炉子里添了一些会烧很久的大块的木柴，把火烧得旺旺的。我把在流泪的可怜的小宝贝紧紧裹在被窝里，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维达里把什么都已经准备妥当，现在只要把蜡烛点上就行了，但是只有等到厅里的人快坐满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蜡烛都点亮，不然的话，演出没有完，蜡烛却要点完了。卡比和我化好了装以后，我就走到柱子后面看看来了多少观众。天哪，厅里离客满还早哩。但是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蜡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逼着我们马上就要演出。我第一个上了场。老实说，我应该承认我的演出并不怎样成功。卡比要比我幸运得多，观众对它鼓了好多次掌，掌声都很响。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我在台上跳起了西班牙舞，维达里奏着琴，这时候，卡比嘴里衔着空盘子，在一排排观众的座位中间跑来跑去要钱。它收得齐四十个法郎吗？一想到这个，我就担心。卡比却一点儿也不急，遇到有人不在盘子里丢钱的时候，它就用前脚轻轻敲敲那个人的不肯打开的口袋。

盘子里没有多少钱，还要许多钱才能装满。维达里站起来说：

“我们的蜡烛还没有点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我来替大家唱几首歌吧。卡比在第一次收钱的时候，有几位没有能够打开口袋，下次卡比再来请赏，这几位先生也许就肯施舍几个钱啦。”

虽然维达里是我的先生，可是我却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他真正唱过歌，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听到过象这天晚上这样唱过。当时我还没有判断人家唱得好不好，没有欣赏艺术的能力，可是我可以这样说，我听了师父的歌声禁不住哭起来。

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看出去象是眼前有一层薄雾，我看到在第一排上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在用力地鼓掌。我刚才就注意到她了。这真的是一个年轻

美丽的太太，从她穿的皮大衣看来，我能断定她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

师父唱完了第一首歌以后，卡比就又开始要钱。我看到这个美丽的太太一个钱也没有放到盘子里去。等到维达里又唱完了一首歌，她向我招了招手叫我过去。

“我想跟你的师父谈谈。”她对我说。

这使我有点吃惊，照我意思，这位美丽的太太还是在盘子里面丢几个钱来得好。第二次的要钱跟前一次一样，没有什么成绩。

维达里走到她跟前，向她行了礼，可是态度是冷冷的“打扰你了，很对不起，”这个太太说，“我是想向你表示祝贺。我是一个音乐家，所以我要对你说，听到了象你这样伟大天才唱的歌，我是太感动了。”

我的师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听了发呆了。

“象我这样的老家伙哪里有什么天才！”维达里说。

那个太太朝他看了好半天。然后她在盘子里放了一块金币。

我听到维达里用意大利话低声咒骂了两三句。

我们的道具很快就收拾好了。我们赶紧回到旅馆去。我跑回房间，炉火还未熄掉，但是一点也不旺了，我点起了一根蜡烛。小宝贝直挺挺地睡在被窝里，穿着它那套将军制服。它好象睡着了。我朝它低下身子，轻轻地拿起它的前掌，那是冰凉的。维达里在我身边弯下身去看。

“天啊！”他说，“它死了。要来的果然来了。你看，雷米，也许我不应该把你从米里甘太太那里夺回来的。这的确是因为我做了这件错事，所以受到了惩罚。日比洛，多尔丝死掉了，今天又是小宝贝。事情还没有完呢。”

我们离开巴黎还非常远。我们还得迎着北风走许多积雪的道路。这漫长的行程是多么令人忧郁啊！维达里领头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面，卡比又紧跟着我。

我们这样依次地向前走。队伍不长。我们好几个钟点一句话也不交谈。脸给北风吹得发紫，脚全湿了，肚子里空空的。我很想说话，散散心；但是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维达里只答复我几句简短的话。幸好卡比待我很真诚。我常常觉得走路的时候有一个湿润的热舌头在舐着我的手，象是对我说：“你知道，我在这儿，我是卡比，你的好朋友。”

这时候，我就轻轻地抚摸它，不过没有停下脚步来。

我的抚摸使得卡比得到很大的安慰，它因而忘记了它的同伴的死亡。不过由于从前的习惯，它有时候也会突然地站在路上不走了，想看看那几个伙伴有没有来。不过这种样子并不能维持几秒钟，它想起它们都不在了，于是又飞快地赶上了我们，同时朝维达里看看，请他证明它并没有什么过失，如果多尔丝和日比洛没有来，那是因为它们再也不会来了。

路越走越长，走了一段路又是一段路，终于我们快走到巴黎了。虽然沿途竖的里程碑还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看到来往的车马行人多起来，而且地上的雪也更脏了，我晓得巴黎近了。

我以前有不少次听见别人说起过巴黎的各种奇事，所以常常天真地思量着这些奇事在很远的地方发生的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应该等待的究竟是什么，可是我等待的是神奇的事物：黄金树，大理石宫殿，穿绸裹缎的 시민。

我想问问维达里，不过我又不敢。有一天，从他对我看的那种神情里，我感觉到我就要知道那些我多么想知道的事情了。

“好了，我们的生活就要变样子了，”他对我说。“再过四个钟头我们

就到巴黎啦。”

就在维达里对我说我们快到巴黎的时候，从云里透出了一道阳光，我看到一片金色的反光，象闪电一样，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的确没有猜错，我快要看见黄金树了。

维达里又说：“到了巴黎，我们就要分手了。”

转眼之间，黑夜来临了，黄金树再也看不见啦。

“越是想亲近一些的时候，”维达里继续对我说，“越是得分手，真是不幸。”

“可是，”我胆怯地问道，“你是不是想把我丢在巴黎？”

“不，绝对不是这样；我不能把你丢掉。我曾经答应过我要尽我的力量来培养你。不幸，环境对我很不利。我想到我们还是分开来，不过不是永远分开，而是在这个坏季节的最后几个月里暂时不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决定。我把你交给一个班主，你跟他一直跟到冬天结束。那个班主会雇你跟别的孩子在一起弹竖琴。我呢，教人学吹风笛，拉小提琴，弹竖琴，同时我还要训练两条狗来代替日比洛和多尔丝。到了明年春天，我们两人就可以再一起动身了，我的小雷米，我们就再也不会离开了，因为命运对于有勇气战斗的人不会永远是糟糕的。你等着瞧吧，小雷米，我一点也没有灰心。”

这样一个计划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最适合的了。当我回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认识到师父当时已经想尽了方法来使我们离开那个悲惨的境遇。可是那时候在他对我说的话当中，我只看到我们将要离别时的情景和那个班主的模样。

在我们经过许多村庄和城市的路途中，我遇到过许多这样的班主，他们带着一批孩子，动不动就用棍子打他们。这些班主一点也不象维达里。他们凶狠，野蛮，贪钱，喜欢喝酒，嘴里老是讲着骂人的粗话，手总是举得高高的准备打人。我可能遇到一个这样可怕的班主。而且，即使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好人，那也不是本来的师父了。是不是我总得要离开心爱的人呢？是不是我就不能够找到一个永远能让我爱的人呢？我渐渐地已经把维达里看成象自己的父亲一样了。

我就永远不会有父亲，永远不会有家庭了吗？

到了巴黎

我在一座房屋的角上看到这条路的名字：鲁尔兴路。

维达里好象知道他是往哪儿去，他轻轻地分开了那些挡住去路的人。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走。我们穿过一个大院和一条过道，来到了象一口阴暗的绿色的井一样的庭院里，这个地方太阳光一定没有照进来过。

“卡罗弗里在家吗？”维达里问一个正在晾破衣服的人。

“我不知道，你自己上楼去看看；你知道他住的那个地方。”

“卡罗弗里就是我对您谈起过的那个班主，”维达里一边对我说，一边上楼，楼梯就象在潮湿的粘土里挖成的一样滑。“他就住在这儿。”

街道和房屋已经叫我十分反感。还不知道这个师父是怎样的一个人？

楼梯有四层，维达里没有敲门就把门推开了，我们走进一间很宽大的顶楼里。在房间当中，是一大块空地方，四周围着放了十几张床。是什么样的床啊！没有被单，褐色的被窝该是从马房里买来的，因为给马盖，马也嫌不暖和了。

听到师父的叫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慢吞吞地向我们走过来。

“老爷出去了，”他说，“要两个钟头以后才回来。”

“好吧，你对他说维达里两个钟头以后来看他。”

我想跟师父出去，他拦住了我。

“留在这儿吧，”他说，“你休息一下。”虽然我人很累，我还是情愿跟维达里出去，但是在他命令我的时候，我已经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于是我留了下来。

师父沉重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上以后，那个小孩就向一个大炉子走去，炉子里一些细柴烧得正旺。在炉子上烧着一口铁锅。我走到炉子跟前，看到铁锅的盖子是系在锅子上的，一边有一个铰链，另一边有一个锁。

“为什么锅子要用锁锁住呢？”我问。

“为了一杯汤也不让我喝。”

我禁不住笑起来。

“你这样笑，”他难受地说，“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馋嘴的人。我嘴一点也不馋，只是肚子饿得慌啊。”

“卡罗弗里老爷就让你饿死吗？”

“要是你参加了这儿的班子，替他做事，你就会知道大家没有饿死，也饿得够受的了，特别是我，因为这是一种惩罚啊。”

“一种惩罚！使人饿死是一种惩罚？”

“是的，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你，我的例子对你可能有用处。卡罗弗里老爷是我的叔叔，他发了善心收养了我。我应该告诉你我的母亲是一个寡妇，你能想得到，她没有什么钱。卡罗弗里在意大利到处跑的时候，经过卢卡，他对我母亲提出来要把我带走，我母亲是不愿意让我离开她的，不过她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兄弟姊妹有六个人，我是老大，我就这样跟卡乡弗里叔叔走了；你想想离开家，离开在哭着的妈妈，离开我的小妹克丽丝丁娜，还有我的几个弟弟，我的小朋友和故乡，这叫人多么难过啊……到了巴黎以后，卡罗弗里给了我两只白老鼠，叫我带到人家的大门口和马路上去做把戏，他规定我一天要交给他三十个铜板。差不多别的孩子每天都有钱带回来，我呢，我差不多从来就没有带回来三十个铜板过。三十个铜板，要赚满是非常难的。

缺多少个铜板，就得挨多少下棍子。

“卡罗弗里看见棍子打没有什么用，就想了另外一个法子。‘你少一个铜板，我就在你的晚饭里扣你一个土豆。’他对我说。这个规则实行了一个月，我人变得这样瘦，脸色变得苍白，附近住的人看了都可怜我。有一天，卡罗弗里看到我在一家水果店里喝一盆汤，他明白了为什么我土豆吃得少，却一点也不叫苦。于是他决定不许我再出门，他并且发明了这种锅子。每天早晨他出门以前，把肉和蔬菜放在锅子里面，用锁把锅盖锁上，我什么也不做，就光烧火煮汤：我闻到汤的香味。香味一点也不能饱人，反而教人肚子更饿。我的脸色很苍白，是不是？”

我知道对生病的人不应该说他们有病，那会使他们觉得害怕的。

“我觉得你的脸色并不比别人苍白。”我回答说。

“你对我这样说，是叫我放心。可是我倒非常高兴我自己脸色苍白。你不明白了吧？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要是生了病，别人就会来照料你，或者就让你死掉。如果让你死掉，那不什么都完了吗。我也不会饿了，也不会挨棍子打了。如果不那样，那就有人来照料你，送你进医院。你知道住医院多么好啊。我住过医院，那些护士们说起话来跟妈妈一样……”

我找不到跟刚才相似的理由保持沉默了，不过我还是不敢告诉他，我看了他的象火一样的眼睛和凹下去的面颊，心里有着怎样的感觉。

“我看你的病应该进医院了。”我对他说。

“你终于说出真话来了！”他对我弯下身子行了个礼。他一面跟我说话，一面摆着碟子和餐具。我数了数，有二十个碟子。这就是说有二十个孩子属于卡罗弗里管了。我只看见十二张床，那一定是两个人睡一张。

“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跟这儿一样？”我吃惊地问。

“我不晓得。我从来没有上别的地方去过，不过你还是想法上别的地方去吧。”

“上哪儿去呢？”

“我不晓得。可是你不论到什么地方去都要比这儿好。”

不论什么地方，这是多么渺茫啊；而且，我究竟能有什么法子改变维达里决定好了的事情呢？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门开了，一个孩子夹着一把小提琴走了进来。

到了卡罗弗里的徒弟们回来的时候了，在这一个孩子的后面又来了十个。每一个人进来以后，就把带来的乐器挂在墙上。那些不是演奏乐器的小孩，把他们的土拨鼠或者天竺鼠放到笼子里。

楼梯上响起了一阵非常沉重的脚步声，我感觉得到这是卡罗弗里回来了。接着我看见走进来了一个面孔通红、个子矮矮的人。他一进来先朝我望了一眼，这一眼望得我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马夏，这个小孩是干什么的？”他问。

马夏，就是刚才和我说话的那个小孩，他很规矩地急忙把维达里关照过他的话告诉了他。

“啊！维达里上巴黎来了，他来找我有件事？”

“我不晓得，”马夏回答道。

“我没有在问你，我是在问这个孩子。”

“师父快来了，”我说，我不敢把师父的打算告诉他；“他会告诉你他预备做什么。”

卡罗弗里一进来，立刻就有两个孩子走到他跟前。

一个孩子接了他戴的帽子，小心地把它放到一张床上，另一个孩子给他端来一张椅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种神情是又庄重又尊敬，我从这当中看到他们害怕卡罗弗里到了怎样的程度，因为，那绝对不是师父对他们的爱使他们这样做，使他们这样起劲的。

“现在，我们来算账啦，我的小天使们。”卡罗弗里说，“马夏，账簿呢？”

马夏递给了他一本肮脏的小记事簿，卡罗弗里做了一个手势，一个小孩走了过来。

“昨天你还欠我一个铜板，你答应今天还我的，今天你带回了多少钱？”

那个小孩犹豫了好半天才回答道：“我缺一个铜板。”

“啊！你缺一个铜板，你说得倒这样随便！”

“我缺的不是昨天的那个铜板，是今天的这个铜板。”

“那么是两个铜板了？你是知道规矩的：昨天该打两下，今天该打两下，而且，因为你这样放肆，没有土豆给你吃。李卡多，我的小乖乖，把皮鞭子拿来。”

李卡多从墙上摘下来了一根短柄子的皮鞭，短柄子上系着两条打着一个个大疙瘩的皮带。

所有的小孩都一个一个地走过来交账，又有四个小孩交不出账来。

“他们是五个强盗，偷了我的，抢了我的！”卡罗弗里叫起来。“我待你们真是太客气了！来，把衣服脱下来！”

李卡多手上拿着皮鞭，那五个要受处罚的孩子在他旁边站成了一排。第一下鞭子打在皮肉上的声音使我流出了眼泪。随着第二下的鞭子的响声，那个挨打的孩子发出了一声悲惨的呻吟声，第三下打下去，发出了一声使人心痛的叫喊。

幸好，我再也不会看到这种场面了。通楼梯的那扇门打开了，维达里走了进来。

他在上楼的时候就听到了叫喊声，现在他看了一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跑到李卡多前面，把他手上的鞭子夺了下来，然后急忙走到卡罗弗里跟前，交叉起双手，对他大声说：

“这真可耻！虐待不能自卫的孩子，真下流！”

“老疯子，你凭什么管？”卡罗弗里说。

“因为这是警察禁止的行为。”

“警察，”卡罗弗里说，“你用警察来吓唬我？”

“是的，”师父说，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

“听着，维达里，”这个班主用一种带着嘲笑的声音说，

“用不着发脾气，也用不着用话来吓唬我，因为我也可以这样说的。自然罗，我不会去跟警察局说什么，你的事情和警察局没有关系。但是另外有些人对你的事情会感到兴趣的。如果我去向这些人谈一谈我知道的一些事，如果我说起一个名字，仅仅一个名字，谁会羞得见不得人，找个地方去躲起来呢？”

师父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不回答。他羞得见不得人？我真莫名其妙了。我听了这些不懂是什么意思的话，非常惊奇，我还在惊奇着，师父却拉住了我的手，对我说：“跟我走吧。”

“好拉，”卡罗弗里笑着说，“不要记仇了，老朋友，你想跟我谈什么事呀？”

“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对你说的了。”

师父拉住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下了楼梯。我跟着他走，觉得心里是多么轻松啊！我从卡罗弗里手里逃出来了，要是我敢的话，我真想吻吻师父。

我们走到了街上，街上人很多。维达里向前走着，一句话也不说，不一会，我们走进了一条冷落的小巷，他在一块界石上坐下来。

“打抱不平也许是应该的事，”他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么一来，我们都流落在巴黎的街头上了，口袋里一个铜板也不剩，肚子里一块面包也没有，甚至连到哪里去过夜都还不知道。”

“你本来打算睡在卡罗弗里那儿吗？”

“我是打算让你睡在他那儿的。”

天已经晚了，在白天还不怎样冷，现在却冷得厉害，把人都冻坏了。北风呼呼地吹着，今天晚上真难挨过去啊。

维达里在界石上坐了好一阵，我和卡比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等着他想出一个办法来。后来，他站了起来。

“我们到哪里去呀？”我问。

“到让底伊去，在那儿想法子找一个采石场，从前我在那里睡过。向前走！”

我们又动身走了。夜很黑，路旁的煤气灯，被风吹得火焰直摇晃，照不大清楚地面。我们在冰冻的地上走，走一步滑一步。维达里拉着我的手，卡比紧跟在我们后面，不过它不时地要远远地落在后面，跑到垃圾堆里去找找看有没有一根骨头，或者一块面包皮，因为它肚子也饿坏了，可是垃圾堆全都结成了一团冰块，什么也找不到。它就垂着两只耳朵，又追上了我们。

走完了大街，走进了小巷；走完了小巷，又走上了另外一条大街。我们老是走着走着，一句话也不说。维达里弯着腰朝前走，天虽然冷，他的手却很烫，我好象觉得他在发抖。

“你病了！”我在站住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说。

“我恐怕是病了。今天晚上太冷，我这老骨头实在支持不住了。我真想有一张舒舒服服的床，在炉子前面吃一顿晚饭。可是这完全是在做梦啊。向前走吧，孩子！”

我们出了城，或者至少是离开了有房子的地方。我们有时走在两排墙壁的当中，有时走在旷野里。

虽然天很黑，维达里却好象知道该向什么地方走，我跟着他走，也一点不担心会迷路。我没有别的什么焦急的事情，只是担心我们最后能不能够走到那个采石场。但是，他突然站住了，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丛树林，我回答说没有看见，由于一种说不出原因的惊慌，我说话时的声音是颤抖的。

“我们走错路了吗？”维达里说。

怎样回答他呢？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们往哪儿去。现在我明白我们可能是迷了路了。我觉得自己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维达里拉住了我的胳膊。

在巴黎南边。

当时还没有电灯，路灯是点煤气的。

“我走不动了。”

“你以为我能抱你走吗？要是我们坐下来的话，就不会站起来，全都要冻死在这儿了。走吧！”我继续跟在他后面。

“路上有没有很深的车辙？”

“一点也没有。”

“那我们应该往回走。”

北风本来吹着我们的背，现在迎面吹来了，风是那样猛，我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你要是看到了车辙，马上告诉我，”维达里说，“正确的路应该在左边。”

在黑夜的愁惨的静寂里，我们的脚步踏在冻硬的地面上发出很响的声音。虽然我一步一步地向前移都很费劲，现在却是我在拉着维达里走了。终于我好象看到了一条给车轮压得凹凸不平的路。

“我们得救了，”维达里说，“采石场离这儿只有五分钟的路了，好好看一看，你应当看到树林的。”

我仿佛看到了一团阴影，我说我看出来那是树林。有了希望，我们也就有了气力。可是维达里说的五分钟，在我看来象是长得没有尽头一样。

“我们在这条正确的路上已经走了不止五分钟了，”他停住了脚步说。

“采石场的进口应该在左边，我们也许已经走过没有看见。”

我们再一次回过头走。

“你看见树林吗？”

“看见的，在那边，在左边。”

“车辙呢？”

“没有了。那儿有一道墙。用不用再往前找？”

“不用了，采石场的四面用墙围住了，进口的地方也关上了，没有法子进去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要么就死在这儿，要么就再回到巴黎去。要是我们遇到警察了，就设法让他带我们上警察局去。我本来想避免这样做，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冻死。走吧，我的小雷米，走吧，孩子，拿出勇气来！”

我们又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这条路是我们已经走过的。几点钟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不停地慢慢地走，走了好久好久。天仍然是深紫色的，稀稀落落的几颗星，看上去也比平日小。风卷起了雪，打在我们脸上。

我们要是走得快，也许能够抵抗寒冷，但是维达里喘着气，走一步路都很困难了。我问他话，他也不回答我，他只对我慢慢地做个手势，表示他不能说话了，我们从乡间又回到城里。我们在两道墙当中走着。在墙顶上点着路灯，它们晃来晃去，发出哗朗朗的声音。

维达里站住了，我知道他实在走不动了。

“你愿意我去敲敲人家的门吗？”我问。

“别去敲，人家也不会开的，还是再往前走吧。”

他意志虽然坚决，气力却不够了。走不了几步，他又停了下来。

“我应该休息一会儿了，”他说，“我支持不住了。”

在一道栅栏上开着一扇门，在这道栅栏里面高高地堆着一大堆做肥料的草。风把许多草吹散在路上。维达里对我做了一个手势，叫我把草抬拢来堆

在门口，说他是坐下，不如说他是躺到了这草堆上。

我把能够收拾拢的草都堆积起来，然后我就在他旁边坐下。紧紧靠住我，”他说，“把卡比抱住，它会给你一点儿热气的。”

维达里知道在我们现在这种处境，寒冷会使我们死去的。他肯冒这个险，那他一定是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了。

他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熬过了好多好多次疲劳以后，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太衰弱了，不能再支持下去，因为长期的辛苦、贫穷和衰老，把他的精力都消耗完了。

他对自己的情形清不清楚呢？我从来也不知道。但是，在我把身上的草盖好以后，我紧紧靠住了他。这时候我感觉到他俯下身子，在我的脸上吻着。这是他第二次吻我，也是最后一次吻我了。

丽 丝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睡在一张床上。烧得很旺的火把我睡的这间房间照得亮亮的。我向四周望望。我不认识这间房间。我更不认识围在我周围的人的脸，这是一个穿了灰色上装和黄色木鞋的男人，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惊奇地盯住了我看。

这些眼睛都是陌生的。他们在说着话。

“维达里呢？”我问。

“他在问他的父亲，”最大的一个孩子说，那也是个女孩。

“他不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师父；他在哪儿呀？卡比在哪儿？”

要是维达里是我父亲的话，他们就不会跟我提到他了；可是，因为他只是我的师父，他们就把下面这样一段经过告诉了我：

我们原来躺在一个种花的人的栅栏门口，半夜两点钟的光景，这个种花的人打开这扇门要上市场去，他发现我们睡在草堆里。他一开始先叫我们起来，要我们让他的车子走过去，我们两个人却都一动也不动，只有卡比大声的叫着，保护我们。他摇我们的胳膊。我们还是没动。于是他想到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他拿来了一盏灯，照着看了一会，发现维达里已经死了，冻死了：我呢，也跟他差不多。不过，亏得卡比睡在我的怀里，我的胸口还有一点儿热气，我还能活着，还有一口气。我给抬到了屋子里，放在一个孩子的床上。我睡了六个钟点，差不多就象死去了一样。

把这件事情经过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穿灰色上装的男子，也就是上面说的那个种花的人。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带着惊奇的眼光的小女孩一直对我瞧着。她父亲说到维达里死了的时候，她手指着我，同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充满同情的叹息。

“是的，我的小丽丝，”她的父亲对她弯下身子说，“这使他很难过，不过应该把事实告诉他啊。”

他继续对我说他们怎样去通知警察，他们把我放到床上的时候，维达里就给抬走了。我睡的这张床是他大儿子阿列克西的床。

“卡比呢？”我等到他停下来不说的時候，问道，“那只狗呢？”

“它跟着那副担架走了，一面走一面还悲痛地叫着。我们没有再看到它。”

种花的人和他的孩子都离开了房子，留下了我一个人。

我下了床；不管维达里是死了还是活着，我总要再看看他。

我在床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并不怎样不舒服，可是当我一站在地上以后，就好象要跌倒了。我休息了一会儿以后，才推开了门，走到了种花的人和他的孩子们前面。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身边不远就是火炉。他们正在喝白菜汤。闻到白菜汤的香味，我立刻想到我昨天晚上还没有吃饭。我觉得自己全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我的孩子，”种花的人用一种同情的声音问道。

我回答说我的确觉得不大舒服，要是他答应的话，我想在火炉旁边坐一会儿，不过烤火也没有使我恢复过来。闻到汤的香味，听到汤匙碰到盆子的响声，我觉得更加没有气力了。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小孩她爸爸叫她做丽丝，带着惊奇眼光，一句话没说。她突然站了起来，拿着她那盆盛满了汤的盆子，递给了我。

我正要做一个手势向她表示感谢，但是她的父亲却不让我这样做。“我的孩子，拿着吧，”他说，“这是丽丝给你喝的，一点不错是她给的。要是你想喝，喝完了还可以再添。”

要是我想喝！一盆汤我没有几秒钟就喝完了。我放下了汤匙的时候，丽丝叹了一口气。接着，她从我手里拿过盆子，放到她父亲面前，请他再添满。跟第一次一样，立刻我又把汤喝完了。

“喂，我的孩子，”种花的人说，“你真是一个汤罐子呢。”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起来。我回答说昨天晚上没有吃饭。后来我简简单单地把我的情况让他们知道以后，说：“你们待我真好，我真心真意地感激你们，要是你们喜欢，我以后每星期天上这儿来替你们弹琴，让你们跳舞。”

我一边说一边向门口走去，但是我刚刚走了几步路，丽丝就拉住了我，指着我的竖琴笑着。我知道她要我做什么。

“好，”父亲说，“你弹些曲子给她听吧。”

虽然我没有心情跳舞，也没心情快乐，可是我还是弹了一首跳舞曲子。丽丝先听我弹，随后她用脚打起了拍子，没有一会儿，她好象给音乐吸引住了，身子开始旋转起来。她不是在跳舞，但是她转得很好看，脸上带着非常愉快的神情。我弹好以后，她在我的面前站住了，用一只手指敲着我的竖琴，这一个动作的意思好象是说：“再弹一次吧。”叫我为她弹一整天，我也可以；不过她的父亲说不用再弹了，因为他不愿意她跳得太疲劳。

我背起了竖琴，又向门口走去。

“你仍旧想干音乐师这一行吗？”做父亲的说。

“我没有别的事好做呀。”

“不过，昨天晚上你遇到的事应该使你好好想一想，干这一行是多么苦啊！”

“那自然罗，我也多么喜欢有一张舒服的床睡，有暖和的火烤呀。”

“当然罗，你愿意烤暖和的火，睡舒服的床，并且有工作，是不是？你明白，我并不是要给你一笔什么财产，也不是叫你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要是你愿意留在我们这儿，你得一清早起床，白天要辛辛苦苦地锄地。但是面包总是有得吃的，你也用不着再在露天里睡觉了。你如果是一个好孩子，你会在我们这儿找到一个自己的家的。”

一个家！这样一个可爱的梦想已经幻灭了多少次了！巴贝兰大妈，米里甘太太，维达里，一个接一个地，我全都失去了。从今以后，难道我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的吗；这些男孩将会成为我的兄弟吗？这个好看的小丽丝将会成为我的妹妹吗？

我连忙从身上解开了竖琴的带子。

“好，这就是回答了，”父亲笑着说，“回答得好，把你的琴挂到墙上去，我的孩子，哪一天你要是觉得跟我们在一起不合适，哪一天你就可以再拿下来。”

“我只想出去一次看看维达里。”

“这完全应该，”这个和善的人对我说。

我们倒在门口的这所房子是在格拉西爱路。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种花的人，叫做阿更老爹。他有两个男孩，一个叫阿列克西，一个叫般若曼，他还有两个女孩，艾金勒特是大姐，丽丝是最小的妹妹。

丽丝是一个哑巴，不过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医生们从来没有放弃使

她恢复说话能力的希望，但是他们又说她非要受到一次大刺激才会开口。非常幸运，她的聪明并没有因为不会讲话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的，她年纪这样小，就显得非常的伶俐。

我把竖琴挂在他们指给我挂的钉子上，过了还没有五分钟，我听见门口有一阵悲伤的狗叫声。“这是卡比！”我说，一面赶快站起来。

可怜的卡比，一跳便跳到我的面前，我把它紧紧抱住，它用舌头甜我的脸，同时发出低低的欢喜的叫声。

“卡比怎么办呢？”我问阿更老爹。

他懂得我问的意思，回答道，“卡比跟你一起留下来。”

这条狗也好像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它跳到地上，把右前脚放在胸口上，行了一个礼，这个动作使得孩子们都大笑起来。我本来想叫卡比表演一段给他们看，可是它不愿意。它咬住我的袖子向外拖。

“它是想带你到你师父那儿去，它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阿更老爹把我带到警察局去，局长问了我好多好多问题。别人告诉我维达里确实死了，我才回答这些问题。我所知道的事情很简单，我都说出来了。可是局长老是问我关于维达里的事情，我回答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我也不怎么知道，或者说几乎一点也不知道。然而有一件我认为神秘的事情我本来可以说出来的，那就是维达里那次唱歌使得那一位太太大为惊叹。此外，还有卡罗弗里的那几句威吓的话，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我考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但是，一个小孩想在一个非常内行的警察局长面前瞒住要说的话，那可不容易。不到五分钟工夫，他就使我把想藏住的话和他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了。

“带他到鲁尔兴路去，”他对一个警察说，“你去盘问一下那个卡罗弗里。”

警察、阿更老爹和我，我们三人一起走到街上来。

卡罗弗里看到一个警察，同时又认出了我，他的脸就变得苍白了。他一定觉得害怕，但是等到他从警察嘴里知道了我们上他这儿来的目的以后，他放下心来了。

“啊，可怜的老头子死了，”他说。

“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根本不叫维达里；他本来叫做卡洛·巴查尼，三四十年以前，如果你在意大利住过的话，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卡洛·巴查尼在那个时候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唱家，在我们的大戏院里他的唱歌受到无数人的欢迎。但是有一天他的嗓子坏了。他只希望他本来的好名声不受到影响。于是他改了名字，叫做维达里，带了几条会做把戏的狗到处表演。可是虽然他是这样不幸，他还是非常自负，如果观众知道大名鼎鼎的卡洛·巴查尼变成了可怜的维达里，他是会羞愧得死去的。”

那桩我左思右想始终猜不透的神秘的事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可怜的卡洛·巴查尼！亲爱的、可敬的维达里！

第二天，是埋葬他的日子。但是，第二天我却不能起床，因为夜里我发烧了，热度很高，好象胸口里有火在烧似的，就象小宝贝在树上待了那一夜以后害的病一样。医生请来了，他不需要什么长时期的诊疗，说应该立刻把我送到孤儿院去。

“既然他倒在我们家的门口，”老爹说，“没有倒在孤儿院的门口，那

就该我们来好好照料他。”

艾金勒特照管家务已经忙不过来了，现在还要忙着照应我。她对我照顾得很细心，从来没有感到不耐烦，也从来没有一点儿疏忽的地方，要是她为了家务事不得不离开我，丽丝就来代替她。在我发烧的时候，我有好多次看到她站在床头，一双焦急不安的大眼睛盯住了我，我人烧得神志昏迷了，竟以为她是我的护卫天使，虽然她不能回答我的话，我却把我的希望和我的秘密都告诉了她。从这时候开始，我看起她来总好象她是一个头上围着一圈圆光的理想人物。

我的病生得很久，很难受，有好几次病好了点又重新厉害起来，不过艾金勒特并没有一点厌烦，还是那样耐心，阿更一家人始终待我非常好。

终于我的病好了，但是要等到春天我才能出门。

我的体力也渐渐地恢复了，我能够帮着在花园里做点事情。

这个新的工作最初虽然使我感到疲劳，但是没有好久我就习惯了这种劳动，这种生活跟我过去到处流浪的生活比起来，那是大不相同了。从前是自由自在地乱跑，现在却要关在花园的四堵墙壁当中，从早到晚吃力地干活。但是，我却得到了我原先以为将永远不会得到的东西：家庭生活。阿更老爹把我当做了亲生的孩子，孩子们待我好象自己的兄弟，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我不再是一个弃儿了；我有了自己睡觉的床，我在全家吃饭的桌子上有了自己的座位。

我这样过了两年。老爹时常带我上市场去或者花店去，因此我渐渐地认识了巴黎，并且明白了巴黎不是一个大理石的和黄金的城市，如同我原先猜想的那样，但是它也决不是一个泥泞不堪的城市，就象我从莫夫达区进入巴黎的时候断定的那样，那时候我的判断未免太快了一点。

天主教里保护人的天使。

天主教里说神的头上有一圈圆光。

是巴黎的一个区。

全家分散

有些时候我对自己说：“你太幸福了，孩子啊，这种日子是不会太长久的。”真不幸，我猜想的事情果然非常正确。

阿更老爹在紫罗兰的季节以后，就专心为七月和八月里的节日工作，象圣玛丽亚节和圣路易节都快到了，为了这些节日，我们要准备翠菊，吊钟海棠，夹竹桃，我们的花床和温室能够种得下多少花就种多少。这些花都得上面讲到的时候开放。谁都知道这样做是要有一定的本领的，因为人不能支配太阳，也不能支配时间。

在我的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正快要到非常美好的季节了；我们种的那些花全都到了开花的时间，我时常看到老爹高兴地搓着手。“花季准会很好。”他对他的孩子们说，同时低声笑着，他在计算所有的花卖出去能卖多少钱。

大家都为着这样的目的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因为要酬谢我们一次，决定八月五日，星期日那天，全家到老爹的一个在阿尔古伊住的朋友家里去吃一顿晚饭。连卡比也去。多么快乐啊！我们全都穿起了过年过节才穿的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一路上有不少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们。

那一天的时间过得真快，快得我莫名其妙。在晚饭快吃好的时候，西方的天空上布满了乌云。

“孩子们，得赶快回家了，”老爹说，“要是起了风，花床和温室的玻璃就全都会吹坏了，我先走了，般若曼和阿列克西，你们跟我走。”

这是用不到什么解释的，我们都知道花床和温室的玻璃窗就是种花人的命根子。天越来越黑，在远远的地方响起了雷声，雷声很快地近了。

艾金勒特和我用手拉住了丽丝，拖着她跟着我们一块儿走；但是她跟我们走很吃力。我们能在暴风雨前面赶到家吗？老爹，般若曼和阿列克西能够赶到把玻璃窗都遮护好吗？

突然，下起冰雹来了，一开始先下了很少的雹粒，接着几乎立刻就下起了大冰块，好象雪崩一样地下着；我们不得不在一家人家的大门口躲一躲。我们看到冰雹不断地落下来，真是想象不到的可怕。没有一会儿，路上就盖上了白白的一层。那些冰雹就象鸽蛋一样大。艾金勒特叫起来了：“天啊！玻璃窗全完了！”

我对于物价不大熟悉，不过我常常听他们说一百块玻璃窗的玻璃要值一千五六百法郎，因此我知道了，如果冰雹打碎了我们的五六百块玻璃窗的话，对我们说来该是一场多么严重的灾祸，而且花房和花房里还没有算在里面。

我想问问艾金勒特，但是下雹的声音响得连耳朵也会震聋，我们互相讲话不能够听到，况且，她也不想说话；她望着下雹，面上露出难受的样子，好象看到自己的家遭到火烧一样。

这阵可怕的冰雹下的时间并不久，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乌云就很快地移到巴黎那边去了。我们从门底下走出来。

我们很快到了花园里。是怎样一种景象啊！一切东西都破碎了，毁坏了：

圣玛丽亚是耶稣的母亲，圣玛丽亚节在8月15日。

圣路易是十三世纪法国一个皇帝，圣路易节在8月25日。

阿尔古伊在巴黎附近。

窗户、花、碎玻璃、冰雹混到一块儿，形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早上，这个花园还是这样美丽，种了这么值钱的花，现在，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垃圾了。

老爹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处找他，但是没有看到他，我们走到那个大温室，那儿没有一块玻璃窗是完整的。他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张矮凳上，四周地上全是一些乱糟糟的东西，阿列克西和般若曼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两旁。

“啊！我的可怜的孩子！”他抬头看见我们走近了，叫了起来，接着，抱住了丽丝，一句话没说就哭了。

我立刻就从小金勒特和两个男孩那儿知道老爹为什么会这样悲伤，老爹买进这座花园已经有十年了，他并且自己盖了这所房屋。卖出这块地的人曾经借给他一笔钱让他购置了花匠必需的用具。全部借款连本带息分十五年还清，一年算一次利息。债主在等待机会把这块土地，连房屋和用具一起收去。他一心指望在十五年内有一天老爹还不出钱来。这一天因为天下了冰雹终于来到了。

现在怎样度过难关呢？我们忧虑了没有多久，在老爹应该用卖掉花得来的钱付这一年的本息的第二天，我们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走进我们家来，他交给我们一张贴了印花的纸，他在空白的一行上写了几个字，他是一个法院里送公文的人。

老爹不再待在家里了，他在城里跑来跑去。他跑些什么地方？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一句话也不说了。他上那些做生意的人那里去，自然，他一定也上法庭去。我想到这个就觉得惊慌；维达里也曾经上过法庭，我知道他得到了什么结果。

老爹等他的事情的结果等待了很久，冬天的一部分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修理我们的温室，配玻璃窗，我们在园子里种了蔬菜和一些不用遮护的花；这卖不了大价钱，不过多少总还值几个，而且大家也有活干了。

一天晚上，老爹回家来的时候，比往常更加垂头丧气了。

“孩子们，”他说，“什么都完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已经给判决要付清借款。人家就要来把这儿所有的东西卖掉；然后，如果钱还不够的话，我要被关到牢里去，在牢里关上五年。”

我们全都哭起来了。

“关五年！”老爹又说，“这五年里面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早就想到了这一层了。我打算这样：雷米写一封信给我的妹妹卡德琳·苏里娥，她住在涅夫勒省的德鲁齐，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请她上这儿来；卡德琳很能干，我们跟她一道来商量怎样办。”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信，一开始就写这样的信真是残酷，真叫人难受。

但是卡德琳没有象我们猜想的那样来得快。商务警察，也就是专门逮捕借债还不出的人的那种人倒比她先来了。老爹被他们带去后一小时左右，卡德琳姑母在厨房里看到了我们，她心里悲伤极了。

卡德琳姑母是一个很有见解的女人，她有主意，有魄力。我们听从她来指挥我们，听她的话来做事。大家都感到放心不少。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财产的农家妇女来说，落在她身上的这个担子可真不轻。一家没有父母的孩子，最大的只不过十七岁，最小的又是个哑巴。她到监狱里去跟老爹商量了一下，她事先一次也没有跟我们谈起她的计划和她的打算，在她到巴黎一星期以后，她把她决定好了的事情告诉我们。

要是继续单独干活，我们显得年纪太小了，所以每一个小孩现在得分开来上愿意收留我们的叔伯家或者姑母家去住。丽丝住到在莫万山区的卡德琳姑母家里去；阿列克西住到在塞文山的瓦尔斯的一个做矿工的伯父那儿去；般若曼住到在圣康坦的一个也是种花的叔叔家里去。艾金勒特住到一个已经结婚的姑母家里去，她住在靠海边的夏朗德省的艾斯朗德。

“那我呢？”我问。

“你吗，你可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呀。”

丽丝向前走了几步，合起了两手，她这个手势比说许多话意思还清楚。

“我的可怜的孩子，”卡德琳姑母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要他跟你一起去；但是亲戚好收留，外人怎么收留呢；一点点面包只够一家人吃，哪里还有多余的给别人吃啊。”

卡德琳姑母一点也没有拖延她已经决定的计划；她告诉我们明天就要大家分离了，说完了她就送我们去睡觉。我们一回到自己房间里，大家就围住了我，丽丝扑到我身上哭着。我知道他们虽然对一家分离感觉悲伤，可是更在为我难过。

“听好，”我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我将来也是你们的兄弟，不会改变的。我要重新穿上我的羊皮背心，把竖琴从老爹把它挂上的那根钉子上取下来，我要从圣康坦走到瓦尔斯、艾斯朗德和德鲁齐；我将会一个一个地看到你们每一人，这样一来，你们通过我也能够永远在一起了。我还没有忘记过去唱的歌和那些跳舞曲子；我会自己赚钱过日子的。”

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来那种满意的神情，我知道我的想法实现了他们心里的愿望，我一边悲伤，一边也感到很幸福。

第二天，天刚有一点儿亮，丽丝就把我带到花园里，我知道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表示。她把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伸出去，她是要我了解我应该先去看她的两个哥哥和她的姐姐。

“为什么？”我回答说，“我想先来看你。”

于是她用她的手，她的嘴唇，特别是她的会说话的眼睛，使我懂得了她好象在这样要求我：“因为我想知道艾金勒特、阿列克西和般若曼的消息，所以你应该先去看他们。”亲爱的丽丝！

他们在八点钟就得动身了，卡德琳姑母叫了一辆大马车来装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先要去监狱和老爹吻别，然后上火车站去乘火车。七点钟的时候，艾金勒特也把我带到花园里。

“我们就要分别了，”她说，“我想留给你一件纪念品，你拿着吧；这是一个针线盒，你在里面会找到线、针，还有我的剪刀。你在路上是需要用这些东西的。你看了这个盒子也会想到我们。”

当艾金勒特跟我说话的时候，阿列克西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等到她回到房子里去了，他走到我前面。

“我有两个值一百个铜板的银币，”他说，“你要是肯拿一个的话，那我就高兴了。”

在我们五个人当中，只有阿列克西爱钱，我们老是在讥笑他一钱如命。他的礼物使我心情很激动；我想拒绝，但是他一定要我收下，把一枚发光的好看的银币送到我的手里。般若曼也没有把我忘记，他送给我一把小刀。

时间过得真快。马车的响声已经听得见了，丽丝对我招招手叫我跟她上花园里去。她走到一株玫瑰花那里，折下了一根枝子，接着再把它分成两半，

每半根枝子上都有一个快开放的小花蕾，她给了我半枝。

“丽丝！丽丝！”姑母在叫了。行李都已经放在车子上了。

我背上了竖琴，唤来了卡比，它看见了我从前穿的衣服和乐器，快乐得跳起来，它知道我们又要出发过流浪生活了。

告别的时间到了。姑母紧紧催着，它把艾金勒特、阿列克西和般若曼送上了车子，又对我说叫我把丽丝送给她。

然后她轻轻地把我推到车子外面，关上了车门。

“替我吻吻老爹！”我大声叫道，“因为……”

车子走了。我泪眼模糊，但是看得见丽丝的头从车子的玻璃窗里伸出来，用一只手向我送来一个吻。车子很快地拐弯了。什么都完了。

这两年轻仅是一个短时间的休息，现在应该重新走上我的路。不过这一个休息是有益处的，它给了我力量。我四肢全感到充满了力量，可是比这一点更宝贵的是我心里感到的友情。我在世界上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在我前面展开了一个新的生活。我记起了维达里，我对我自己说：“向前走！”

向前走！

“向前走！在我的前面有广阔的世界，东南西北，我愿意朝哪一个方向走就朝哪一个方向走，全凭我自己高兴。

但是，在我开始走上广阔的大路以前，我想去看看这一两年来象父亲一样待我的那个人：卡德琳姑母没有带我跟几个孩子一起去跟他告别，但是我能够一个人去，我应该一个人去吻吻他。我用一根绳子拴住了卡比。对一只只有训练的教得很好的狗这样做，象是严重地伤了它的自尊心。我牵着它，向克里希监狱走去。

看监狱的人叫我到会见室里，不一会，老爹就出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他对我说，“我责备卡德琳为什么不带你跟孩子们一道来。”

从早上起，我就感到悲伤、愁闷；现在这一句话使我振作起来。

“孩子们告诉我说你想重新干你唱歌的行业，”他对我说，“要是你想老实做人，还是找一个固定的活干吧；到处流浪那是懒人做的事。”

“你不愿意我告诉你孩子们的消息吗？”

“并不是为了我们，我才想到要你放弃干这一行沿途卖唱的职业的，应该先替别人着想，然后才想到自己。”

“正是这样呢，老爹。要是我放弃我已经决定干的事情，那我就是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丽丝了。”

他又朝我看了看，后来，他握住了我的双手。

“好的，孩子，我应该为了你说的这句话吻你；你心地真好，这真不象是你这样大的年纪说的话。”

突然老爹在他的背心口袋里摸了摸，拿出了一只大表。“这是我的表，”他对我说。“它不值什么钱，走得也不太准。但是这是我唯一的财产了，我送给你吧。”

以后我每想到这次分别，我能够记得的就是我走到街上以后，整个心情感觉到茫然若失。我相信我在监狱门前站了很久很久时候，如果不是我的手突然地在口袋里碰到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我大概一直会站到晚上。我摸了摸，原来是我的表！我拿了出来，看看是几点钟了，十二点了。我知道是十二点了，我的表告诉了我。多么好的东西啊！

我心里是太高兴了，竟没有注意到卡比几乎也跟我一样高兴。”它的叫声愈来愈响，使我从幻梦中醒过来。

“卡比，你想干什么？”

它站直身子，把前脚放在我的表上。它对着表看了好一会儿，好象在回想什么一样，接着，它摇摇尾巴，叫了十二下；它还没有忘记这种本领。啊！我们好用我们的表来赚钱了！

我朝监狱看了最后一眼，说了最后一声再见。我能够自由自在地随意在各处走，可是可怜的老爹却给关在监狱的高墙里面。我们动身了。向前走！

我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上枫丹白露，一条是上奥尔连昂。总之，这两条路对我说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没有考虑，挑了上枫丹白露的那条路。我走到莫夫达街，我是在一块蓝色的路牌上看到这个街名的，我记起了

从前碰到过的那些人。走到圣梅达教堂前面，我看见有一个小孩靠在教堂的墙上，看上去这个小孩好象是小马夏。

我走近一看。果然是他，他也认出我来了，因为在他的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是你吗？”他说，“在我进医院以前，你跟一个白胡子老头来过的，是吗？”

“是我。卡罗弗里还是你的师父吗？”

“卡罗弗里打峨兰多打得太凶，结果把他打死了，现在已经坐牢了。”

知道卡罗弗里坐了牢，我很高兴。我第一次想到监狱也可能是有用的。

“那些孩子呢？”我问。

“啊，我不知道。卡罗弗里给抓去的时候我不在那儿。等我从医院出来，他早已把我租给嘉索马戏班了，租期两年，租钱他全都先拿去了，我在那个班子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才出来。我去找卡罗弗里，但是一个人也找不到了。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好，才走到了这儿。我一个钱也没有。从昨天起我就没吃过东西了。”

我也不富裕，但是我还有点钱，不会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饿死。我跑到一家面包店买来了一个大面包给他。他赶快接了过去。

“现在，”我对他说，“你想怎样办呢？”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掉，如果我不是舍不得跟它分手的话，我早已把它卖掉了。你呢，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忽然间幼稚地吹起牛来了，我说：“我做了班主了。”

“啊，要是你愿意雇我进你的班子就好了。”

这时候，我说老实话了。“我的班子的全部人马都在这儿，”我说，一边指着卡比。

“那么，不管怎样，我们在一起就是两个了。不要把我丢掉，不然我一点儿法子也没有了。”

怎么来对他说我不能够让他加入到我的班子里来呢？跟我在一块儿比起他单独一人饿死的机会不是一样多吗？

我这样对他解释，但是他不肯听我的话。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我们会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这一句话使我不再犹豫了。“好，我答应你！”我对他说。

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了巴黎。天气很暖和，四月的太阳在万里无云的蓝天里照耀。这比起我进入巴黎的那一个下雪天，真是大不相同，从前，我对巴黎向往了那么久，真象向往乐园一样。

我们这样不顾一切地走，要走到哪里去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甚至可以说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往前走。但是以后住哪里走呢？我答应过丽丝先去看她的哥哥和艾金勒特；可是对那几个人我却没有约定好我应该先去看谁。

有一个原因决定我首先向南方走，那个原因就是我想去看看巴贝兰大妈。我有很久很久没有提到她了，然后可不能下一个结论说我已象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样把她忘掉了，我离开她以后，就没有写过信给她，一方面是因为她不识字，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还有点害怕巴贝兰这个人。如果巴贝兰看了我的信再找到了我呢？再把我卖掉呢？如果他再把我卖给另外一个维达里

呢？那不会再是一个象这个维达里一样好的人了。现在，我能自由地到我愿意去的地方去，我能够想法子去看巴贝兰大妈。

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我解开背包上的扣子，忽然想到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我一样样全都放在草地上。马夏看得眼都花了。

“你呢，你有什么东西？”我问他。

“我只有把小提琴，还有我穿的这一身衣服。”

“既然我们是同伴了，”我对他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平分一下吧。不过，我们平分了东西，那就应该大家换着背这个背包，一个人背一个钟头。”

马夏对于平分东西这点想推辞，可是我已经有了命令他的习惯了，我不允许他多解释。我在我的几件衬衣上面放下了艾金勒特送给我的针线盒，我还放下了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面放的是丽丝给我的玫瑰花；他想打开这个盒子，我没有答应。我甚至连打也没有打开就又把它的放在背包里了。

我穿上了羊皮背心，背上了竖琴以后，还有一件事使我不大安心，那就是我的长裤子。我似乎觉得一个艺人不应该穿着长裤子在观众面前演出，应该穿短裤，袜子上应该交叉地捆上颜色鲜艳的带子。我打开艾金勒特送给我的针线盒，拿出她的那把剪刀。

“在我收拾我的裤子的时候，”我对马夏说，“你拉小提琴给我听。”

“好的，我来拉。”他拿出小提琴拉了起来。

我呢，开始剪裤腿，但是我刚剪不久就放下剪刀，一心听他拉琴了。马夏拉得差不多和维达里一样好。

“谁教你拉的？”我拍着手问他。

“没有人教过我，也可以说差不多每个人都教过我，主要还是我独自一个人练出来的。”

我扣好了背包，心里对未来的收入充满了希望。我们在灰尘漫天的大路上向前走！到第一个村子，我们就可以演出一次了。

我们经过一个农庄的大门口，农庄的院子里全是穿着漂亮衣服的人，原来是有人结婚。我想到这些人大概很乐意有人奏乐给他们跳舞吧，于是我走进院子，马夏和卡比跟在我的后面。我脱下帽子，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那是维达里行的贵族式的礼），然后就把我们的主意说了出来。

“喂，”有人叫起来，“这儿来了几个琴师。大家来跳四对组舞吧！”没有几分钟，跳舞的人就排好了。

“你拉过四对组舞的曲子吗？”我用意大利话问马夏，怕别人听懂我的话。

“拉过，”他试拉了一点。我知道这个曲子，我们有办法了。

“你们两个人里面谁还会吹短号？”有一个人问道。

“我会，”马夏说，“不过我没有短号。”

“你还会吹短号？”我又用意大利话问他。

“还有长号、笛子也会吹，我什么都会吹。”

马夏可真是了不起啊。短号马上就拿来了，我们奏起了四对组舞曲，波尔卡舞曲，华尔兹舞曲。跳舞的人不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一直演奏到晚上。对我说来，倒不算怎样太吃力，但是马夏却支持不住了，他化的力气比我多，因为肚子没有吃饱，显得很疲劳。幸好不是我一个人注意到他的脸色苍白。

“好了，”新娘说，“这个孩子支持不下去了。大家掏钱给乐师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说，“我让我们的账房来收钱。”我把我的帽子丢给卡比，它用嘴衔起来。有人给钱，它就向他行礼，大家看见它行礼行得那样文雅，都拍起手来。我看见白花花的银币不断地丢在帽子里面。新郎最后丢，他丢了一个五法郎的银币。多么好的运气啊！

口袋里有了二十八个法郎，我们简直变成大阔佬了。到了戈尔彼伊，我就能称心如意地购买一些不可缺少的东西。首先在一个卖破铜烂铁的铺子里买了一个短号，花了三个法郎；然后买了一些捆袜子的红带子；最后又替马夏买了一个旧的军用背包。

遇到这样的好事情，我不由得有了一些从来也不敢有的打算。

巴贝兰大妈待我这样好，我上她那儿去吻吻她，这是去还她的情，但是这样还情未免太小气了一点。我要是能够带些东西给她就好了！现在我有钱了，我应该送她一件礼物。送什么礼物好呢？有一件礼物最能够使她高兴，不单单是现在高兴，她整个晚年都会高兴，那就是一条母牛，一条代替卖掉的露赛德的母牛。要是我能够送给她一条母牛，那她会多么快乐啊，我也会一样快乐。我现在已经在想象那时的情景了。

在没有到萨瓦农以前，我要买好一条母牛，马夏牵着它走到巴贝兰大妈的院子里。自然，巴贝兰不在那儿。“巴贝兰太太，”马夏说，“这条牛是我带来给你的。”“一条母牛！孩子，你搞错了。”她叹起气来。“没有搞错，太太，你是萨瓦农的巴贝兰太太吧？王子（就象童话里的王子一样）叫我把这条牛带到巴贝兰太太家里来送给她。”“什么王子？”这时候我也走进来了，我投入了巴贝兰大妈的怀里，我们吻了又吻以后，就做煎饼和果馅炸饼吃，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一点也不给巴贝兰吃。多么美丽的梦呀！不过要实现这一个梦，就要买一条母牛。一条母牛要值多少钱？一定很贵，很贵，但是要多少钱呢？

我问了一个养牛的人。他恰巧有一条牛，一条驯服的母牛，吃得非常少，奶很多，非常浓，如果我愿意付给他一百五十个法郎，牛就可以算是我的了。

一百五十个法郎，我口袋里的钱离这个大数目还相差很远。我能不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呢？我好象觉得这是可能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目前不到萨瓦农去，先去瓦尔斯，等到回来的时候再去看巴贝兰大妈；那时候我一定会有一百五十个法郎了，我们也就能够演出我那一幕《王子的母牛》的童话剧了。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马夏，他没有一点反对的表示。

王子的母牛

从蒙达季到瓦尔斯的路很长。这条路是在塞文山群山当中，朝地中海一边的山坡上。笔直的路有一千二百里长，对我们说却不止两千里；因为我们一路上要挣钱，要走许多弯路，我们要找一些城市和一些大的村镇表演，这两千里路我们走了有三个月，但是，我们快到瓦尔斯的时候，我数了数皮口袋里的钱，觉得这么长的时间并不是白费的。我有一百四十六个法郎的积蓄了。马夏差不多和我一样高兴：挣到这么大的一笔钱，他也出了一分力，因此他非常得意。说真的，他出的力也的确不小，而且如果没有他，尤其是没有他吹短号，我和卡比决不能得到这么多钱。

三个月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以来，马夏天天生活在野外。他不再象我遇见的那个靠在圣梅达教堂门口、又瘦弱、又悲伤、饿得要死的可怜的孩子了，更不象我在卡罗弗里的顶楼上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发育不全的孩子了。他不再悲伤了，甚至身体也不瘦弱了。在我们的旅途中，他的脾气一直是那样好，总是笑嘻嘻的，看问题总从好的一面去看，对什么事都感到高兴，哪怕一点儿小事情也使他觉得幸福，把不好的事情都看成好的，要是没有他我将会变得怎么样啊？

在瓦尔斯，我们找到了阿列克西和他的伯父加司巴。虽然阿列克西到矿里工作时间很短，然而他已经爱上他这一个行当，还觉得很自豪哩。

“如果你想做矿工，”他笑着对我说，“这不难。干这一行并不比别行坏，不管怎样，总比在大路上唱歌来得强。”

但是我到瓦尔斯这儿来不是为了留下来当矿工的。向前走！

我们肩上背了竖琴提琴，背上背着背包，又走上了大路。我们决定不直接到于赛尔去，而是从克莱孟走，这并不要多走多少路，却使我们能够多经过一些温泉城市。

在布尔部尔，特别是在蒙一多尔，我们赚了不少钱。我应该说得准确些，尤其是靠着马夏赚来的，靠了他的才能和机智赚来的。在拿起提琴以前，他先研究研究他的听众，用不到多长的时间，他就能看出他要拉还是不要拉，尤其是应该拉什么曲子。“注意！”当我们看到一个穿丧服的年青女人走近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应该奏悲哀的曲子，使她感动，要是她哭了，我们就会有赏钱了，”于是我们开始奏起缓慢的乐曲，使人听了心也会碎的。

特别是在小孩的前面，马夏获得的成功最大，他用他的提琴弓使他们跳舞，他用他的笑容使他们大笑。

我们表演的结果成绩的确非常好；除掉用掉的钱以外，我们很快就又积蓄起六十八个法郎。

六十八个法郎加上我们原来存下来的一百四十六个法郎，一共有两百一十四个法郎了。我们应该赶快经过于赛尔到萨瓦农去了，听人说在于赛尔有一个专门买卖牲口的大市集。我们去那儿可以买到这一头我们老在讲的出色的母牛，为了这条母牛我们辛辛苦苦地积存了这一笔钱。在这以前，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梦想中找到快乐；马夏希望我们的母牛是白色的，我却希望它是红色的，因为我想起了我们的可怜的露赛德。这一切梦想都是那样美好那样迷人，但是现在应该把梦想变成现实了。怎样挑选我们的母牛，能够保证它的确具有各种我们盼望的优点呢？我不知道凭了什么特征可以看出来是不是一条好牛，马夏也跟我一样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兽医来帮帮我们的忙呢？自然喽，这要花我们一笔钱，不过那会使我放心不少啊！我们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这样办。

从蒙一多尔到于赛尔没有多远，在路上只走了两天，到于赛尔天还早得很。我到了这里，也可以说是到了故乡了。在于赛尔我开始第一次当众表演，维达里替我买我的第一双皮鞋也是在于赛尔那时候，我们一共是六个，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卡比和我；想到这件事，我走进于赛尔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忧伤。

我们把背包放在我跟维达里住过的旅馆里，就出去找兽医。兽医听到我们的要求以后，当着我们的面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在本地没有一头会做把戏的母牛呀，”他说。

“我们要的不是一头会做把戏的母牛，我们要的是一头奶好的母牛。”

“它要有一条真正的尾巴。”马夏补充说。

“干什么你们要买一头母牛？”兽医问。

我很简单地告诉他我为什么要买这头母牛。他听了很感动。

“我陪你们上市集去，”他说，“我答应替你们挑一头不会有假尾巴的母牛。明天早上七点钟来找我。”

“我们要付你多少钱，兽医先生？”

“一个钱也不用付，象你们这样好的孩子，我能收你们的钱吗？”

我不知道怎样感激这一个仁慈的人才好，但是马夏想出了一个主意。

“先生，你喜欢听音乐吗？”他问道。

“孩子，我非常喜欢。”

我明白马夏的计划。“你想我们合奏一个曲子给兽医听，是吗？”我说。

“对，奏一个小夜曲，这种曲子是奏给心爱的人听的。”

晚上九点钟，我们来到兽医的家门前，马夏带了他的小提琴，我带了我的竖琴。我们的朋友兽医从楼上探出头来看看是谁在奏曲子。他一定知道了我们的目的，因为他几乎马上就替我们打开了门。

他有许多孩子，我们立刻给一群听众围住了，要不是他把我们送到门外的话，我相信我们会一直演奏到半夜。

第二天早晨，于赛尔这个城里充满了吵杂的声音和各种活动了，一群群的农民朝市集赶去，时间不过刚六点钟，所以我们想去看一下那些已经到达的母牛，先做一番挑选。

我们看了半个钟头以后，发现完全中意的有十七头，这一头有这样的优点，那一头有那样的优点，有三头是因为它们是红色的，有两头是因为它们是白色的；自然啦，这一来我就跟马夏开始争论了起来。七点钟我们去找兽医，他在等我们，我们跟他一起回到了市集上。他在一头小母牛眼前站住了，这头母牛的腿是细长的，毛是红的，耳朵和两颊是棕色的，眼眶是黑的，鼻子上围着一个白圈子。

这头活泼好看的小母牛我们原来就很中意。

一个样子瘦弱的农人牵着这头牛，兽医跟他谈起来，问他这头牛想卖多少钱。“三百法郎。”我们听了以后，觉得没有指望了。

讨价还价开始了。兽医愿出一百五十法郎；那个农人减价到二百九十法郎。兽医加到一百七十法郎；农人减到两百八十法郎。“我们去看看别的牛吧。”我说，那个农人听了我的话，又做了一次努力，减去了十个法郎。最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减价，他减到了两百零十个法郎，但是他不愿再减了。

这时候，马夏走到了牛的后面，拔了尾巴上的一根长毛，这头母牛踢了他一脚，这一来我决定了。”两百零十个法郎我买了。”我说，我伸出手去抓那根缰绳，但是那个农人不肯把它给我。他一次又一次地要钱，她妻子的别针要二十个铜板，女孩子的酒要十个铜板，牛络要三十个铜板。到后来，牛缰绳要二十个铜板，这是我们最后的二十个铜板了。等到钱付光了，牛才交给了我们。

我们有了一头牛了，可是我们一个铜板也没有了。

“我们去表演一次，”马夏说，“咖啡馆里全是人；我们分开来，可以每一家都演遍。”

晚上我们算账，马夏赚了四个半法郎，我赚了三个法郎。

我们有钱了。但是跟我们花了两百四十个法郎得到的快乐比起来，得到这七个半法郎的快乐是太小了。我们请厨房里的女用人挤我们这头母牛的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喝到了它的奶，我们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好的奶。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来我们就起床了，立刻动身到萨瓦农去。我很感激马夏对我的种种帮助，因为没有他，我绝对积不起两百四十法郎这一笔大数目的，我愿意让他得到牵母牛这种乐趣。他牵着缰绳，觉得非常幸福。

我们决定把我们一天的路程分成两半来走，在当中吃一顿中饭，特别是让我们的母牛吃一顿中饭，吃路边的草。它很听话，一心地吃着草，没有好久我就把缰绳松开，缠在它的角上，坐在它的旁边吃面包。自然我们比它先吃好。

这时候我们看了它一会儿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事好，就玩起弹子来。母牛的草没有吃好，我们的弹子却玩好了。

“再等它一会儿吧，”马夏说。

“你不知道母牛吃草会吃上一天吗？”

“我吹一次短号给它听好不好？在嘉索马戏班里有一头牛，很爱听音乐。”

马夏开始吹一首阅兵进行曲，我们的母牛听到开头的调子抬起头来；等到我还没有能够奔到它跟前拉住缠在它角上的那根缰绳，它已经象飞一样地跑走了。

我们赶快追上去，一边用力地跑，一边叫它。我叫卡比去拦住它，但是谁也不能什么本事全都有呀。一个养牲口的人的狗应该跳到我们这头母牛前面的，卡比虽然聪明，却跳到牛的腿上。自然，这样一点也不能够拦住它，我们继续奔着。它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我们的母牛向一个村子跑去。它当然在我们前面跑进了村子，那条路是直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挡住了它，捉住了它。我们于是放慢了脚步，我们的母牛不会丢掉了。

我以为我只要声明这头母牛是我的就行了，可是，他们不但不给我，反而把我们围住，问了我们好多问题：我们从哪儿来的？还有，我们从哪儿得到这头母牛的？我们的回答是又简单又容易，然而却不能叫这些人信服，有两三个人竟说这头母牛是我们偷来的，应该把我们送到监牢里去。听了监牢这两个字我觉得非常恐怖，因而慌张起来，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了。我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我简直无法来替自己辩护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警察走了过来，别人简简单单地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好象对这件事情还不清楚，就说要把我们的母牛关到专门收留牛马的地方去，同时把我们关到监牢里去。以后再调查事实。我想抗议，马夏

也想说话，那个警察却凶狠地不许我们发言；这时候我想起了维达里和图卢兹的警察发生的那件事，我叫马夏不要说话，跟着警察先生走吧。

到了监牢，他们搜了搜我们身上，然后把我们丢在牢房里，把门关上，那种关铁门的声音听了真叫人悲伤。

好几个钟头过去了，时间越过去，我们越发愁。

后来，我们的牢门终于打开了，走进来一个老先生，他的态度很诚恳很和气，使我们又有了希望。这个人是一个法官。

他的审问是很严格的，我不得不把事实全都说出来，虽然我怕看到我们想叫巴兰贝大妈吃惊的事败露，我又担心自己会重新落到巴贝兰的手中。

但是，我正在这样为难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叫我满意的消息：法官认识巴贝兰，他告诉我他已经回到巴黎去了。

这个消息叫我非常快乐，我因而能够说出许多有根据的话，要他相信只要兽医的证明就完全可以说明我们没有偷牛了。

我想他会对我说我们可以出牢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去把这件事通知于赛尔，”他只是这样说，“如果照我希望的那样，他们证明了你们的话是真的，明天就会让你们自由的。”

“我们的母牛呢？”马夏问。

“会还给你们。”

“但是现在谁喂它呢？谁挤它的奶呢？”

“放心好了，小家伙。”法官用温和的声音说，然后离开了我们。

“王子的母牛将要胜利地走进村子，”马夏叫起来。他快乐得开始唱起歌跳起舞来。他的快乐影响了我，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卡比跑到我们当中，用后腿立了起来，我们尽兴地跳着舞，使得那个大吃一惊的看守跑来看我们是不是想打破牢房逃走。

巴贝兰大妈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们的牢门打开了，那个法官走了进来，后面跟了我们的朋友兽医。法官交给我一张挺好看的盖了印的纸头。

“这是一张证明，证明我使你们自由了，”他亲切地对我说，“今后它还是你们的护照。祝你们一路平安，孩子！”说完，他握了握我们的手，兽医呢，还亲了亲我们。

我们走进这个小镇的时候，真够倒霉的；现在走出来的时候，却是得意扬扬，牵着母牛，头抬得高高地向前走着。

我们很快地走到了我和维达里在那儿住过的第一个村子。到了这里，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走到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些做饼用的东西。

只有二十里路了，只有十六里路了，只有十二里路了：真是奇怪，看起来快到巴贝兰大妈家了，路却比我当初离开她的时候长得多。我非常激动，非常兴奋，不时地拿出表来看。

“这儿的风景美丽不美丽？”我问马夏。

说实在的，我自以为把他带到了一个美妙的地方。我们走到了小山的山顶。从那儿下坡，经过一些小道，就可以到萨瓦农。我们又走了几步路，到了当初我请求维达里允许我坐一坐的那个地方。

“拿住缰绳，”我对马夏说。我一跳就跳上了矮墙，在我们的山谷里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在那两丛树当中看到了巴贝兰大妈的屋顶。

这时候，从烟囱里升起了一缕黄色的烟，没有风，烟笔直地沿着山腰往上升。“巴贝兰大妈在家里。”我说。我忽然感觉到我的眼睛里全是眼泪了，我跳下了矮墙，紧抱住马夏。卡比向我身上扑过来，我也紧抱住了它。

“我们该怎样使她大吃一惊呢？”马夏问。

“你一个人走进去；你说你带来了一条王子的母牛，巴贝兰大妈问你什么王子的时候，我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我们不能够奏着音乐走进去，那真是不幸呀。”

“马夏，别干傻事了。”

我们向下走到大路转角的一个地方，我的眼光越过了屋顶，看到了一个白头巾出现在院子里，这是巴贝兰大妈。她打开了篱笆门，向村子那边走去。我们站住了，我把她指给马夏看。

“她走了，”马夏说。“你叫她一下好不好？”

我真想这样做，但是又克制住了。几个月以来，我就在打算怎样叫她惊喜一场了，我不就这样放弃了我的计划。

我们急急忙忙地走到我原先住的房子的篱笆门前面。走了进去。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冷清清地。我们第一样要做的事就是小心把母牛牵到牛栏里去。

“现在，”我对马夏说，“我们进屋去吧；我去坐在炉子角儿上。巴贝兰大妈回来的时候，你跟卡比躲到床后面去，让她只看见我一个人。”

事情这样安排妥当了。我们走进了屋子。我坐到炉子旁边，在这个地方我曾经度过多少个冬天的夜晚啊。我缩成一团，如同巴贝兰大妈当年的小雷米一样。我就觉着好象昨天才离开家似的，什么也没有变。我真想就近看看每一样东西，但是不行，我得坐着不动，观察动静。忽然，我看见一个白头巾了。“快躲起来。”我对马夏说。

门开了，巴贝兰大妈在门口就看到了我。

“老天爷呀，”她低声叫道，“老天爷呀，这真的是你吗，雷米？”

我站起来向她跑过去，我抱住了她。“妈妈！”

我们过了好几分钟才平静下来，揩干净眼泪。听到一声吸鼻涕的声音，我这才想起马夏还躲在床后面，我叫了他一声，他出来了。

“这是马夏，”我说，“我的弟弟。”

“啊！你找到你的父母了吗？”巴贝兰大妈叫起来。

“没有呀，我这是说他是我的伙伴，我的朋友，这是卡比，也是我的伙伴，我的朋友，卡比，对你师父的母亲敬一个礼！”

马夏对我招了招手，想叫我记起我们买的母牛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对巴贝兰大妈说，“我们到院子里去一会儿，去看看梨子树。”

我们走到牛栏前面的时候，母牛“哞”地叫了一声。

“一头母牛，一头母牛在牛栏里！”巴贝兰大妈叫起来。

这时候，我跟马夏两个人忍不住了，大声笑了起来，巴贝兰大妈惊诧地朝我们看着；但是她还是不懂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故意想叫你大吃一惊，”我说。“我不愿意空着双手回到巴贝兰大妈的家里，她从前待她的小雷米太好了。”

“啊！好孩子，亲爱的孩子！”巴贝兰大妈拥抱着我。接着，我们走进了牛栏，领她去看我们的母牛，这头母牛现在是她的了。巴贝兰大妈又满意又惊奇，叫了一声：“多么漂亮的母牛！”

忽然她站住了，朝着我看：“啊！难道你有了钱了吗？”

“我相信是的，”马夏笑着说，“我们只剩下五十八个铜板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母牛还是不停地叫着。

“它要别人去挤它的奶了。”马夏说。

巴贝兰大妈看到她的桶里盛满了四分之三的发泡沫的浓牛奶，她真高兴极了！“我相信它的奶比露赛德的还要多，”她说。

母牛的奶挤好了，我们回到了屋子里，在桌子上教人注目的地方，巴贝兰大妈看见了我们安排好的第二次使她吃惊的东西：奶油和鸡蛋。她又吃惊地叫起来了。

“你还记得吗？”我对她说，“那一天你借来的奶油是用来做煎饼的，后来却拿来炒洋葱了。这一回可没有人来打搅我们了。”

“你已经知道巴贝兰到巴黎去了！”巴贝兰大妈说。“你也知道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吗？这是跟你有关系的事情。”

“跟我有关系？”我惊奇地问道。

但是巴贝兰大妈没有回答我，她朝马夏望望。我看出来她不想在他面前告诉我这件事。我决定等一等再问巴贝兰到巴黎去干些什么事。

“他很快就回来吗？”我问。

“啊！不会，绝对不会。”

“那么，我们不用忙了，我们来做煎饼吧。”

钵子里盛满了黄黄的调好了的面糊。炉于里的火很旺。马夏不断地往里面加柴火。卡比坐在炉灶旁边的角落里，用高兴的眼光看着我们预备煎煎饼。巴贝兰大妈用刀尖挑起一块奶油放到锅子里，奶油立刻化开了，开始吱吱地叫起来。

“它在唱歌呢，”马夏叫道，“啊！我应该来和它！”

马夏拿起小提琴，低低地，柔和地拉起来，他伴着锅子唱出来的歌拉着，使得巴贝兰大妈不住地大笑。

钵子全空了，马夏看出来巴贝兰大妈不愿意当着他面说话，他就说他想去看看母牛怎么样了，他不听我的话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谈话。我问巴贝兰大妈。

“巴贝兰上巴黎去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象是你的家里人在找你！”

“我的家里人！我有一个家庭，我，一个给人抛弃的孩子！”

突然我好象发疯了，大声叫道：“不，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巴贝兰在找我，想把我领回去，再把我卖掉，”

“啊，孩子，别乱说吧，听我告诉你，听听我亲耳听到的话，从那天起到下个星期一整整有一个月了，那天我正在厨房里干活，有一个先生走进我们的屋子，巴贝兰当时正在家里，‘巴贝兰是你吗？’那个先生说，他说话的口音一点不象本地人。‘是我，我叫巴贝兰。’杰洛姆回答。‘曾经在巴黎勃勒德依路上拾到过一个小孩子，后来又把他养大了的那个人，是你吗？’‘是我。’‘请问你，现在这个小孩在什么地方？’‘请问你，你问这个干什么？’杰洛姆反问他。”

即使我怀疑巴贝兰大妈说的话不正确，现在听到了巴贝兰答话里那种客气的语气，我也得承认她把她听到的活全都真实地告诉了我。

“后来，”她继续说下去，“他们两个人走了出去，不过三四个钟头以后，杰洛姆一个人回来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多么好奇地想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杰洛姆对我问他的话完全不回答，他对我说这个先生并不是你的父亲，他不过是代替你的家庭来找你的，”

“我的家庭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的呢？我有爸爸妈妈吗？”

“杰洛姆对我说他也一点不清楚。后来他又说他要到巴黎去，去找那一个把你交给他的音乐师，那个人给过他一个巴黎的地址：鲁尔兴路的另外一个叫卡罗弗里的音乐师的家里。我把这些名字都记牢了，你也记牢。”

“我早都知道了，你放心好了；以后呢？”

“巴贝兰一直在找你；那个先生给了他五个金路易，那要值一百个法郎。从这一点以及当初包你的漂亮襁褓来看，都可以证明你的父母一定是很有钱的。”

这时候，马夏走过门口，我叫住了他：

“马夏，我的父母在找我，我有一个家庭了，一个真正的家庭，一个有钱的家庭！”

但是，真奇怪，马夏好象并不跟我一样高兴。

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少；但是，从前有多少个晚上，我不得不睡在露天里，怀念我小时候睡的这张床啊。我的家庭在找我；可是为了要找到我的家庭，我得跟巴贝兰打交道，想到这一点，我的快乐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他在什么地方呢？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巴贝兰大妈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丈夫在巴黎，别的就不晓得了。自从他离家以后，就没有写过一封信回来，只有上莫夫达区的两三个她知道名字的小旅馆里去找他。在这些小旅馆里总能够找到他的。我应该上巴黎去。

我本来希望能够跟马夏一起在巴贝兰大妈跟前多过几个安静快乐的日子。

子，现在呢，我们在第二天就得动身。我们也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我们不能去拥抱一下那个可怜的艾金勒特，也不能上涅夫勒去，把她哥哥和她姊姊的消息告诉丽丝了。

第二天早上，巴贝兰大妈，马夏，和我，我们三人围住了灶火坐着，灶上的火烧得很亮，上边煮着我们那头母牛的奶，我们三个人在商量。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上巴黎去，”巴贝兰大妈说，“你的父母在找你，你要快一点让他们高兴。”

但是马夏对这个决定没有一点赞同的表示。

“现在你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了，”他说，“这个家庭除了把你丢在路上以外，对待你没有别的任何好处，你一下子抛弃开那些好的人，去找那些至少看起来是不好的人，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

“马夏说得很对，”我说。

“但是他们是你的父母呀！”巴贝兰大妈坚持她的意见。

我想采取折衷的办法：“我们不去看艾金勒特了，这要兜一个大圈子。不过，我们在到巴黎去以前，先上德鲁齐去看丽丝。”

大家商量好明天动身，这一天我花了一部分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给艾金勒特，向她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去看她。

第二天，我又一次地带着悲伤的心情离开了家，但是至少不象上一次跟维达里一起离开萨瓦农那样难受了。我能够和巴贝兰大妈亲吻，并且答应她我不久就跟父亲母亲一道来看她。我们还应该跟我们的母牛去说声再会，马夏在它的鼻子上吻了十几下，母牛象是觉得非常快乐。

好，我们又重新走上了大路，背上背着背包，卡比走在前面。想赶快到达巴黎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催着我，我加快了脚步。

“你多么急啊！”马夏不大高兴他说。

“这是真的，我觉得你也应该一样急。”

他摇了摇头。自从谈到我的家庭的事情以来，我已经看到他摇过好多次头了，他这种态度使我觉得很难过，心里很不愉快。

“难道我们不是弟兄吗？”我问他。

“啊，在我们两入当中自然是弟兄，我一点不怀疑你，今天我是你的弟兄，到明天我也是你的弟兄，但是为什么你要我也做你的弟兄们的弟兄、你母亲的儿子呢？”

“要是我们在卢卡的话，难道我不可以是你的妹妹克里丝丁娜的哥哥吗？”

“这不是一回事，你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完全不是一回事。你到卢卡，你会受到穷人们的接待，他们绝对不会说你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们比你还要穷。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钱，你怎么要他们接待一个象我这样的小穷光蛋呢？我只好一个人继续走自己的路了。”

“啊！亲爱的马夏，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呢？”

“我怎样想我就怎样说，啊，米哦卡罗！为什么我不能够因为你的快乐而完全快乐呢，原因是：我们就要分手了，而且你不会再象现在那样自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意大利话。原文 Omiocaro，是“啊，我的亲爱的朋友”的意思。

听到马夏希望我的父母是穷人，我简直有点想发脾气了；但是另一方面，他证明了他对我这样关心，这样亲爱，我又感到非常高兴。

假使不是我们每天都得挣面包吃的话，那我一定会不管马夏的意思，加快我的脚步向前走；可是我们还得在我们走过的大路边上的比较大的村镇里表演，在等待我的有钱的父母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财产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依靠运气，吃力地东赚几个铜板，西赚几个铜板。

除了每天的面包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件理由使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多增加一点收入。我想送给丽丝一件礼物。

我们庄德西兹买了一个玩具娃娃，幸好价钱比母牛便宜。从德西兹到德鲁齐，我们什么也不干，就是急急忙忙地向前走。

我们沿着尼维内运河向前走，平静的河水，马慢慢地拉着的小船，把我又带回到从前的幸福的日子，那时候，我和米里甘太太跟亚瑟乘着天鹅号也是在一条运河上这样航行。天鹅号现在在哪里呢？无疑地，米里甘太太一定带着病好了的亚瑟已经回到英国去了。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到了德鲁齐，卡德琳姑母的丈夫是一个看守水闸的，他的家在水闸附近。我走近这个房屋的时候，心在扑通扑通直跳。屋子里生着很旺的火，窗子被火光照得亮亮的，连我们走的路都照亮了。

我们到了紧跟前，我从这扇窗子看进去，看到丽丝坐在桌子前面，她的姑母的旁边，另外还有一个人，一定是她的姑父，坐在她前面，背朝着我们。

“他们在吃晚饭，”马夏说，“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我没有应他话，用一只手阻止他说话，另外一只手向卡比做了一个手势，叫它待在我们后面不要响，接着，我解下了竖琴的带子，准备弹琴。

“啊！对，”马夏低声说，“弹一首小夜曲，这是一个好主意。”

“不，你不用拉琴，让我一个人来弹。”

我弹起了我那首《拿不勒斯歌》的第一段。我看丽丝：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的眼睛发出了亮光。我唱起来了。

这样一来，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向门口跑；我刚刚把竖琴交给马夏，她已经扑到我的怀里。他们把我们带进屋子里，卡德琳亲了亲我以后，在桌子上放上了两副刀叉。可是我请她再放一副。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再留一个位子，”我说，“我们还有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来的呢。”

我从我的背包里拿出了那个娃娃，把它放在椅子上。当时丽丝朝我看的那眼光，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好象现在还能清楚看见。

寻 找

如果我不是急着要赶到巴黎去，我一定会跟丽丝在一起多待些时候，待得长久一些。我们两个人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我们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说的太少了！丽丝对我说了她住在德鲁齐的许多事情，她的姑父和姑母如何爱她，他们待她又如何好象亲生女儿一样，他们在他们家里生活得怎么样，她做些什么游戏。

我呢，我问她有没有得到她父亲的消息，告诉她自从我俩离别以后我遇到的事情。

在我说的话里面，自然关于我的富有的家庭的事情谈得最多了。我把告诉给马夏的那些话又告诉给了丽丝听，特别是再三谈到会带给我一笔财产的希望，如果有了这笔财产，我们就都会得到幸福；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她，特别是她。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非得离开丽丝和这个地方再动身了。我最后对丽丝说的话是：“我下次来找你的时候，一定坐了四匹马拉的车子来。”

不过，在从巴黎坐马车到德鲁齐来以前，先得从德鲁齐步行到巴黎去。要是没有马夏的话，我就一心一意快地赶路了。现在还何必再要辛苦地干活呢？但是马夏却没有被我对他说的那些理由打动。“尽我们的力量多挣几个钱，”他一边说一边逼着我拿起竖琴表演。“谁知道我们会不会马上找得到巴贝兰呢？”

这个意见是非常聪明的：不过我得承认我是不能再唱歌了，过去唱歌是为了积钱买母牛送给巴贝兰大妈，买玩具娃娃送给丽丝，现在还何必唱呢！

“你要是有了钱，一定会懒得不得了！”马夏说。

我们在没有到维尔于夫以前，走到了一个农庄，在这儿我们两人曾经合作表演过第一次的合奏，给参加婚礼的人跳舞。新郎和新娘认出了我们，他们要我们再奏曲子给他们跳一次舞。第二天早晨，我们打从这儿动身往巴黎走去。我们离开巴黎到现在，已有整整六个半月了。

但是回来的这一天和离开的那一天一点也不一样了，这一天天色灰暗，天气很冷，天空没有太阳，地上没有红花绿树。不过阴郁的天气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快乐，用不到什么外界的景象来鼓舞我们。

我说“我们”，这是不正确的，只是我一个人心里充满了快乐，仅仅是我一个人。

对马夏来说，我们越走近巴黎，他显得越忧愁，他常常一连走几个钟头，不跟我说一句话。一直到这一天我们停下来吃中饭，坐在一块石头上吃面包的时候，他才把他的重重的心事告诉我。

“你知道在走进巴黎的时候我想到了谁？我想到了卡罗弗里。我听到他被送进监牢，当时竟没有想到问问他要关多少时候：现在他可能放出来了。我们要到莫夫达路去找巴贝兰，卡罗弗里就住在那一个区，莫夫达路就靠近他住的地方。要是他碰巧看到了我们那可怎么办呢？他是我的师父，我的叔叔，他能够把我捉回去，那我就再也不能从他手中逃掉了。”

我一心在希望找到我的家庭，没有想到卡罗弗里。

“那你想不到巴黎城里去吗？”我问马夏。

“我想，要是我不上莫夫达路去，那我是可以逃掉跟卡罗弗里相遇的坏运气的。”

“好，你不要上莫夫达路去吧，我一个人去，我们今天晚上再见。”

我们走到意大利广场分了手，两个人都很激动，好象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一样。六个月来，我还是第一次不跟马夏和卡比在一起，单独一个人在这个这样大的巴黎城里，这使我觉得非常难过。

我应该去找巴贝兰的那几家小旅馆的地址和老板的名字，我都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了。这几个老板的名字叫做贝若、巴拿波和梭毕勒。

我一路上最早看到的是贝若开的那一家，我大着胆子走进去，但是我在问巴贝兰的时候，我的声音是颤抖的。这儿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在巴拿波旅馆，我得到另外一种回答：“巴贝兰……从前他在这儿住过，至少有四年了，他还欠我们一个星期的房钱呢。这个坏蛋现在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想问的却正是这件事情啊。

梭毕勒开的是一个饭馆，我走进店里的时候，有几个人正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巴贝兰，”一个人回答我说，“他不在这儿了。”

“那他在什么地方呢？”我全身发着抖问道。

“我不知道。”

我头昏眼花了；看出去好象铁锅在灶上跳舞。我的脸色一定显露出了心里的失望，所以有一个吃饭的顾客就问起我来。

“巴贝兰现在大概住在甘达旅馆，”他对我说，“在奥斯德尼兹街；三个星期前他在那儿。”

我又有了希望了。我谢了他，然后走出这家饭馆；但是在上奥斯德尼兹街以前，我要去打听一下卡罗弗里的消息，好告诉马夏。

我这时候正好在鲁尔兴路附近，没走几步路就到了我跟维达里来过的那座房子跟前，在那儿我打听到卡罗弗里还要坐三个月的牢。马夏可以喘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三个月里面，我的父母一定能想出办法使那个可怕的班主不敢来欺侮他的侄子。

我急急忙忙地赶到甘达旅馆去，那家旅馆是一个老太婆开的。她听了我那句和前几次一样的问话以后，就大声叫道：“你就是那个男孩吗？”

“什么男孩？”

“他生前找的那个男孩。”

他生前找的那个男孩！听到这句话，我的心紧张起来。

“难道他死了？”我问她，因为心慌，连声音都哑了。

“死了一个星期了，死在圣安东昂医院里。”

巴贝兰死了！那末我的家庭现在怎样才能找得到它呢？

“太太，情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巴贝兰跟你谈起过我的家庭吗？”

“谈了不下二十次了，不下一百次了，那是一个有钱的家庭。”

“这个家庭在什么地方，姓什么？”

“啊，这个吗，巴贝兰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些事。你得明白，他不让别人知道这些事的，他想一个人得到别人给他的报酬。”

“你知道不知道，在巴黎还有什么人能比你更了解巴贝兰？”

“巴贝兰没有这样笨，他什么人都不相信，他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我两手抱住了头，可是我简直没有法子再想下去。我该说什么？我该问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谢过了她，向门口走去。

“你这样子打算上哪儿去？”那个老太婆问我。“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旅馆，你可以住在此地，我不是夸口，你在这儿会住得很舒服。你还应该注意，

如果你的家里人在找你，他们等巴贝兰的消息等得焦急了，就会写信到这儿来，不会写信到别处去的；那么你在这儿就能收到信了；住在这儿对你是有好处的。”

甘达旅馆是你所能看到的最脏最坏的房子的一座。但是这个老太婆的提议却值得重视，并且，现在也不是讲究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家庭，没有一个有钱的家庭，我不能跟自己家里的人住在大街上的高贵漂亮的旅馆里。啊，在我们从德鲁齐到巴黎的路上，马夏想多挣几个钱，他的主张真是有道理。

“我和我的朋友合住一间房间要多少钱？”

“一天十个铜板；贵不贵？”

“我们晚上再来。”

第二天早上，我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写信给巴贝兰大妈，把我打听到了的事情告诉她。我勉强地写好了信。在信上不断地向她保证忘记不了她。要是我家里人写信给她我的话，我请她就通知我，并且把别人告诉她的地址转告给我。我做完了这件事以后，又去做第二件。

在德鲁齐的时候，我对丽丝说过，我一到巴黎第一个要去看的人就是她的在牢里的父亲。我还对她说，如果我的父母象我希望的那样有钱，我会请求他们还清她父亲欠的债。这是我当初计划中的快乐的事情里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去看老爹却不能够把我欠他的恩情的代价偿还给他，我是多么失望啊！幸好我有不少的好消息告诉他，我还要把丽丝和阿列克西的吻转送给他。

我对他解释我不能够到艾金勒特那儿去，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的父母找到了吗？”他说。

“你也知道这件事了？”

于是他告诉我，巴贝兰来向他打听我的情况。

“他向你提到我的家庭的时候怎么说的？”我问他。

“他什么也没有说，至少说得很少，他对你的父母的姓名都保守秘密，他怕别人会分他打算从你的父母那儿得来的好处。因此，你知道你有了父母，但是由于这个老混蛋的贪心，你既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我把我们所抱的希望告诉了他，他也认为很对：

“既然你的父母会在萨瓦农找到巴贝兰，既然巴贝兰会找到卡罗弗里，也会在这儿找到我，那别人也会在甘达旅馆找到你的。你就住在那儿等吧。”

我真想对他说我的父母将来会很快地使他出狱；但是我及时地想到了一个人不应该把心里打算做的使人快乐的事先说出来。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想留在旅馆里不出去，但是马夏却逼着我出门，也逼着我弹琴唱歌，这一天我们还赚到了十一个法郎。

三天这样过去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开旅馆的那个老太婆对我的间来问去老是相同的问题，总是用她那个一成不变的调子回答道：“没有人来过巴贝兰，我也没有收到寄给你或者寄给巴贝兰的信。”但是到了第四天她终于交给我一封信。这是巴贝兰大妈的回信。她告诉我说，在她丈夫死前不久，她接到他一封信，现在转寄给我，她想这封信对我可能有用。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打开这封信。

信上说：

“我现在住在医院里，病很重，我想我不会好了。如果我不能脱险的话，那你就写信给伦敦格林广场林肯旅馆的格雷士和盖来，这两个人是负责寻找

雷米的律师。你告诉他们只有你能够告诉他们这个孩子的消息，你得当心，你要得到一笔很好的代价后才把这些消息告诉给他们。”

马夏一下子跳起来，“向伦敦前进！”他叫道。

我朝他望着，一点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写信给这两个律师不行吗？”

“那样做干什么呢？写信没有当面谈能够弄清楚事情。我们还剩下四十三个法郎，到伦敦去这点钱很够用了。我们到布罗涅上船，这要不了多少费用。我可以替你领路。在嘉索马戏班里有两个英国小丑，他们教了我好多英国话。”

“动身吧。”我对他说。

不要两分钟，我们就扣好了背包，走下楼去，预备动身。旅馆的那个女老板看见我们这样的打扮，大声叫起来；“年轻的先生（我成了先生了）难道不等你的父母了吗？在此地等候才是最聪明的办法呀。”

但是她不能够把我们留下来了。

我们在去布罗涅以前，还得去跟老爹道别。这一次道别并不难受，老爹知道我不久就可以找到我的家庭，感到很高兴；我也非常快乐地对他说，我很快便会跟我的父母一道回来向他道谢。

我们到达布罗涅以后，口袋里还剩三十二个法郎，这点钱买船票还有多。

到伦敦去的船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开船，在三点半钟我们就上船了，我们尽力找到了一个好地方，那是在一大堆箱子当中。一声钟声响了，缆绳丢到了水里；我们的船开了；向我的祖国开了。

我们终于到了伦敦，下了船。马夏是什么也不怕的，他走到一个胖胖的男人前面，很有礼貌地问他到格林广场的路怎样走。

“这很方便，”他问了口来对我说，“只要沿着泰晤士河走就行了。”

我用一根绳子拴住卡比，牵着它在我身边走。我们往前走，马夏不时地问人还有多少路。

正在我们还以为迷了路的时候，忽然我们发现已经到了格林广场了。我们在一块铜牌前面站住，铜牌上写着：“格雷士和盖来事务所”这几个字。马夏走向前去想拉铃，但是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怎么啦？”他对我说，“瞧你的脸色多么白！”

“请你等一下，让我定下心来。”

他拉铃了，我们走进屋去。我心里乱糟糟的，不能够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我只看到有两三个人伏在桌子上写字。马夏对其中一个人说起话来。巴贝兰的名字产生了效果，大家都朝我望望，跟马夏说话的那一个人站起来替我们开了一道门。我们走进了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个先生坐在一张写字台前面。那个带我们进来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人。

“你们两个人里谁是巴贝兰抚养大的孩子？”那个坐着的先生用法国话问道；

听到他说法国话，我向前走了一步：“是我，先生。”

“巴贝兰在哪里？”

“他死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应当土这儿来的？”

我尽可能把他问我的事情经过简短地告诉了他。我一边说，那个先生一边记。我们一开始谈话，我就有一个问题急着想提出来，现在我想提出这个

问题的时候到了。

“先生，我的家在英国吗？”

“自然罗，它在英国，至少现在是在英国。”

“那么我就去看他们吗？”

“一会儿你就可以跟你家里人在一起了。我会叫人带你去的。”他拉了拉铃。

“我请你再让我问一句话，先生，我有父亲吗？”

我说出这句话来真花了不少力气。

“你不单有父亲，你还有母亲、兄弟和妹妹。”

“啊！先生。”但是门打开了，打断了我说的话。那个先生用英国话对进来的人说话。我相信他是叫他领我们去。接着他说：

“啊，我几乎忘记了，你的姓是德里斯哥，这是你父亲的姓。”

我相信我真会抱住他的脖子吻他，要是他给我时间的话；但是他却用手向我们指了指门，我们走出去了。

德里斯哥一家

那一个领我们到我的父母家去的文书，带我们上了一辆马车。他说了一声“贝斯那尔——葛林”。我知道在英文里葛林是“绿色”的意思。我因此想到那个地方准是种满了美丽的树，这教我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的车子在大街上走得很快，接着我们走进了窄小的街道，但是，周围的东西几乎一点儿也看不见，雾太浓了。

我们离开格雷士和盖来事务所已经好久了，这使我们肯定地认为我的父母是住在乡下；不一会我们就会离开窄小的街道到田野上了。我们在一个最糟糕的区里走着，这儿一定是到贝斯那尔——葛林草原以前的最后一个地区了。我仿佛觉得我们转了个弯，马车夫不时地放慢了速度，好象他也一点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忽然间，马车停了下来。

文书下了马车，对我们说了两声：“嘘，嘘”；很明显，是叫我们也应该走下车来。停车的这条街真是泥泞不堪。我们跟着带路的人向前走。我们上哪儿去呢？我开始不安了，马夏不时地对我望，可是他没有问我什么话。我们从大街走到了一条小巷，接着又走到了一个院子里，接着又走到了一条小巷。最后我们在一个院子里站住了，在这个院子的中央有一个烂泥坑。

为什么我们要停在这儿呢？我们已经到了贝斯那尔——葛林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院子里住着我的父母？但是……？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了。带路的人在一个白木板盖的房子门前敲起门来，难道我们已经到了？马夏一直握住我的手，现在握得更紧了。

我的心非常乱，一点不知道那扇门是怎样打开的。我只记得我们走进了一间大房间以后的事情。一盏灯和煤炉里的火光照亮了这间房间。在火炉前面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一个一动不动的白胡子老头。在他的对面，隔着一张桌子，坐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大概有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灰色灯心绒的上装，他的外貌显得很精明，但是挺严厉，那个女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披在那条黑白格子的围巾上面，她的眼睛没有神，她脸上露出来的表情和她懒洋洋的动作，都是冷冰冰的，似乎没有什么感情。在这间房间里，还有四个小孩，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头发跟他们的母亲一样，颜色是金黄的，象麻一样的金黄。

我们的领路人还没有讲完话，我一眼就把这些全都看在眼里了。他说了些什么话，我不能够听清楚，也一点听不懂。

“你们两个人谁是雷米？”那个穿灰色灯心绒衣服的男人，用法国话问道。

我向前走了一步，“是我，”我说。

“那么，你来吻你的爸爸吧，我的孩子。”

过去我想到这一个时刻的时候，我总猜想到我会觉得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使我投入我父亲的怀抱里。现在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兴奋。不过，我还是去吻了我的父亲。

“这是你的祖父，”他对我说，“你的妈妈，你的兄弟和姊妹。”

我先走到我母亲跟前，拥抱她，她让我吻她。

“去跟你的祖父握一握手，你走得慢点，他是一个疯瘫的人。”

我也跟我的两个弟弟阿伦、奈德和姐姐安妮握了握手，我想抱一抱那个小妹妹凯特，但是她正在逗卡比玩，把我推开了。啊，怎么搞的！我从前一

想到我将要有一个家庭，我将要有父母可以爱，而且他们也会爱我，我就快乐得发了狂，现在我却弄得不知道怎样是好了，我非常好奇地看着他们每一个人，在我的心里找不到话对他们讲！我难道不配有一个家庭吗？难道我是一个不懂情理的怪物吗？

要是我是在一个宫殿里，而不是在一个破房子里找到我的父母，我就不会对他们这样不亲热了吧。我想到这一点，感到非常羞愧；我又走到我的母亲跟前，第二次拥抱住她，跟她好好地吻了吻。她没有还我的吻，只用她的懒洋洋的神情朝我看着，然后轻轻耸了耸肩膀。

“ 这一个人是谁呀？ ” 我的父亲指着马夏问道。

我告诉他马夏和我是什么关系。

“ 你一定非常渴望知道为什么这十三年里我们没有来找你，过了十三年我们才想到去找巴贝兰， ” 我的父亲说， “ 到炉子旁边来，我把这事情讲给你听。 ”

我解下了背包，坐到了他指给我的位子上。可是，我正把一双湿脚向炉子伸过去，我的祖父却朝我这边吐了一口痰，我不用什么别的解释就知道我碍着他了。于是我缩回了脚。

“ 不要紧， ” 我的父亲说， “ 跟他在一起用不到客气。 ”

听到他提到这一个白发老人用这样语气说话，我很惊奇，在我看，如果应该客气的话，就应该跟他客气。我把脚缩到我坐的椅子下面。

“ 你是我的最大的一个男孩子， ” 我的父亲对我说， “ 当我娶你母亲的时候，有个年青姑娘以为我会跟她结婚。她为了报复，在你刚满六个月的那一天，就把你偷走，带到了巴黎，到了巴黎她就把你丢掉了。我们想尽方法来找你，但是我们没有去巴黎，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你带得这样远。我们没有找到你，以为永远也找不到你了，三个月以前，那个女人病得快死了，临死前，说出了真话，我就情经管我的事务的律师格雷士先生和盖来先生来找你。他们两个人没有把我这儿的地址通知巴贝兰，那是因为我们只有冬天住在伦敦，其它三季我们带着车子和全家人跑遍全英国和苏格兰，到处贩卖货物做生意，我的孩子，这就是你在十三年以后才给找到，回到自己家里来的经过。我明白你有点儿害怕，因为你和我们不熟悉，你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可是我希望你很快地就会习惯起来。 ”

是的，我一定会很快地习惯起来；我已经回到我的家里了，那些我要跟他们一块儿生活的人是我的父母兄弟姊妹，那么，我会习惯起来不是非常自然的事吗？

当初包我的好看的襁褓证明我有一个有钱家庭的想法完全错了。对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这真不幸。我不能够替他们做那些我过去梦想做的事情了，因为住在破房子里的那些流动贩卖货物的商人是不会有什么钱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终于有了了一个家庭了。亲人的爱比起钱来要宝贵得多，我需要的并不是钱，而是爱。

吃好晚饭，我以为我们要在炉子旁边度过一个夜晚；可是我的父亲对我说他在等一些朋友，说我们应该去睡了。说完话，他拿起一根蜡烛，领我们走到一间车房里，这间车房和我们吃饭的那间屋子相通。车房里有两辆一般总是流动商人用的大车。他打开了其中一辆的车门，我们看到里面有一张双层铺， “ 这就是你们的床， ” 他说， “ 好好睡吧。 ”

我的家庭——德里斯哥一家人就是这样来接待我的。

我的父亲留下了蜡烛，走了出去，但是他把我们车子的门关上了。我们只好睡觉，我们很快地上了床。马夏比我更不想讲话，他的沉默叫我很高兴。但是蜡烛点完了，我还没有能够睡着。

时间不断地过去，那种压在心上的说不出的恐惧，也不断地沉重起来，我的头脑里思绪纷乱，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恐惧了。恐惧什么呢？我一点也不知道，总之我真的感到恐惧就是了。

忽然，我听到车房门口传来了很响的声音，接着，一线亮光照进了我们的车子，我大吃一惊，赶紧朝四周望了一下，这时卡比醒了，它想叫。我用一只手捂住它的嘴，然后我向门外望去。

我的父亲走进了车房，他很快地打开了临街的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进来了两个背着很重的包裹的人以后，他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很快地把门关上了。

这时候他用一个手指头抵住嘴唇，另外一只拿着一盏手提灯的手指一指我们睡觉的这辆车子；这是叫他们不要弄出声音来，把我们惊醒。他这样的小心使我很感动，我很想去大声对他说用不着怕妨碍了我们，可是这样一来又会吵醒马夏，所以我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的父亲帮助那两个人卸下了背上的包裹，接着走开了一会，不过马上又和我的母亲一同回来了。父亲不在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打开了包裹：一个包裹装的全是布匹，另外一个包裹里装的是帽子和袜子一类的东西。

这时候我明白了，这两个人原来是做生意的，他们是来把他们的货物卖给我的父母的。我的父亲拿起每一样东西，在灯光下边仔细地看，然后交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用一把小剪刀把上面的商标剪下，放到她的口袋里。这件事使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同时做生意要选这样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奇怪。

两个包裹里的东西全都仔仔细细看过以后，我的父母和那两个人都走出了车房，我们四周又重新是一片黑暗了。我想对自己说我刚才看到的事情很平常，并不奇怪，然而不管我怎么样往好处想，我总是没法使自己信服。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看见我们车子里照进了灯光。我对自己说不应该再看了，可是我还是又看了。

只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了。我的母亲很快地把包裹包好了，同时，我的父亲在车房的一个角落里扫起地来。沙土扫掉后，立刻出现了一块地窖的门板。他掀起了门板。我的母亲这时已经捆扎好两个包裹，他就从这道门走下去，把它们背到了地窖里，我的母亲用手提灯照着他。两个包裹全都放好后，他把门板盖上，又用扫帚把扫走的沙土扫回来。然后他们走出去了。

马夏好象在铺上动着。他也看到了刚才这些事情了吗？我不敢问他。逼得我透不过气来的不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害怕了。我从头到脚出了一身冷汗。

开锁的声音使我醒过来，弟弟阿伦打开了我们的车子的门。他对我们说我的父亲已经出去了。我们应该到厨房里去。我在门口看见了我的母亲，她的头倚在桌子上。我猜想她是病了，我跑到她的跟前抱住她。这时候我从她的暖和的呼吸里闻到一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向后退，她的头无力地垂在她的伸在桌子上的两条胳膊当中。”她喝了壮松子酒，”我的祖父说。

我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我拖了马夏往外走。

我们两个人并排走着，走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一直向前

走，也不知道往哪儿去。最后我们走到一个草地很多的公园里。

等我们在一个冷静的地方一坐下来，我就倒在马夏的怀里，大哭起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样不幸。

“马夏，”我对他说，“你必须离开，回到法国去，回到意大利去，不管你去哪儿都可以，只要不留在英国。”

“那么你呢，你想上哪儿去？”

“我吗！我应该留在这儿，留在伦敦，跟我家里人在一起：难道这不是我的责任吗？把我们剩下来的钱拿着，离开吧？”

“雷米，不要这样说：如果有人离开的话，那应该不是你。”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把话说完，转过头去。

“马夏，老实地告诉我，要对我坦白，不要吞吞吐吐，不要害怕；昨天夜里你没有睡着是不是？你看见了吗？”

他低下头来，用低低的声音说：“我没有睡，我什么都看到了。那些出卖这些货物的人，他们的货物不是买来的。”

“所以你看得出，你应该离开。”我对他说，“你应该回到法国去，并且去看我的所有朋友，对他们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做那些答应过他们的事了。你对他们解释我的父母不是有钱人。没有钱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啊。”

“你叫我离开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养活我，我对他们并不是一个负担，我可以替他们干活。完全是因为你昨天夜里看到那些事情以后，你为我害怕了。你怕我也有一天会去剪那些不是买来的货物的商标。”

“啊！别说了，马夏，我的小马夏，别说了！”

我用手掩住了我的羞得发红的脸，

“是啊，如果你为我害怕，”马夏接着说下去，“我也为你害怕，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要对你说：一同离开，回到法国去吧。”

“不可能！我的父母对你说来是无关紧要的，你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义务，我呢，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孝敬他们，爱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是你的父母，那你应该这样，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你的父母呢？”

“为什么他们不是呢？你没有听到我的父亲说的吗。”

“他说的那些话，证明了什么呢？他们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们叫人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个。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有两个孩子在同一天给丢在勃勒德依路上呢？这是很可能的事情。”

“这绝对不可能。”

“也许不可能；但是你还得注意一件事，你既不象你父亲，也不象你母亲，你的头发不象你的兄弟姊妹那样是金黄色的。另一方面，没有钱的人怎么能花了那么多的钱来寻找一个孩子？照我看，你不是德里斯哥家里的人，你不应该留下来跟德里斯哥家里的人待在一起。要是你说什么也要留下来，那我也留下来陪着你。不过你要写一封信给巴贝兰大妈，问问她那块包你的褪褌究竟是怎样的：等我们接到回信以后，你再去问问你叫做父亲的那个人，那时候我们也许能够对这件事情看得比较清楚些了。”

“孝敬你的父母”

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已经回家了，他问我们：

“你们在法国是怎样赚钱生活的，讲一点给我听听。”

我就把他问我们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我拿起竖琴，弹了一首曲子，但是这不是那一首《那不勒斯歌》。马夏也拉了一首小提琴的曲子，又吹了一阵短号。

“很好，很好，”我的父亲说，“卡比呢？它玩的是什么把戏呢？”

卡比玩了几套把戏，它的表演照例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这条狗可真是摇钱树。”我的父亲说。

我回话的时候把卡比夸赞了一番，并且说不管教它什么，它很快就能学会。我的父亲把我的话翻译成英国话，他好象又加上了几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全家都干活挣饭吃，”我的父亲继续说，“所以我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雷米和马夏可以上街去表演音乐，我相信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很好，特别是快要到圣诞节了。卡比跟阿伦和奈德一起出去表演。”

“卡比只能跟我一起干活，”我赶紧说。

“它会学会跟阿伦一起干活的，你们分开会赚得更多。”

“但是我可以对你肯定他说它什么都不会做得好的。”

“别说了”我的父亲对我说：“我怎么说，我就要别人怎么做，而且立刻照着做，这是我们的家规。”

我们两人回到了我们的车子里睡觉的时候，马夏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你看到了吧，你叫做父亲的那个人，不单单想孩子替他干活，他还想到狗也该干活呢。这总该叫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吧？”

第二天，我的父亲要亲自带我们到一个最易赚钱的市区去，于是我们穿过了整个伦敦城，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全是漂亮的房子，所有的街上都有许多纪念碑，街道两旁都是花园。我们很迟才回家。我看到了卡比，真高兴极了，它全身泥浆，但是样子很快活。

接着几天都是这样子。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对我说第二天我可以带着卡比一起出去了，马夏和我两人决定带了卡比多赚一点钱来，好让他以后永远把卡比交给我们。

不幸，起了两天大雾，一点也没有散，街道上弥漫着灰白色的雾气，使人几步外就看不出东西。人们不大出门，出来的人也不大能看到卡比：这对我们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迅速地走着，走到伦敦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来了。忽然我发觉卡比不再跟在我们后面了。我站住了脚等它，同时轻轻地吹着口哨，因为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看见。我担起心来，害怕它是不是给人偷去了，这时它却奔到我们前面，嘴里衔了一双羊毛袜，一边摇着尾巴。它把两只前脚攀到我们身上，同时把袜子衔给我们，象是要我们接住。它显得很得意，好象它玩的是一套极难玩的把戏，要我称赞它。这样子过了好几秒钟，我惊讶得呆住了，马夏突然对我低声他说：“快点往前走，不过不要跑。”

过了几分钟，他才对我解释道：

“我刚才听见有一个人说：‘小偷在什么地方。’小偷就是卡比；如果没有雾，我们都会给人当做小偷捉住的。”

我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他们把卡比训练成一个小偷了！

我们牵着卡比赶紧回家。父亲、母亲和那几个孩子都在忙着折布。我把

那双袜子往桌子上一丢，阿伦和奈德见了都笑起来了。

“看这双袜子，”我说，“这是卡比偷来的，因为有人把卡比训练成一个小偷了。我想这是为了好玩才这样的吧。”

我全身发颤，可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的态度有这样坚决过。

“要是这不是为了好玩，”我的父亲问道，“那你想怎么样呢？”

“那我就用一根绳子捆住卡比的头颈，把它投到泰晤士河里淹死它。我不愿意卡比变成一个小偷，我更不愿意我自己也变成一个小偷。”

我的父亲盯住了我看着，他那双眼睛象要把我烧着一样：可是我没有把眼睛垂下来，他的绷紧的脸渐渐地柔和了。“你说得很对，这只是好玩罢了，”他说，“而且，为了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卡比以后就只跟你一同出去吧。”

我曾向我的弟弟阿伦和奈德表示亲近，他们却一直用一种故意做出来的仇视态度来回报我，自从发生了卡比的这件事以后，这情形愈加清楚了。大女儿安妮，对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好感，没有一天她不想出一个花招来作弄我。只有小凯特，她很愿意我去抚爱她，因为我总带给她糖果、糕饼和橘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表演的时候，孩子们送给我们的。

我刚在英国下船的时候，我的心里对这个家庭充满了感情，现在，整个家里却只有小凯特能让我爱了。我的祖父每次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总是用劲地不断向我吐痰；我的父亲只是在每天晚上问我讨当天收入时才想到我；我的母亲老是喝酒，终日喝得迷迷糊糊的。

我失望了，而且感到非常悲伤，我焦急地等待着巴贝兰大妈的回信。回信终于来了。信里面把我被人发现的时候穿的衣服都一样一样写了出来，此外，还告诉我这些衣物上平常绣名字的地方都剪去了。

接着，巴贝兰大妈又写了几句非常关切我的话，他想安慰我不要因为没钱难过，但她没有猜想到使我感到不幸的并不是贫穷。

可怜的巴贝兰大妈！因为她爱我，他就猜想所有的人都应该跟她一样爱我！她怎么会猜得到我所受到的冷落啊？

要我的父亲把当初我给偷走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告诉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个下雨天，天很冷，我们回到家里来，我终于开始谈到这上面来，我刚提出了我的问题，我以为父亲要发脾气了，但是他却一点也没有发出来：他只略略有点儿不高兴，接着就开始笑了，在这个微笑里的确含着无情的和残酷的意味，不过这总是微笑啊。

“为了要找到你，”他说，“我一直部在想依靠你的襁褓上的记号：‘弗·德。’那两个字，这是你的姓名弗朗西斯·德里斯哥的缩写；但是这个记号给偷走你的人剪掉了，那个人想这样一来，别人就永远找不到你了。”

接着，他列举出巴贝兰大妈提到的各种东西，说得一点也不错。

还有什么好问的呢？但是，当晚上我们回到我们的车子上时候，马夏好象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一样，他低下身子对着我的耳朵低声他说：

“你不是德里斯哥老板的儿子，而是德里斯哥偷来的儿子。”

我想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讲法，可是马夏已经爬到他的床上去了。如果我是马夏的活，我也许会跟他一样有这样的想法。的确，在我的处境当中有一些叫人奇怪的事情。

象这样的穷人怎么会让他们孩子的衣服上镶着花边呢？为什么阿伦、奈德、安妮和凯特的头发都是金黄色的，我却不是金黄色的呢？为什么在德里斯哥家里所有的人，除了还不懂事的凯特以外，都对我感情不好呢？

对于这些“怎么”和“为什么”，我只有提出合理的反问来回答：

“为什么德里斯哥一家人要找我呢，如果我不是他家的孩子？为什么他要把钱送给巴贝兰，送给格雷士和盖来呢？”

马夏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一类的争论只能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使我比从前更加不幸了。

我心里虽然非常忧愁，但是每天还得唱歌，奏乐，一边装出各种滑稽相，一边笑。

星期天是我的最愉快的日子了，因为星期天在伦敦街上是没有人表演音乐的，我能够自由地一个人伤心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正预备跟马夏出门，父亲把我留在家里，对我说这一天他需要我，他叫马夏一个人出去散步。我们两人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有人来敲门了。我的父亲去开门，接着陪了一个先生进来，这个人跟他平常来的朋友不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英国人所谓的绅士，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先生。他有五十岁左右，他使我最觉得惊奇的是他的微笑，他一笑就露出了他的又白又光的、象小狗牙齿一样的牙齿，看到他，真会叫人间自己他是因为微笑而缩紧了他的嘴唇，还是打算咬人。他和父亲谈了几分钟话以后，就不说英国话而说起法国话来，他的法国话说得非常流畅。

“你对我说过的就是这个小孩吗？”他指着我说。“他身体好象很健康，他没有生过病吧？”

“我生过一次肺炎，因为在雪地里睡过一夜。”

“这有很久了吗？”

“有三年了。”

“以后你没有再发过这种病？”

“没有。”

他站起来向我走过来；他摸摸我的胳膊，然后他把手放在我的心口，后来他又把耳朵贴在我的背上和胸膛上听，一边叫我用力呼吸。他还叫我咳嗽。做好这些以后，他对我仔细地看了很久，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个爱咬人的人，他的微笑是多么可怕啊。他什么话也不对我说，又用英国话和我父亲谈起来，后来，他们两人出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对我说我可以自由地去散步了。

天在下雨，我回到我们的车子上去穿那件羊皮背心。我看到马夏在车上，真叫我吃了一惊！他把手捂住我的嘴，低声说：

“你去把车房的门打开，我轻轻地跟着你出去，不能让人知道我在车子上。”

到了街上，马夏才敢对我说话。“你知道刚才跟你父亲一块儿的是谁？”他对我说。“那是詹姆士·米里甘先生，你的朋友亚瑟的叔叔。”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路当中。他抓住了我的胳膊，一边走一边继续说：

“你的父亲陪着个绅士走到了车房里，我无意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你的侄儿怎样啦？’你父亲问。‘病好了，这一次他又逃出了危险。他亲爱的母亲的小心看护又救了他的命，米里甘太太是一个好母亲。’你想得到，听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注意起来。‘那么，要是你的侄儿病好了，’你的父亲接着说，‘你所有的计划不都没有用了吗？’‘也许现在没有用了，’那个人回答说，‘但是我不要亚瑟活下去。等到他死的那天，必须没有一个和我争家当的人，唯一的继承人就是我詹姆士·米里甘。’‘你放心好了，’

你的父亲说，‘我保证你会如意的。’”

听到马夏这样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去问我的父亲米里甘先生住在哪里；但是我差不多立刻就懂得这是一个愚蠢透了的想法。那个人正不耐烦地等待他侄儿死掉，绝对不能向他去打听他的侄儿的消息。而且，把听到他们说的话这件事告诉米里甘先生，这也是非常鲁莽的。

亚瑟还活着。他的病好起来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已经够高兴的了。

我们只好等待，我们等待着。

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依旧不断地在伦敦到处跑，因为我们不是那些在一个区里享有特殊权利的音乐师，我们年纪大小了，来的时间也太短了，所以不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区域表演，那些人知道用各种理由来证明他们对地盘有所有权，我们没有力量反驳，只有把地方让给他们。有好多次，我们不得不赶快避开，把场子让给那些名气挺响的黑人乐队，英国人所谓的“黑炭”乐队。这些穿了希奇古怪的礼眼、假扮成的黑人，最叫我们害怕。我们一看见他们来了，就规规矩矩地停止演奏，离得他们远远的。

有一天，我看到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人招呼马夏，马夏也亲热地向他回礼。

“难道你认识他吗？”我问他。

“这是我的朋友包勃，我对你说过的，在嘉索马戏班里有两个英国小丑，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懂得的一些英国话主要就是他教的。”

“黑炭乐队”表演完以后，包勃向我们走来，瞧他走近马夏的时候的样子，我就看得出我的同伴是多么会叫人喜爱了。无疑地，由于对马夏的友爱，包勃对我也很有好感，立刻我们有了个朋友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教导，我们在伦敦谋生比起过去要容易得多了。他有好多多次向我们提议三个人一同合起来表演，就是说我们四个：他，马夏，卡比和我。但是，如果说我不愿意离开家去看丽丝和我从前的朋友，我自然更不愿意离开家跟包勃在一道。

马夏没有把使我们担忧的事都告诉包勃，但是他把有些事情对他说了。他问包勃有没有法子找到一个米里甘太太的地址。但是包勃回答说姓米里甘这个性的人在伦敦有成千上万，在全英国那更是数不清了。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马夏又开始对我说我们应该回法国去了，我们又争论起来，而且争论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我很担心，你看，我们总有一天会大祸临头的。”马夏说，“我们走吧。”

可是我不能下决心听从马夏的劝告。

光阴慢慢地流过去，流得真慢，不过日子总在过去，一天过了又一天，一星期过了又一星期，全家应该离开伦敦到全英国各地去的时候到了。两辆车子全已经新漆过一遍，他们把地窖里的货物都装到了车子上，想乘好季节卖出去。

离开伦敦，离开这所破旧的房子和这个地窖的阴暗的进口，和马夏、卡比一起在大路上走，我真觉得自己得到了解放。

包勃

我们离开伦敦有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到达了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市郊将要举行赛马。在英国，遇到赛马的日子好象过节一样热闹。在那些用来做赛马场的平地上，来了许多流浪的卖艺人和流动小贩。这些人来到后，这儿就跟市场一样了。

那天晚上，有好多帐篷搭起来了，从远处望过来，处处是一缕一缕的烟，在烟的四周，一些穿了古里古怪的旧衣服的人在忙碌着。

那些篝火上面都吊着一口锅子。我和马夏走过这些篝火人前面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包勃。他看到了我们，显得很高兴，他跟两个伙伴一同到这个赛马的地方来，准备表演几场武术和技巧，但是他们原来约好的乐队失信没有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他们一个大忙：替他们来奏乐，收入的钱我们五个人平分，甚至卡比也可以得一份，我们能自由地做那些对我们合适的工作，只要有一笔好收入就行了。我同意了包勃的要求。

我们讲好了第二天来听包勃和他的两个朋友分配工作。但是，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以后，就遇到了困难。

“明天我需要卡比，”他说，“你们不能带它去。”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不大放心；他们又要卡比来干什么坏勾当吗？可是我的父亲立刻消除了我的忧虑。

“卡比耳朵很灵，”他说，“它什么都听得到，是一个好守卫。它可以很好地来看守我们的车子，你们两个人去跟包勃表演吧，我们住在大橡树旅馆，你们上那儿来找我们。”

我们头一夜也住在这家大橡树旅馆，它开在离这儿一里路外的旷野当中。上那儿的路是笔直的，别的困难也没有，只是干活干了一天以后很累，再走着去路显得长了些。

第二天早上，我们叫卡比吃了东西喝了水以后，知道它不会饥渴了，就把它系在车子上，让它守好车子，我们走了。

我们一走到就开始了表演，一直奏到半夜十二点钟没有休息一会儿。我已经不晓得自己是在奏些什么了，马夏也不比我好。包勃一次次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表演，但是我们一次次开始奏起新的曲子。

我们累坏了，我们的同伴也是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不止一次地失了手。后来，一根他们用来表演本领大的木杆倒了下来，压到马夏的脚尖上。我以为他的脚要压碎了。幸好伤并不这样严重，只是擦破了一点肉，骨头没有断。不过马夏不能走路了。

我们决定他留下来睡在包勃的车子上，我一个人回大橡树旅馆去。我应该晓得德里斯哥一家人明天要上哪儿去。

“我们明天一道去，”马夏对我说。“今天晚上不要去了。我害怕。”

“害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替你害怕。”

“让我走吧，我答应你明天一定来。我把我的竖琴留给你，那么我准会来拿它的。”

我不管马夏怎样害怕，也不管自己怎样疲倦，还是走我走得很快，最后走到了大橡树旅馆；但是我找我们的车子，找了好一会儿却没有找到。我敲旅馆的门，旅馆老板亲自来开门。

“你们的车子开走了，”他说。“你的父亲关照过要你上娄维斯去找他们，你得连夜快点赶去。祝你一路平安！”说完他就把门关上了。

我就算知道娄维斯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能丢下了马夏一个人去。我得回到赛马场去，虽然我已经疲倦得不得了。我又往回走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在包勃的车子里了，跟马夏并排地躺在一捆麦秆上面。

我醒来的时候，马夏还没有醒。我走出车子，向正在生火的包勃走去，这时候我好象看到一个警察牵了卡比走过来了。

我吃了一惊，站住不动了，可是卡比认出了我，挣脱了绳子。它跳了几跳，跑到我的跟前，又跳到我的怀里：那个警察也走了过来。

“这条狗是你的吗？”他问我，“那好，我要把你逮捕了。”

他的手捉住我的胳膊，紧紧地把它用力握牢。

包勃看见警察把我这样抓牢，他站起来走了过来。

“喂，为什么你要逮捕这个孩子呢？”他问。

“昨天晚上，有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偷偷走进了圣乔治教堂。他们带了这条狗去替他们望风，我们后来在教堂里找到了它。我们知道领着狗准能找到偷东西的人。我捉住了一个了：你的父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回答，我呆住了。父亲问我要卡比并不是为了看守车子，而是因为它的耳朵灵敏，能够把什么动静告诉给在教堂里偷东西的人。车子没有留在大橡树旅馆，这是由于偷盗事情给发觉，他们不得不逃走了。

“请你向他解释我不是一个小偷，”我对包勃说，“因为我跟你们在这儿一直待到半夜一点钟。”

包勃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听；但是警察却不相信。

“小偷到教堂里去的时候是一点一刻，”他说，“我把这个小孩带走了，他有话对法官去说吧。”

马夏扑到我的怀里。“我们不会把你丢掉不管的，”他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把卡比留下来，”我用法国话告诉马夏。但是那个警察明白了我的意思。

“不行，不行，”他说，“我要把狗带走，它替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要替我找到另外几个。”

关我的监牢真正是一个监牢。我看那些墙大约有一尺厚，门上遮着一块铁板。我打开窗子看：一根根的窗栅栏都嵌在石头里。无疑地任何人都不能逃出这座监牢，就是有什么好朋友的帮助都不行。此外，在法律面前，象马夏这样一个小孩能有什么用呢？就是象包勃这样一个大人肯帮助马夏，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早上，管监牢的人拿着一个小罐和一个面盆进来，他要我洗脸，因为我马上就要上法庭去了。我很想准备准备答辩的话，但是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管监牢的人又来了，叫我跟着他走。我们走过好些过道，走到一扇小门前面，他把门打开。一阵热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听到一阵嘈杂的嗡嗡声。我到了声庭里了。在一处席位里，我看见包勃和他的两个伙伴，大橡树旅馆的老板，还有些我一点也不认识的人。在另外一处席位里，坐着逮捕我的那个警察。四周的旁听席上都坐满了人。我看到马夏坐在一道栏杆上，我们两人互相看见了后，我觉得自己胆子大起来了。

检察官说话了，他那样子象是很匆忙，没有用多少话就把事情经过说出

来：“在圣乔治教堂发生一件盗窃案，小偷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用一架梯子爬进了教堂，并且打碎了一个窗子。他们带了一条狗去给他们望风，可以告诉他们有什么危险。一点一刻光景，有一个晚回家的人看见教堂里面有微弱的灯光，非常惊讶，就立刻叫醒了教堂看守人，好多人一起到教堂来，可是这时候狗叫起来了；人们打开了门，小偷吓得跳出窗子逃走了，连狗也不管了，因为这条狗不会爬梯子，这条狗给警察杰雷带到了赛马场，它真是说不出的聪明忠诚，它认出了它的主人。这个主人不是别人，就是坐在这条凳子上的被告。至于第二个小偷，我们也有了它的线索了。”

法官在举出一些可以证明我的罪行的理由以后，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是什么职业。

我用英国话回答他，然后我请求他答应我用法国话来替自己辩护。

“不用想欺骗我，”法官对我说，“我懂法国话。”

我用法国话来替自己辩护了，我既然在赛马场，两点半钟我才到大橡树旅馆，一点钟又怎么可能在教堂里呢。

“一点一刻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法官问。

“在路上。”

“这要有证明。你说你在去大橡树旅馆的路上；可是起诉书上却认为当时你在教堂里。”

我尽力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看到法官并不相信我的话。“你的狗在教堂里，你对这一点怎样解释呢？”他问我。

我不能解释，我甚至可以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我的狗没有和我在一起，那天早上我是把它系在我们的一辆车子上面的。”

我不能说得再多了，因为我不愿意给人抓住把柄来对付我的父亲。他们叫上来一个证人，那是教堂的看守，后来，他们又听陪着他走进教堂的那些人说明当时情况：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只看到小偷从那儿逃走的那扇开着的窗子。最后，传我的证人了，那是包勃，他的伙伴，旅馆老板，他们都证明了我昨天晚上几时在什么地方，几时又在什么地方。

审问结束了，法官宣布说我得移到郡的监狱里去，在那儿等待大陪审团决定我要不要到重罪法庭受审。重罪法庭！我四肢无力地坐了下来，天啊！我从前为什么不听马夏的话呢？

我给带进了我的牢房，过了好久以后才想到为什么不把我当场释放的理由。法官想等到把进教堂的人捉到以后，看看我是不是他们的同党。刚才检察官说，他们已经有了线索了，我就要跟他们并排坐在重罪犯法庭的长凳上了，我会感到多么难受多么羞耻啊。

我不再因为焦急而感到不耐烦了。我知道应该等待。我一会儿走来走去，一会儿坐在凳子上，我等待着。

在天快黑以前，我听到了一阵吹短号的声音，我听得出来那是马夏在吹，那个声音从我窗子外边的墙外边传了进来。很明显，马夏是在墙的那一面的路上。我明白那是马夏，一定也有包勃，在表演把戏，为什么他们要挑选这个地方呢？

忽然我听到了马夏用法国话很清楚的叫道：“明天一清早！”接着，短号立刻吹得更响了。

马夏的这句话不是对他的英国观众说的，而是对我说的，但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不容易猜出来。

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不会错的，那就是明天一清早我应该醒来，仔细地守着。最后，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是深夜里。四周一点声音也没有，离天亮一定还早得很。不一会，一架钟敲了三下，我醒得太早了，可是我不敢再睡了。

我靠住了墙，眼睛盯住窗子看，我好象觉得天有一点亮起来。我站起来，踮起脚向窗子走去，打开了窗子。

一样样东西开始看得比较清楚了，天快亮了。

忽然我看到从墙那边伸出一个头来；那不是马夏的头。虽然天还很暗，我认得出来那是包勃。“嘘！”他低声地叫了一下。他对我做了一个手势，象是要我离开窗子远一点。我不懂什么意思，却照着做了。这时候，我看到他另外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发亮的长吹管，同时我看到一个小白球落到了我的脚跟前，马上包勃的头就在墙后面不见了。

我赶快拾起小球，它是用一张很薄的纸头卷成的，包在一个大铅丸上面。我好象看到纸上写着一些字，但是天还没有怎样亮，我看不大清楚。我得等天亮。

我多焦急啊，天空慢慢地变成黄色，真是太慢了，最后窗口里投进来一道红光，我打开这张纸看了起来。

“明天晚上，你就要给送到郡监狱去：你跟一个警察在一起坐火车去，你要设法坐在靠车门的地方。你坐了四十五分钟以后（要计算得精确），火车因为到了交轨处要放慢速度；这时候你打开车门：向下跳，跳时要双脚朝下；跳到地上后，你就上左边的一个山坡上来，我们在那儿等你，不用害怕，祝你成功。”

我有救了，我不用到重罪法庭出庭了！啊！可爱的马夏，好心的包勃！因为马夏单独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做出这样妥善的安排的。不过，在我极端高兴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件伤心的事情：卡比怎么办呢，马夏是不可能把卡比丢掉的，他既然想出了一个法子来救我逃走，他一定也找得到法子救卡比逃走的，我把这张纸张又看了两三遍，然后把它嚼碎吞到肚子里。

第二天下午，一个警察走到了我的牢房里，叫我跟他走。事情就象马夏安排的一样，火车开动以后，我在车门旁边坐下来，那个警察坐在我对面，在我们这间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靠着车门坐着，车门上的窗子是开着的。我把我的左手慢慢地滑到外面，转动了门把手，用右手拉住了车门。

时间不断过去，火车叫了一声，放慢了速度。这一个时刻到了，我迅速地推开了车门，尽力地向远地方跳；我的一双向前伸的手碰到了长满草的山坡：可是我摔得这样猛烈，使我滚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天鹅号”

我的后来的遭遇充满了幸运的事情。

我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在一辆两轮马车里，我要一直坐到看见一艘由包勃的哥哥驾驶的到法国去的船的时候，才从那辆马车上下来。包勃答应马夏救我，他出色地实现了他的诺言。他还从杰雷警察手中偷来了卡比。卡比也在这儿，马夏对我详细叙述我的脱逃和包勃的计策的时候，卡比用它潮湿的舌头舐着我的脸。包勃不肯接受我们的感谢，他说我们也帮过他的忙，他能替马夏尽力觉得很高兴。大家谁也不用感谢谁。

我们在法国上岸以后，马夏就有了一个主意，他不肯向我承认有这个主意，但是我却猜得出来，我不敢相信它可能成功。这就是他决定我们去找米

里甘太太，我们沿着所有的大江小河和运河找，非要找到天鹅号不可。

真是太奇怪了，真是太神妙了，我们真的找到了天鹅号啦！

它比我们早两个月，沿着塞纳河向上流走。迟两个月没有什么关系，主要问题是不要失去它的踪迹。我们跟着它的踪迹走，先到了德鲁齐，米里甘太太经过那里的时候，把丽丝收留到船上去了。多么好的运气！我们走得更加快了，我们跟着天鹅号和船上的乘客走，一直走到罗讷河上的塞西尔。

到了那儿，等着我们的却是一场失望。那只船停泊在岸边，船上一个人也没有，花也没有了，马也没有了，那副样子象是给主人丢弃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亚瑟怎样了？

幸好负责看管天鹅号的一个人很快告诉了我们，米里甘太太把这只船丢在这儿，因为罗讷河往上去不能通航了。她现在住在瑞士维威附近，将要带了两个小孩在那儿过冬。看管船的人不知道她的详细地址。

我们还得走几天路才能休息！四天以后，我们到了维威。我们来得正好，因为我们的口袋里只剩下了三个铜板，鞋子也没有鞋底了！

但是维威这地方再加上附近有那么多的小镇，范围比一个城市大得多，那儿住着许多英国人，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米里甘太太的住址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最后一个办法：沿着每条街道唱我们一向唱的歌曲。我们这样计划好了。结果收入很好。我们寻找的范围扩大起来，但是无论什么地方我们也找不到一点儿可以引导我们找到目标的征兆。我们没有失去勇气，仍旧每天早晨出门，挑选最漂亮的街道，在最华丽的别墅大门前面停下来表演。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扇大铁门前面奏着曲子，在我们后面是一道矮墙，不过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它。我高声唱完我的《拿不勒斯歌》的第一段，正要开始唱第二段，忽然听见在我们后面那道墙里面发出一声叫声，然后那个人唱起第二段来，声音很低，很古怪。

这是什么人的声音呢？我听不出来，然而卡比做出了各种表示极端快乐的动作，对着墙想往上跳。我再也耐不住了，大声叫道：“谁在唱呀？”那个声音回答道：“雷米！”

没有回答我，却喊了我的名字！我和马夏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弄得莫名其妙。在墙的那一头露出了一块白手巾迎风飘着，我们往那边跑过去。我们终于能够看到摇动手巾的人了----那是丽丝！

丽丝会唱歌了！丽丝会说话了！真的，我曾经无数次听人说丽丝总有一天会说话的，特别可能的是在她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但是我却一直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可能的。现在这却成了事实；她说话了，奇迹出现了，这是因为她听见了我的歌声，情绪万分的激动的缘故！我一想到这一点，自己也非常激动起来，使我不得不用一只手支住了一根树枝，但是这不是发痴的时候。

“米里甘太太在哪里？”我说，“亚瑟在哪里？”

丽丝动了动嘴唇想回答我：但是从她的嘴里只说出来一些含糊不清的字音。于是她焦急地做起各种手势，想教我们能快一点明白她的意思。我跟着她的手看过去，看到在花园里，一条小路转弯的地方，有一个用人推着一辆长长的小车子。亚瑟就躺在这辆车子里，在他后面，跟着他的母亲和.....我向前探出身子，想看得清楚些.....是詹姆士米里甘先生，我立刻在墙后面蹲下去，一边赶紧告诉马夏，叫他也把身子蹲下去。

等我的惊慌过去后，我低声对丽丝说：

“不应该让詹姆士·米里甘先生看到我。不要提到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再上这儿来，你想法一个人来，现在你走吧。”

她还不想走。

“走吧，我请求你，不然的话你要害了我啦！”说完，我们就跑到长着好多葡萄藤的地方躲了起来。躲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可以谈话，也能听得见对方的说话。

“你知道，”马夏对我说。“我可不愿意等到明天才去见米里甘太太；我要马上去见她，把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对她说。米里甘先生没有见过我，他不会因此联想到你和德里斯哥一家人的。”很明显，马夏的建议很正确。我让他去了，并且跟他约定好在离这儿不远的栗树林里见面。

我躺在青苔地上等马夏回来，等了好久，最后我看见他陪着米里甘太太一同来了。我跑到她跟前，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亲着，但是她把我抱住，弯下身子来吻我的额头。

这是她第二次吻我，但是前一次好象没有这一次抱得紧。

“我的孩子”他说，“你的同伴告诉了我对于你、对于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谨慎地行事才行。从今天起，你和你的小朋友，应该放弃你们的悲惨生活。在两小时以后，你们上阿尔卑斯旅馆去，我要在那里替你们定一个房间。我们在那儿再见吧，”

她又吻了我一下，然后急忙走开了。

“你对米里甘太太说了些什么？”我问马夏。

但是他避开不肯回答，或者是只对我绕圈子说话。

我们照着米里甘太太的吩咐，向阿尔卑斯旅馆走去，一路上，我们谈着一些别的事情。

第二天，米里甘太太来看我们了。她还带了一个男裁缝和一个做衬衫的女裁缝来。他们量了我们的尺寸，替我们做衣服和衬衣，她对我说丽丝一直在试着说话，医生肯定地说她现在已经好了。

以后她接着来了四天，到了第五天，她没有来，一个我从前在天鹅号上看见过的女用人来了，她对我们说米里甘太太在自己家里等着我们，一辆马车等在旅馆门口接我们。这是一辆没有篷的四轮马车，马夏很神气地坐了上去，就象他从小自己家里就备有马车一样，卡比也自由自在地爬上了有垫子的座位。

我觉得路途非常短。我们给带进了一间客厅，米里甘太太、躺在一张沙发上的亚瑟，还有丽丝都在那儿。亚瑟对我张开了胳膊，我跑过去，抱住了他吻他。我又去拥抱丽丝。米里甘太太却是先拥抱了我吻我。

“终于，你可以得到属于你的身份了，”她对我说。

我朝着她看，正想问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她打开了一扇门，我看到巴贝兰大妈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些小孩穿的衣服。我正在拥抱她吻她的时候，客厅的门打开了，走进来詹姆士·米里甘先生。他微笑着，露出他那尖尖的牙齿；他看到了我，立刻收起了微笑，现出可怕的怪相。

米里甘太太不让他先说话。

“我把你请来，”她说，声音是缓慢的，却有点儿发颤，“是给你看看我的大儿子，我终于很幸运地找到了他。他就在这儿，不过你已经认识他了，因为你曾经到过那一个偷他的人家里，去看过他，想知道他的健康情况怎样。”

“这是什么意思？”詹姆士·米里甘先生说，脸变了色。

“那个人现在因为犯了偷窃教堂物件的罪关在监牢里了，他把事情全部坦白了。这儿有一封证明这些事的信。他说出了他怎样偷走这个小孩，怎样把他丢在巴黎勃勒德依路上；后来他怎样剪去孩子衣服上的记号，让别人不能再找到他。你愿不愿意看看这封信？你愿不愿意看看这些衣服？”

詹姆士·米里甘一声不响地待了好一会儿，无疑地，他是在想要不要把我们全都扼死，后来他向门走去：不过在打算走出去的时候，又转过身来。

“我们来看看法庭对这件事的意见吧，”他说。

米里甘太太一点儿也不惊慌，现在我可以叫她做妈妈——她回答道：“你可以把我们叫到法庭上去；我却不会控告那个是我丈夫的兄弟的人。”

我的叔叔出去后，门马上又关上了。这时候，我的妈妈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投进了她的怀抱，这是第一次我们俩同时互相亲吻。

团 圆

好多年过去了，但是时间过得却非常快，因为这些年里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日子。没有家庭，没有依靠，在生活中被人抛弃，到处流浪的苦儿，不仅仅有了相亲相爱的母亲和弟弟，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祖先，他现在已成了一个祖传下来的古堡的继承人。

今天晚上，我在我们全家居住的米里甘别墅的住宅里，邀集了在我受苦难的日子的所有的朋友，我把叙述自己流浪生活的书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在我的流浪生活里都有一个位置，我的礼物就好象对他们给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在这个聚会里只少了一个人，幸福的力量虽然非常大。

但是它却不能使死去的人复生。可怜的亲爱的老师父啊，

我要是能够保证你得到安息，我将会怎样的快乐啊！如果你老年受到尊敬，你一定会重新用你的真名实姓，年老的流浪汉维达里，一定会变成著名的歌唱家卡洛，巴查尼。不过你放心好了，我没有忘记你，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在我这个没有前途的儿童冒险生活中，我没有跌倒，我没有摔跤，我的老师父，这都是你的功劳！

我的母亲走过来了。她扶着亚瑟的胳膊。现在不是母亲来扶儿子了。跟我们的叔叔预料的完全相反，弟弟已变成一个又漂亮又强壮的青年，他关切地向母亲伸出胳膊。

在他们后边走着的是个老婆婆，抱着个婴孩。那婴孩是我的儿子小马夏。老婆婆就是巴贝兰大妈。她离开了她的村子，脱离了她过惯的生活，离开她的朋友和我们送给她的母牛，到英国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还有一个是丽丝，小丽丝已不再是个哑巴了，不过她还是那么娇小、轻捷，使她更美丽动人。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我曾请求母亲答应我娶她做妻子，母亲非常赞成。但是今天晚上，丽丝不大跟我说话，他的受惊的眼睛，依然跟从前那样，盯着她的刚刚到达的一家人看，她的富于表情的脸显出她重见亲人的快乐。她的父亲，他的卡德琳姑母，艾金勒特，阿列克西和般若曼全都来了。

我们全体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往事。

“最近我在好多赌场里遇到一个牙齿又白又尖的绅士，”马夏说，“他虽然赌运不好，却老是在笑，詹姆士·米里甘一赌就输，”

你为什么要在雷米前面讲这些事情呢？亲爱的马夏。”妈妈说。”他又会去帮助他的叔叔去了，”

“真的是这样，亲爱的妈妈。”

“这样说来，报应在哪儿啦？”我的母亲问道。

“报应是有的，我的叔叔掠夺财产的阴谋没有成功，现在他得靠给他迫害过的人生活，靠他曾经想害死的人过活。这不是报应吗！”

“我带来了一些他的同谋的消息，”包勃说。包勃和他的哥哥也都来了，我怎么能忘记邀请这两个朋友呢，靠着他们我才逃掉重罪法庭的审判。“那个可怕的德里斯哥，”包勃告诉我们，“一直给流放海外。他的老婆死了。阿伦和奈德最近也给判了终身流放：小凯特在照顾她的祖父，跟他住在一起。

这个老头子还有点钱，他们过得还不太苦。”

饭吃好以后，马夏走到我身边，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们一向奏乐给那些与我们不相干的人听，现在应该奏一下给我们亲爱的人听，你愿不愿意弹一曲你的《拿不勒斯歌》？”

“我非常愿意，因为就是这只歌使丽丝开口讲话的。”

从一个裹着两层丝绒的漂亮盒子里，马夏拿出了他那把只值两法郎的老提琴，我也从套子里拿出那只给雨水浸白了的竖琴。

这时候，卡比那条狗走来了。好卡比已经很老，耳朵也聋了，但是眼睛还是非常好，它睡在垫子上，认出了那把竖琴，跛着脚走过来预备“表演”。我们唱完歌，卡比去讨钱，它看到这么多的收入惊奇得不得了，连忙送给我。它从来没有讨到这么多的钱，全是金币和银币：一百七十法郎！我吻了吻它的鼻子，跟从前它来安慰我的时候一样，这个童年时候的不幸的回忆使我产生了一个主意：

“用这笔钱来成立一个救济街头小音乐师的机构，这是第一笔经费，其余的费用由我和我母亲出。”

“亲爱的太太，”马夏吻着我母亲的手说，“我请求你让我也捐一笔钱，如果你同意，我把在伦敦第一次演出的收入加到卡比这次收入里。”

